

炎黄春秋



1841—1997：
香港的风雨历程

五、六十年代关于道德继承
问题的大讨论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

陈布雷、陈璉父女
分道扬镳

明太祖朱元璋
惩贪记



1
96

上海市 建平中学掠影



上海市建平中学校长冯恩洪



冯恩洪校长与来校领导座谈

注：本页详细说明见内文 63 页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洪 炉
丁洪章

执行主编:刘家驹 王恂 舒元璋

理 事 长:杜导正

名誉理事(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河南省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简祖扬 李华鹏

秘 书 长:徐 孔

副秘书长:段向群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邮 编:100802

印 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四封制版:北京金燕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出版日期:每月 11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杂志社电话:6176633-227

6170955

定 价:4.00 元

②新年致读者

专 稿

③1841—1997:香港 156 年的风雨历程

徐庆全

求实篇

⑬五、六十年代关于道德继承问题的

大讨论 张国春 牛京辉

⑳被“选入”汪伪中央的何世桢是爱国者

何祚榕

春秋笔

③①李锐与《庐山会议实录》 张 扬

③⑤港岛救英: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

撤离香港纪实 马仲廉

英杰谱

④②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 孙彦钊

④⑧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奠基人江上青

欧远方

人海浪

⑤②陈布雷、陈璘父女分道扬镳 章学新

时代风

⑥③“规范+选择”:冯恩洪为跨世纪教育“抛砖” 萧 徐

古镜台

⑥⑧明太祖朱元璋惩贪记 邱远猷

古今谈

⑦③歌谣、谚语与武则天前后的朝政 拜根兴

艺苑志

⑦⑥我与京剧三大名旦的交往 葛献挺

神州光

⑦⑨郑州发现最早的古城遗址 朱启新

新年敬告读者

1995年过去了。在辞旧迎新之际，人们总不免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刊物亦复如此。

不过，1995年的12册刊物早已送到读者手中，得失为大家所共睹，无需我们再来喋喋。然而几句袒露心迹的话还是该说的：回首既往，众多读者的鼓励和支持，固然使我们感到欣慰，但每每想到工作中的不足，特别是技术性错误的屡屡出现，和个别文章中的事实失真，则不免汗颜。怎么办？我们只能是着眼未来，即在新的一年里，请广大读者审视、考察、监督我们的实践。

历经四个寒暑的《炎黄春秋》，其方针已为读者所认可，其“面孔”已为读者所熟悉，其读者群也已形成且在日渐扩大，我们的责任就是在既定的方针和已有的基础上，工作得更为严谨，稿件质量更有所提高，尽量减少事实和技术性的错误，把刊物办得更好一些。

思想性是刊物的灵魂。高举爱国大团结的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这个刊物的思想性所在，我们将坚持不渝。既名“春秋”，难免褒贬，也必有褒贬。“一字之褒，宠逾华袞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谈何容易！但“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以及“说真话，说实话”，力求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我们是努力以赴的。但要做得好，还需读者监督，特别是作者的忠诚合作。此外，要真实地反映历史，就更加容不得作品本身事实的失真。无论是混淆“文学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的想象与虚构，还是不占有充分资料、不作认真研究考证的拼凑和编造，都是我们要坚决摈弃的。为减少直至消灭事实失真现象，避免以讹传讹，我们将采取诸多措施加以防范；对见诸刊物的，则要态度鲜明地予以指正，以保持刊物的严肃性。

“炎黄春秋”四个字，内涵极丰，赋予我们以广阔的时间与空间。无论古今中外，凡我炎黄子孙所创的功业，都是对历史对人民的贡献。前代的仁人志士，是今人的范例，今日的仁人志士，又将是后代的楷模。过去之史是今日之鉴，今日之事又将是未来之鉴。祖国的成就鼓舞着海外的炎黄子孙，海外炎黄子孙的成就又激励着中华民族的振兴。伟哉，壮哉！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还要扩大刊物的报道面，增加现实性的题材和海外华侨、华裔活动的报道，使其内容更为丰富多彩。

关于刊物的可读性，我们希望的是做到雅俗共赏。我们理解的雅，不是“曲高和寡”之“雅”，阳春白雪，高不可攀，而是指内容的严肃性，高品位，深厚的历史感；俗不是粗俗，而是从内容到语言都力争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读者。严肃而不严厉，通俗而不媚俗，我们的刊物定位就定在这样的“雅俗共赏”上。每期新出版的《炎黄春秋》能够在北京街头书摊上挤占一席之地，我们引以为荣。

最后要说的是，自去年10月为本刊调价发表《相濡以沫，共度难关》一文后，不断收到读者表示理解和支持的来信，特别令人感动的有两位读者为我们此文中提到的那位困难的读者代汇了1996年度的订刊费，使那位经济困难的读者得以继续阅读他所爱读的刊物。我们答谢读者支持的最佳方式是把刊物办好，请相信本社同仁会不遗余力。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本期“导读”和内页的书眉已经取消，“目录”也压缩到版权页上，目的就是为了在减少页码的情况下，尽力保持刊物原先容量。望读者体谅编者的苦衷。

把话说到底，刊物由编辑办，然而她属于读者。在这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时候，我们谨向亲爱的读者和尊敬的作者致以良好的祝愿，并期待着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An aerial photograph of Hong Kong, showing a dense cluster of skyscrapers and buildings. The image is in black and white, with a slightly grainy texture. The title text is overlaid on the top half of the image.

1841—1997

香港 156 年的风雨历程

1841年1月25日上午8时15分,英国“硫磺号”军舰在舰长拜尔丘的率领下,擅自在香港的“占领角”登陆,进入香港。26日,伯麦率领英军,在香港举行了“占领仪式”。“日不落帝国”的“米”字旗,从此飘扬在本属于中国领土的香港的上空。

1994年12月19日,在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历史博物馆前,一块引人注目的巨大的记时牌树立起来。它从1997年7月1日——这个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日期开始,进行倒记时。它提示渴望祖国统一的人们,香港的回归指日可待了。

如果从“米”字旗在香港上空飘扬开始算起,香港脱离祖国母体已有156年了;如果以1898年的“新界”租约算起,已整整一个世纪了。

在这156年的风雨历程中,中

国人民既有“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悲愤,也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慨叹,更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豪与骄傲。

一、为了继续从事罪恶的鸦片贸易,英国人把目标盯在了香港

十三世纪,一位叫马可·波罗的友好的意大利人,将自己在中国的游历写成了一本书。书中对中国极力赞美,使本来就具丰富想象力的西方人,涌起了七彩的幻想。在西方人心中,东方是个神秘宝地,上帝在那里撒满了黄金白银,甚至人们的饭碗和酒杯全是用金子制成的。从中国传过去的精美的绸缎、瓷器和玉器,无疑给这个美丽的传说提供了注脚。去东方的黄金之地,夺取上帝本来就该给予的那份财富,成了西方列强按捺不住

的渴望。

1514年,第一艘葡萄牙船绕过好望角,沿着明朝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航线,驶抵广东,强行登上了香港的屯门岛,并在岛上刻立了有葡萄牙国徽的石碑,以此为基地向大陆侵略。在遭到了香港军民的强烈反抗后,葡萄牙人被迫撤出。但是,在1553年,葡萄牙人却以年租500两白银的些微代价,通过广东官员汪柏,强行租占了澳门。

葡萄牙人的成功,激发了英国殖民者到东方淘金的欲望。为了实现“日不落帝国”的梦想,他们迫不及待地整装出发了。

1637年,英商“可甸联合会”派出了以威代尔为首的五艘武装商船,闯进中国南海,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华贸易行动。在当时的国际大都会广州,威代尔虽然没有发现梦想中的黄金,但透过热闹

非凡的市场、拥挤的店铺，却看到了对华贸易的辉煌前景。为了为大英帝国开辟一个对华贸易的永久的摊位，在威代尔离开广州时，密令安号商船偷偷地开到珠江口外，找寻可供驻扎的小岛。他们的目光落在了与澳门相对的香港。

此后，英国殖民者便以南亚次大陆为跳板，向古老的中国展开了一场蓄谋已久的殖民战争。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和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政府曾两次派专使来华同清政府谈判，要求建立外交关系。以当时的情势而言，仍沉醉在妄自尊大的千年帝国梦中的清政府，根本不必为与外国通商来操心。中国的茶叶和丝绸在世界市场是抢手货，出口量很大，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则使中国根本不需要来进口大量的工业品。而作为当时世界最大对外贸易输出国的英国，每年却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茶叶和丝绸，使英国对华贸易的逆差不断增大，英国政府不得不千方百计搜罗大量硬通货——墨西哥银元来付给中国。正是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地位，在乾隆帝80寿辰之际，一向狂妄的大英帝国，派出了以特使马嘎尔尼为首的级别甚高、阵容可观的祝寿团，借祝寿之机，向清乞求通商。

尽管马嘎尔尼跪拜了乾隆，但当他诚惶诚恐地提出此行的真实目的时，还是遭到了乾隆的断然拒绝。乾隆帝不无骄傲地复函英王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至于英国想借一岛屿的要求，乾隆帝也义正辞严地声明：大清天朝的每一尺土地，“俱归版籍，疆土森然，即岛屿沙洲亦画界分疆，各有所属，此事尤不便准行。”同乾隆的态度相同，嘉庆皇帝也拒绝了英使阿美士德的要求，并明确表示不欢迎他在京城留住。

乞求失败后，贪婪的英国人绞

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招毒计：用魔鬼的诱惑——鸦片，去赚回失去的银元。鸦片的输入，确实使英国对华贸易起死回生。到1830年，英国不但不需要支付中国硬通货，反而从中国运走了670多万银元！

尝到甜头的英国商人欣喜若狂。为了攫取更大的利润，要求政府强占中国东南沿海岛屿作为推销鸦片基地的呼声越来越高。1830年，49名在华的英国鸦片商联名上书英国议会，要求政府“采取与国家相称的决定，在靠近中国沿海地区取得岛屿一处”，以保护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利益；1833年，曾充当东印度公司驻华代表的士丹顿，在英国下议院报告说：“将来贸易展开，如果不便由祖国直接联系，那么在中国口岸设立贸易中心，以脱离中国管制，这是很必要的。”报告中特别提到“香港是停泊的良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英国的船队“常常到这里来”。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些建议，派拿皮楼到广东充任贸易监督，并指示他“寻找一个适当的港口准备作战争之用，必要时可适当使用武力”。

1834年，拿皮楼在观察了香港和澳门的地势后，向国内报告说：“用一点武力，……占据珠江口东面的香港，那是很有用的。”

1839年，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也上书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说：“我们还需要占有一个海口，我们可以占据大潭湾及岛（指香港）。这地方作为港口，较澳门为佳。海水既深，陆地环绕，常年可用，易于防守。它是山地，但已经开垦，在食物上可以独立。岛的南方有一个地腰，是很好的贮货所。这个地方是北方来的船只汇集之地，中国政府便无法干涉它的船只将茶丝运到我们的船来。”

至此，英国酝酿多年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侵华立足点的阴谋正式形成，只是何时和以何种借口实

施的问题了。

二、要对中国动手，在英国说来，无需考虑有理和没理

1836年，英政府派一向主张武力侵华的查理·义律为驻华的第一任领事。这个贵族出身、贩过黑奴的英国殖民主义分子，从美洲到亚洲，处处留着他肮脏的足迹。他上任后，大力支持鸦片走私，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影响到国计民生和清政府的统治。在有识之士的倡议下，清政府被迫采取了禁烟的举动。1839年6月3日，这个令国人扬眉吐气的日子，广州的虎门海滩浓烟滚滚，林则徐点燃的焚烟的火焰，向世人昭示了中国人民对鸦片的切齿之恨。

代表鸦片商利益的义律，一面下令所有新到广东的鸦片商船集中停靠在九龙尖沙咀海面，一面命令停泊在香港的“沃勒治”号战舰随时作好打仗的准备。

1839年9月，英国殖民者的大炮在九龙山上打响后，主战的外交大臣巴麦尊，一面静观战局的发展，一面给英国政府出谋划策。1839年11月2日，他在给政府的信中写道：“为了将来通商的进行，我们最好能与英国缔结一项通商条约，包括下列各项：……（7）应将一岛割让给英国（用购买或其它方式），英国可在岛上建商馆。……如果需要用武力争取这些条款，我们想英国人民、欧洲各国不会反对，至少我们认为这种策略值得一试。”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则把中国的禁烟说成是“无理举动”，而且露骨地说，这给了英国一个“很有利的”“战争的机会”，“因为这可以使我国终于乘战胜之余威，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强迫中国接受。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来，是不能轻易放过的。”

巴麦尊的主张得到政府的许

可后，更有恃无恐。他在给清政府的正式照会里，除了提出赔偿烟价等无理要求外，更肆无忌惮地声称：“英国政府要求中国将英国全权公使所指定的面积敷用、位置适宜的沿海岛屿一处或数处，永久割让予英国政府，作为英国臣民居住贸易的地方，以便使他们的身体免受干扰，他们的资财获得保障。”否则，他威胁道，英国必“相战不息”。

好一个强盗的逻辑！这正如当时在大英图书馆的地上留下两个深深的脚印马克思，引用泰晤士报所揭示的那样：像英国这样惯用“暴力”的国家，“凡遇有故意侵略的机会时就用不着每次都用高明的论据来证明英国有理或没理。”这就是所谓的“强权即公理”！

遭受侵略的中国人民当然要进行反抗，林则徐率领军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维多利亚女王急忙召开国会，巴麦尊在会上极力煽动对华采取武力报复，他狂呼乱叫道：先揍一顿，再作解释。经过周密部署，1840年，英国政府派出了以前印度总督乔治·懿律为统帅的“东方远征军”，并为他备下了48艘战舰、540门大炮、4000名士兵。6月，侵华远征军抵达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了。

在英军的船坚炮利面前，腐败的清政府妥协了。当英军攻到天津

时，道光皇帝急忙派直隶总督琦善同英军谈判。虽然琦善对侵略者酒席招待，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但依旧改变不了他们的胃口。懿律坚持索要赔款和岛屿，并蛮横地要求清政府查办林则徐。琦善满口答应。英军见以武力威逼清政府屈服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在9月中旬撤兵南下。

当琦善因“退敌有功”受到道光帝“嘉奖”时，他心里并不安。他许诺的割香港给英军一事，事关大清国体面，道光皇帝能否答应，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当道光帝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去广东代替林则徐与英军交涉时，他才试探地向道光透露了英军的条件。据有关传闻，君臣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道光听后问：英国人所要的香港是个什么东西？

琦善道：是个小渔村，在南海边上。

道光问：那能有多大呀？

琦善道：小得很，中国是一个鸡蛋，香港只是鸡蛋上的一个小点，拿袖子一抹就去掉了。

道光说：那就给他们好了。

这样，当1841年1月20日义律（懿律因病回国）提出四项正式要求时，25日，琦善便在穿鼻洋的海面上，全部接受了这些条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的内容为：（1）、割让香港予英国；

（2）、赔款600万银元；（3）、两国官吏平等相待；（4）、恢复广州通商。

尽管这个条约还仅仅是个草约，但义律为了造成既成事实，1月21日即迫不及待地公布了。1月25日，飘扬着“米”字旗的英国战舰，在船长拜尔丘的率领下，耀武扬威地开进了美丽的香港岛。次日，侵略者举行了鸣枪放炮的占领仪式。在举起香槟对万里之外的女王狂祝一通“健康”之后，司令官伯麦对着山峰上高悬的“米”字国旗傲慢地宣称：香港将变成由英国人永远统治的“自由港”。

香港被占的消息传回白金汉宫后，贪得无厌的侵略本性使他们对已攫取的利益并不满足。外交大臣嫌所得的赔款数额少，同时对义律同意清政府在香港收税也大为不满。为了攫取到更多的利益，英政府否决了这个草约，并将义律撤职，改派在印度干了30多年殖民勾当的璞鼎查为全权代表。

代替义律来中国赴任的璞鼎查，果然不辜负英国政府的“厚望”。这年8月，他即率舰北犯，攻陷厦门、定海，又占领海、宁波。他在给巴麦尊的报告中将这番“战果”汇报后，又狂妄地宣称：“或者北京当局必须投降，或者沿海省份将处于我们的统治之下”，“英女王即可宣布中国那些港口或者那些



1842年8月29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

沿海地区将并入女王陛下版图之内。”1842年6月，从印度开来的援军到达之后，璞鼎查立即沿长江北上。8月4日，英军到达南京江面。

清政府的官员闻风丧胆，听说侵略军还要进攻天津，便纷纷逃出京城。道光帝急忙派耆英和伊里布为谈判代表，赴南京向英军求和。璞鼎查开列了议和条件，耆英、伊里布一字不动地全部接受。8月29日，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条约主要内容为：（1）割香港给英国；（2）赔款2100万银元；（3）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

香港由此开始了溢满血水和泪水的长达150多年的沦陷历史！

三、既得陇复望蜀，英国下一个侵略目标瞄准了九龙

纵观历史，以割地赔款求苟安无疑于饮鸩止渴，因为侵略者无一是既得陇复望蜀。得到香港后，英国的下一个目标便落在了与香港隔海相望的九龙半岛上。

其实，在计划夺取香港时，英国即已有了占据九龙的预谋。1840年4月25日澳门新闻纸的记载即是铁证：“现在附近此处（指广东）之海岛，我等行船之人俱已细心考察，其中之港口路径，并已经详细注明在行船书上。在各处船只湾泊之中，并无一处可以好过沙尖咀。……我等若得如此一处地方，不服别国分所管，自立官府管理，即系平安妥当之处。”

在此前后，英军即已频繁地在九龙尖沙咀洋面活动。1841年，琦善在与英国议定《穿鼻草约》时，撤走了在尖沙咀附近“惩鹰”和“临冲”两炮台驻防的清军后，英军随即占领。9月19日，英军又以“防止中国军队的反攻”为借口，明目张胆地占领了九龙炮台。

1856年，英国以“亚罗号事件”（指清军在香港注册的亚罗号货船上搜捕海盗一事）、法国以“马赖神甫事件”（指法国神甫马赖以传教为名，为非作歹，被击杀一事）为借口，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英军即强迫两广总督劳崇光，得到了南九龙4平方公里土地的永久租借权。

1860年2月，英国领事巴夏礼派兵占据了九龙。3月，又强迫劳崇光签订了租约。同年10月24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再次签订了屈辱的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规定：“前据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公历3月21日）大清两广总督劳崇光将粤东九龙司地方一区交与大英驻扎。粤省暂充总局正使功勋三等宝星巴夏礼代国立批，永租在案。兹大清大皇帝定即该地界付予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香港界内。”这样，在1861年1月19日，九龙南部一区又拱手正式送给了英国。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后，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变本加厉。1898年，英国以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对香港构成威胁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了租借整个九龙半岛作为军事基地的无理要求。6月9日，中英签署了《拓展香港界址专条》。条约规定：“溯查多年以来，素悉香港一处，非拓展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今中英两国政府认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其所定详细界线，应俟两国派员勘明，再行划定，以九十九年为限期。又议定：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其余新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至九龙向通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又议定：仍留九龙城原旧码头一

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任便往来停泊，且便城内官民任便行走。将来中国建造铁路至九龙英国管辖之界，临时商办。”

根据这个专条拓展的地区叫“新界”。原界址仅限于尖沙咀至油麻地，而新界则以深圳河为界，东起大鹏湾，西至深圳湾，南至丫岛，加上深圳河以南陆地以及邻近23个岛屿，总面积达975平方公里，比原界址扩大了差不多100倍。全部“租期”为99年。即从1898年开始，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至于“租金”，那是分文没有的了。

英国对新界的接管，从1898年7月1日开始，至1899年5月完成。至此，通过1842年的《南京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1898年的《拓展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英国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逐步地掠夺了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这三部分习惯上统称香港），实现了其蓄谋已久的野心，在其殖民史上留下了极其丑恶的一页。

四、参加反英斗争的水勇头人林福祥说：夷不可信，和不足恃，香港不可不复

1841年，当琦善丧心病狂，出卖祖国利益，义律强词夺理，擅自占据香港之后，各地人民纷纷起来反抗，东莞等地首先召开群众大会，联名呈书广东巡抚怡良：“琦侯一味示弱，……失去沙角之后，往返再四，议欲给银割地，罢兵通商，民心不服，联名具呈，谓香港久隶版图，天朝子民，不宜弃诸外国”；“香港绅民不愿为夷”，也“联名控诸抚院”。广东巡抚怡良不得不顺应民情，呈报清政府。而清政府为了和缓群众情绪，只把琦善撤职查办，至于香港则无力顾应了。

但是，民心不可辱，广东人民“岂忍坐视”英人横行、宝岛陷落。

1841年5月30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日），广东人民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三元里反英斗争。参加这次斗争的水勇头人林福祥说：“夷不可信，和不足恃，香港不可不复，……若只求旦夕之安，不计存亡之理，今日尚持首鼠之端，他日必貽反噬之悔。”广西巡抚梁巨章在给朝廷的奏书也说：“此次广东省城幸保无虞，借乡民之力！乡民熟睹官兵不可恃，激于义愤，竭力抵御，实一呼四起，遂令英夷胆落魂飞。”为免除后患，奏书力主清政府收复香港。

对于香港本地居民而言，香港决不是“用袖子一抹就去了的”，他们对英国殖民者恨之入骨，渴望赶走英军，回到祖国的怀抱。英军登岛之初，就遭到居民的坚决抵抗。1839年，英船停泊在尖沙咀的时候，沿海居民就在附近的井内，撒下毒药，迫使船上的英国人不得不用帆布袋兜接雨水解渴。占领香港的英人在晚间出门，往往被人袭击。香港政府不得不下令：晚间出门各人要携带灯笼，各家门口也要挂灯，以防被人暗中袭击，并于每晚十一时后，断绝交通。

英军占领香港本拟以此为依据点，进行贸易，但广东和香港的民众“志存报复”不愿与英人进行贸易。1841年3月，广东巡抚怡良在奏书中说：“英夷先后在裙带路、赤柱各处，张贴伪知县名目，其伪示以缉盗禁赌为名，阳为约束，阴示招徕，无非欲内地商民往该处与之贸易；而内地安分商民，均以非我族类，不愿与之往来。”广东商人更是一语道破他们拒绝与之贸易的实情：“尔等占据内河，强梁霸道，不过要在此通商，好卖鸦片；岂知买卖要人情愿，如今我等不愿与尔交易，尔偏要求，羞也不羞！尔之货物我们很不稀罕，我们要买物，自有恭顺各国同我交易，货多得，何必定与尔交易耶？尔如今如



1984年12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签字，宾主举杯庆祝

此可恶，我等痛恨已极，若不杀尽尔等猪狗，便非顶天立地之男子汉！”因此，一时间，岛内市场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实行贸易封锁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广东和香港的人民把最终目标放在了收复宝岛上。广州和新安（香港原属新安县界）的爱国乡绅大办社学（社学的主要任务是反抗侵略，成员大都是青壮年），扩大团练（团练本是地方武装，此时成为抗英的重要武装力量）。两个团体互相联络，共同打击英军。

《南京条约》签定后，他们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决定利用自己的力量，与岛内的仁人志士联合行动，一举收复香港。为此，他们发出了“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檄文在历数英国侵略者的罪行后说：“是则英夷不平，诚为百姓之大害，国家之大忧。惟不共戴此天，方无愧于血气”，发出了向英人讨还血债的呐喊。

当时香港岛内英军数量并不多，英军召集汉奸头目卢亚景、邓亚苏、石玉胜等，收买一些见利忘义之徒，以备抵抗。但是，就在英军好不容易网罗到的600人中，一部分良心未泯者，在爱国心的驱使

下，投奔到当地有号召力的头人黎进福和石玉福所领导的抗英队伍之中。黎进福等人领导了一支3000人的队伍，在将香港英军布防情况摸清后，回到广州，准备在1842年12月，与广东人民一起，分兵12路攻打香港。攻打计划是：先将敌人诱至虎门炮台，出战船截敌后路；打败英军后，再与港内的人士相呼应，反攻香港。

就在他们准备行动之际，贪生怕死的两广总督得到了消息，深恐“衅端再起，触夷怒，势不可收”，采取一切手段进行阻挠。结果，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义举被扼杀了。

收复香港的行动被扼杀后，香港人民并没有停止反抗，他们采用一切手段，向英军展示他们的复仇之情。那段时间，英国人连吃一口面包都要格外小心，因为说不定面包里的毒药就要让他们去见上帝。英人为了保命，不得不自己开面包铺，但那也无济于事，因为说不定那天夜里的一把火，面包铺就会化为灰烬。这些行动，手段虽极为幼稚，但却搞得英军胆战心惊，连伦敦的英国人也惊呼：香港人民“对英国人有不解之仇”。

1844年，英国人炮制了一个

“人头税”法案，强迫岛内居民每年都要到警察局登记一次，并交纳1—5元的税款。这项歧视华人的法律立即遭到了香港人民坚决反对，罢工罢市。10月30日，3000多名华工返回广东。罢工浪潮持续了3个月，迫使港英当局暂缓执行这项法律。这是香港爱国同胞取得的抗击英军的首次胜利！

继1842年那场流产的大起义后，香港人民在1899年又掀起了反抗英军的武装暴动。1898年，从紫禁城里又传来了“租借九龙”的消息。祖祖辈辈生活在半岛上的吉庆围村的父老乡亲们，在邓清士的率领下，勇敢地拿起武器，反抗侵略。1899年1月，英军开始“接管”新界，组织起来的义士奋起抵抗，不惜流血牺牲，打退英军。5月，英军在大炮的掩护下，向吉庆围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吉庆围的那扇在300多年前立下的防御海盗的铁门，阻挡了英军的进攻。英军就将猛烈的炮火对准了铁门。铁门被炸倒后，英军才占领了这个村庄。

这次反英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香港人民抗击外侮，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却激励着后人，并形成了深厚的爱国传统。

马克思深切关注着香港和广东人民反抗英军占领香港的斗争，他曾预见地指出：“华南人民反对外人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热态度的本身，很显明地指明：中国人民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着极大的危险。不多年以后，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临死的斗争。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五、港英政府拱手让香港，蒋介石退让铸大错

1941年12月初，梦想在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帝国，在距离深圳河边境仅8里的地方

集结重兵，准备向香港发动进攻。当时，活跃在广东一带的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立即通知香港英方当局，要他们密切注意日动向，并提出与英方合作保卫香港的意见。香港英军司令部最初接受了这一建议，并达成了中方出人、英方出武器、装备一个团共同打击日军的协议。但出人意料的是，港督杨慕琦却拒绝了。

杨慕琦并非不知道日军进攻香港的明显意图，也并非不知道仅靠英军难以守住香港的现实，但他认为：即使将香港交给日本人，也比交给中国人要好。理由是：如果香港让日本人占了，英美协约国打败日德同盟国后，日方还要将香港交还给英国，而一旦中共军队进入香港，将来香港的归属就难以预料了。

正是抱着这种不放弃既得利益的想法，当12月8日日军对香港发动进攻时，英军只是进行了一些装装门面的抵抗，就在圣诞节过后向日军举起了白旗。香港的“米”字旗换成了“膏药”旗。

此后，随着世界战局的进展，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英美联军协同作战。英美为了完成他们的“欧洲第一”的战略，让中国支撑亚洲大陆战局，1943年1月11日，才不得已与中国政府签定了废除在华特权的中美中英《平等新约》。但是，在废约问题上，英国一直拒绝将许多实质性内容写进新约，更顽固地坚持不放弃对香港、九龙的占领权。英国认为香港、九龙虽暂时被日军占领，但到战争结束后，它仍可在谈判桌上收回对港九的统治权。葡萄牙人也以此先例，没有放弃对澳门的统治权。

英国的这一举动，遭到了一同协同作战的美、苏的反对。新约签定后，英国的格普理访问美国时，许多美国的高层人士纷纷质问他：

为什么英国到了这时候，还仍然不放弃将香港交给中国政府的打算；1945年2月8日，罗斯福和斯大林在谈话时，又一次提到香港的主权问题，罗斯福希望英国把香港主权交还中国。但是，丘吉尔仍然断然拒绝。

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坚持要收回香港主权。蒋介石在1943年3月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坚持认为香港和新界在地理上互相依存，必须同时解决；1943年12月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也就此向英相丘吉尔讨个说法。可惜，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在英国的压力下，很快就屈服了。蒋介石把香港战后问题放在了一边，却把战后如何消灭“异党”——共产党放在了首位。

1945年8月15日，日本电台命令所有日军立即向盟军所属战区将领投降。香港的日军属华南派遣军第二十三军所辖，这个军的司令田中久一的司令部设在广州，他又兼任香港总督，因而香港应是中国广东战区的一部分。顺理成章，接受香港日军投降应是广东战区的中国军队而不是港英政府。但是，中国战区盟军最高司令蒋介石，为了打内战的需要，忙于接受上海、南京及南方日军的受降。直到8月21日，蒋介石才匆忙令第三方面军的13军从梧州赴香港、九龙，接受日军的投降。

但是，这已经晚了！

就在蒋介石忙于抢占地盘的同时，由英国海军少将、太平洋舰队司令夏榎率领的皇家海军舰队，已经接近香港了。与此同时，被囚禁于赤柱集中营的香港政府辅政司詹逊，立即按照英国政府的旨意，返回市区组织了临时政府，并通过电台向香港市民发表广播讲话：“我是目前驻港英政府的首席代表，现已取得日方同意，在维多利亚城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并准备

必要的步骤，当英军抵港受降时，恢复英国的统治权，我确信英军抵港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其实，当时詹逊既没有得到日军的同意，手中也没有任何武装力量，竟以战胜国的姿态，传令日军向此后到来的英军投降，造成既成事实，实际上为战后英国继续统治香港奠定了基础。

因此，当中国政府派遣的受降特使到达香港时，立刻遭到了英国方面的拒绝和反对。中国政府对此不但不据理力争，反而在8月24日宣布：“中国不会派军队去香港接受日本投降，……以免引起盟军的误解。”

就这样，紧要关头迟了一步，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收回香港主权的千载难逢的机会。蒋介石在民族利益上铸成了不可饶恕的大错！

六、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备忘录中忧心忡忡地说：“香港殖民地可能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可能会生活在火山口上。”

1948年——1949年，人民解放军鏖战辽沈、淮海、平津，国民党败局已定，马克思所预言的“亚洲新纪元的曙光”——新中国的桅杆已经浮出了地平线。即将成立的空前强大的中国对香港的态度如何，成为英国当局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1948年12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向内阁提交备忘录，提出了对香港前途的预测：他认为，“在共产党统治之下，英镑区与中国的贸易不会停止”，“在提供对我们有价值的产品用以购买英国出口商品方面，一个稳定的共产党行政机构可能会比现政权做更多事情”。据此他断定：利用香港这个货物集散地的有利条件，维持或创造有形贸易的平衡，是中国新政府一个极其重要的支柱。在一定时期

内，不会出现对香港经济繁荣的破坏，“他们可能愿意暂时使香港继续成为英国操心的对象”。

在作了上述乐观的分析后，贝文也考虑到了中国政府收复香港的可能性：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政府“将会采取正统的共产主义政策”，而这个政策则与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是水火不相容的。作为对抗，中共政府有理由采取收复香港的行动。因此，贝文又忧心忡忡地说：“如果整个中国都由共产党人统治，香港能否继续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取决于共产党人是否感到一个组织和运作良好的英国港口有利于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如果共产党人要求将香港归还中国，他们会采用战争以外的各种方法挖香港的墙角”，“他们可能通过煽动罢工，在某种程度上使香港殖民地的经济暂时瘫痪”。他的结论是：“香港殖民地可能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可能会生活在火山口上。”

这份备忘录，反映出英国当局无法把握香港前途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认为新中国政府出于经济的考虑，有可能维持香港现状；一方面又特别担心来自于中国使用战争以外的手段收复香港的可能。

尽管英国对中国收复香港地区的担忧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但是殖民主义者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拱手放弃任何既得利益。1948年12月10日，外交部副大臣梅休在下议院回答保守党领袖丘吉尔的质询时，公开声明说：“我只想说明英国政府有意保持他在香港的地位”，因为“在这令人烦恼的局势下，香港作为一个稳定的中心，其价值和重要性将超过以往任何时候”。1948年12月13日，英国内阁对中国形势的发展进行战后首次讨论。结论是赞同贝文提出的在中国“保留立足点”的政策，并且指出：“中国形势的发展会使香港和马来亚殖民地政府承受的压力

越来越大，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增强和支持当地的行政机构。”

就在英国当局还在伦敦谋划方案之际，香港当局已经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付了。11月6日，香港总督葛量洪虚张声势地举行了海陆空军警的防暴演习，与此同时，又建造了防空洞、空袭警报系统、重要物资的储藏库等。香港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1948年12月24日，葛量洪又直接向英国当局发出求援的报告。他指出：介于目前的形势，“如果英国政府不明确表态，表示肯定要保卫香港的意图，我难以指望香港进入戒备状态，去应付共产党的可能入侵”。在此情况下，贝文才勉强发表了“英国愿意继续留在香港”的声明，并应葛量洪的要求，从东南亚等地调来一批敦客兵，使香港驻军增至3万人。

1949年1月，英国当局拟定了绝密文件《香港紧急防卫计划》。根据英军远东总司令的估计，计划提出：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紧急状况，香港需4个步兵营，1个炮兵野战团，1个海岸与防空两用重炮团和1个在需要时能立即增援的后备旅。作为军事装备的辅助，还需要建立一支警察部队。因为现时香港“虽然警察中的华员受过充分的军事训练，但在预想的紧急状态下，不能认为他们是完全可靠的”。为了摆脱“辅助警察部队只能从不可靠的来源——华人中招收”的局面，他们建议紧急考虑扩建马来团，再组建数营马来人军队。

1949年3月5日，殖民地大臣琼斯向内阁提交了关于马来亚和香港局势的备忘录。他指出：短期内香港可能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威胁：一是左派工会可能在香港内部制造骚乱；二是难民大量由陆地或海上涌入；三是共产党组织的游击队可能从外部入侵。而要应付这三种威胁，在香港的英殖民地当局

是没有力量的，因为“在全香港近200万人口中，愿意全心全意支持香港政府维持内部秩序并提供最低限度必要的服务的，包括警察部队和政府永久人员在内，不会超过1万人”。这样，必须从英国调兵。

在英国防务委员会正紧罗密鼓讨论向香港调兵之际，内阁大臣还在为此争论不休。一些大臣认为：且不管所谓的派遣军能否对付局势，英国这样做本身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没有理由认为共产党军队会进攻香港；共产党在中国的政策迄今为止仍是保持同非共产党世界现有的联系。而另一些大臣则认为：向香港派遣军队，是以实际行动证明英国保卫香港的决心，会产生重大的效果。首先是可能有效地阻止共军对香港发动直接进攻；其次可能使当地居民中的动摇分子聚集到英国一边，减轻对香港内部安全的威胁；再次可能会增加东南亚反共阵线的力量。

这样的争论持续了几个月，到1949年8月，内阁才最终批准了向香港调兵的计划，同时提出：英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阻吓”中共军队不要进攻香港，同时使世界舆论确信维持英国在香港的地位是有利的。

尽管如此虚张声势，英国政府对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持在香港的统治地位的信心依然不足。英国曾想借助与对共产主义一直持敌对态度的美国的支持，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但是，对国际局势了如指掌的贝文打破了当局的这种幻想。他指出：虽然“美国是唯一能够提供财力、物力和兵力在华北对中共采取反击行动的强国”，但是，美国在蒋政府身上下的赌注已然泥牛入海，这次“它未必会采取行动；即使采取了，也未必奏效”。但是，走投无路的英国政府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在1949年5月26日，通知美国政府和英联邦其他国家政府，

以弄清这些政府“是否愿意支持保卫香港、防止共军从大陆发动侵略的政策，并在需要时在适当时期发表公开声明支持这一政策”。

英国的试探果然碰了一鼻子灰。6月，美国就已明确照会英国表明了态度：“美国不会派遣空军去协助保卫香港”。其他英联邦国家更不愿为英国的利益付出任何努力，对英国大都采取敷衍态度。

在这种形势下，英国又不得将极不情愿的事实——考虑与中共谈判甚至国际共管的可能性，摆在了议会桌上。贝文和琼斯认为，英国不应该与一个“不友好”“不民主”的政府进行谈判，更不应该把香港交还给一个还未统一中国的政府，以免香港在他日成为国共双方在内战中的牺牲品。他们的结论是：英国政府只能与一个“友好的”、“民主的”、“统一的”和“稳定的”中国政府谈判香港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政府未出现之前，英国必须维持香港的地位不变。一些大臣认为，如果提出中国政府应该是“民主的”条件，那就意味着永远关上了同中国政府谈判的大门。因为东方和西方对“民主”一词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异，如果以中国实现以西方式的“民主”作为谈判香港前途的先决条件之一，其实质是排除了同中国政府讨论香港问题的可能性。

这样，内阁会议最后的意见是：在删除了“民主的”一词以后，贝文和琼斯关于同中国政府谈判香港前途的条件和建议，可以作为一个短期的政策加以接受。但准备以种种先决条件为借口，尽可能地拖延这种有失“绅士风度”的谈判。

可是，英国还是没有足够的信心来应付谈判。如果谈判一旦开始，中国政府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英国政府怎么办？全部拱手奉还当然是剜了它的心头肉，可是找一个什么理由来获得一部分利益

呢？在美国和英联邦国家对它的“保卫”香港的政策不感兴趣的时候，英国又煞费苦心地炮制了“将来对香港实行某种形势的国际共管”的招数，企图在“国际共管”的幌子下，尽可能多地保留在香港的特权。新中国成立前英国政府所出笼的这一系列政策的结果如何，只能看新中国政府的态度而定。英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焦虑地等待着来自新中国的信息。

七、香港政府在1949年的年度报告中说：中共正规部队到达中港边界的沙头角，没有发生什么事件

就在英国政府的军队陆续运往香港，并惊慌失措地加强布防之际，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新中国政府诞生了。

像欢庆解放的中国人民仔细倾听来自祖国心脏的声音一样，英国政府也在关注着北京发出的信息。令他们感到稍稍安心的是，无论是在开国大典上，还是在大典之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党政军要员的讲话中，都没有对香港问题表露什么意见。更令他们感到高兴的是，此后中国外交部所发表的对外声明中，对香港问题也未曾涉及。

1949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抵达深圳中港边界中国一侧，香港政府早已在另一侧部署了重兵。但抵达边界的解放军不但没有一鼓作气向香港发起进攻，反而在解放深圳后撤离边界线，只派保安部队维持边界治安。10月19日，琼斯将这些情况向政府做了汇报。他在下议院回答质询时说：中港边界是平静的，没有人向我报告发生了什么事情。关于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琼斯回答说：他们现在没有做任何不合法和破坏秩序的事情。琼斯的这些汇

报，使英国政府确信：新中国政府这种镇静和稳重的态度表明，他们无意对香港采取新的行动。为此，英国也将驻扎在边界的军队后撤，只留少数警察维持秩序。

香港政府在1949年的年度报告中也说：“10月16日，中共正规部队到达中港边界的沙头角，几天以后控制了整个边界的中国一侧。没有发生什么事件。英国与中国当局在边界的关系是正常的，符合一般准则。”在1952年的年度报告中又说：“这一年发生了一些小的边界冲突，幸而没有一件足以造成严重的国际后果。现在已有在边界建立更良好的关系的迹象。”

其实，新中国政府这种暂时维持香港现状和保持香港稳定的作法，虽然没有通过正式声明告诉英国政府，但在此之前已经通过新闻界透露了信号，只是由于英国政府的恐慌而不敢正视罢了。

早在1949年春，针对英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有关言行，香港的两家进步报刊《文汇报》和《大公报》曾先后发表社论，阐述了观点。1949年2月9日，《文汇报》在题为《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论中指出：“从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的态度来看，他们似乎对香港的安全问题更表关切。本月二日和三日，英国防务大臣亚历山大、殖民部大臣琼斯、海军大臣贺尔都有关于如何防卫香港的显明表示。仿佛他们远处伦敦所闻到的中国火药气味，远比我们置身香港者更为敏感。但我们终不能了解此种‘敏感’的现实价值到底有多大？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迄目前为止，从没有一言一行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港’如四大家族一样，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安全威胁决不至于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对国内的反动政权，不得已而用战争解决。至于对外关系，除积极支持国

民党反动政权且始终不放手者外，决不至无端与其引起严重的纠纷。即使有应行修改调整之处，也会先就外交途径求其解决。”

2月17日，《大公报》发表的题为《乐观香港前途》的社论中也说：“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绝不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中英间虽然还有些悬案如九龙城问题等未解决，只要彼此谅解，以友好态度处理，并不足以阻碍双方的邦交。英国对于中国旧政权并没有像美国那样有所企图，予以支持，在中国人民的脑子里没有大不快的印象。第二，中国的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象。凡以平等友善与中国相交的国家，只有受到欢迎。无论什么国家总不会关上大门不与外国往还的。将来中国和平安定，加速建设，在商务上必须与外国成立关系。中国许多物产要向外输出，外国许多建设器材要向中国输入……。展望未来，香港应该与大陆成立良好的联系，尽量发挥其货物集散交通衔接的作用，使香港得到真正合理的繁荣。”

1949年6月22日，新华社通讯社就6月13日香港当局无理搜查中共人士方住宅一事发表文章，在对港英当局进行谴责的同时，指出：“香港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一样，从来没有打算在香港制造什么‘暴行’。”

如果说前两家新闻机构的观点还是以民间的面目出现的话，新华社则代表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观点，也向英国政府表露了新中国政府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的信号。如果英国政府明白这一点的话，就不会演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闹剧了。

八、周恩来总理说：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

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

自1840年英国的炮舰打开了中国大门以来，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的创伤罄竹难书，饱经沧桑历尽艰难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后，为什么不但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解放香港，反而对香港采取了维持现状的特殊政策？

或许沉浸在欢庆解放气氛的国人对此并不理解。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问题，人们就会清醒地认识到，新中国政府的这一政策是极为明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昔日为消灭法西斯而协同作战的美国和苏联，分道扬镳，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东西方世界进入了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冷战”的时期。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采取了野蛮的干涉政策，对新中国进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企图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新中国政府，要从这种包围中杀开一条血路，就需要一条与西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保持联系的孔道。而香港这个国际转口港的地位正适应于此。因此，新中国政府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暂时维持香港现状，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新中国政府对香港的这种理智的举措，在政治和经济上赢得了主动。当时的英国政府即采取了有别于美国的对华政策。

在1949年11月1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英国政府认为：国民党当局“除代表其统治集团外再也不代表任何东西”，“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能代替国民党当局”的政府。从中共对香港目前的态度来看，他们需要同西方



竖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倒计时牌

进行贸易，考虑到英国在中国贸易的利益，“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在现在的条件下，不会被看作是‘违反了国际法准则和实践’”。11月初，英国代表参加了新加坡会议之后，更加深了这一认识：英国在华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尽早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且越早承认越好，最迟不应晚于今年年底。于是，英国政府决定在中国“留步观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已成定局。

新中国政府也以此为契机，迈出了与西方世界进行外交关系的第一步。

但是，新中国政府的“维持香港现状”的政策，并非意味着置香港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于不顾，中国对香港的一贯立场——恰于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新中国建立的10年前后，中国政府即在各种场合多次阐明这一立场。1957年，周恩来总理在对上海工商界人士的一次谈话中曾经指出：“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

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

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在发表题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的评论文章中指出：“我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分别按其内容，或者承认，或者废除，或者修改，或者重订。……还有一些历史遗留下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例如，香港、九龙、澳门问题，以及一切未经双方正式划定的边界问题，就是这样。”

1972年3月10日，就西方一些国家主张将香港问题国际化、由联合国出面解决的观点，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向联合国非殖民地特别委员会主席递交了备忘录，详细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6月15日，联合国非

殖民地特别委员会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了香港和澳门。11月18日，第27届联大的决议批准了这一要求。

1972年，作为西方国家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英国，与我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以保守党领袖希思为首的一批政界要人的访华，结束了两国长期以来的敌对状态，为两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契机。同时，在此前后中美关系的改善，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重返联合国等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的外交已由“燕子低飞”的困难时期步入了“凯歌行进”的新的时代。国际环境的改善，为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78年，共和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世界隔绝多年的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纪元。实现祖国统一作为新的历史阶段的三大任务之一，提到了共和国的议事日程

中国人民寻找已久、翘首期待的解决香港问题的“适当时机”，终于来临了！

九、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

尽管新中国政府对香港所采取的“长期利用，维持现状”的政策，使英国当局惶恐不安的心情得以缓解，但是，这种缓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解脱。因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香港毕竟是中国领土，毕竟是“借来的地方与时间”（这是一本英国人写香港的书的名字）。既然是“借来”的，最终总是要还的。英国政府虽极不情愿，但它现今所面临的对峙，既不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又不是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的国民党政府，而是强大的共产党政

府，这就促使他们必须接受这一痛苦的现实。这样，英国政府在刚刚摆脱了防务香港的烦恼后，随即又陷入了对香港前途忧虑的境况。

为了解除这种忧虑，在五六十年来，英国政府曾在港化大力进行了所谓的“归宿感”的宣传。“归宿感”要求香港的居民不要以过客的心情留在香港，而要把它视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把它当成自己的故乡。在这表面的言词之下，实际上的潜台词是：要效忠于女皇，效忠于香港的英国政府，不要胸怀异志地忠于祖国——中国，因为香港将来也是英国的。然而，从官方不断地强调宣传也可以看出，对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四百万人而言，“归宿感”却是十分稀薄的。

历史进入七十年代，随着1997年的日趋来临，香港的归属问题也渐渐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在香港的中外投资者，在两大强国迟疑不决之际，都做尽快归本的打算，而对长期性投资不感兴趣。在此期间，香港舆论关于1997年香港前途问题的报道和文章日益增多。凡此种种都表明，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为此，英国首先决定派人到中国进行试探，了解中国方面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意向。

1979年3月下旬，英国驻香港总督麦里浩爵士在首席非官守议员简悦强、港督政治顾问魏得巍（后任27任港督，改名卫奕信）的陪同下访华。29日，当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接见了他们。在会谈中，麦里浩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向邓小平提出，允许英国政府批出超越1997年6月的新界土地契约，把新界契约原本的年限规定，改为“在英王管治此区一直有效”。英国政府这一要求，显然是想通过各种办法将对香港的管治权超越出1997年。对此，邓小平给予严肃地拒绝。但他对麦里浩说：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

到了1997年，无论香港问题如何解决，它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投资者放心。

4月6日，在麦里浩回港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对记者说：我访华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接触能获得一个概括的印象，即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香港在中国的现代化计划中将担当何种角色，以及这种计划又将怎样影响香港。在此，他转述了邓小平的话，也将“请投资者放心”的话抛给了港人。

为解决香港问题中英双方“进行接触”已是必须面对的事实。此后，两国通过各种场合表露自己的观点。1979年5月，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在会见法国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明确指出：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当租约期满时，我们将以适当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针对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6月13日，英国下议院在就麦里浩访华一事辩论时，外交大臣毕力嘉也明确地表达了英国的立场：香港并非时代的错误产品，而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认为麦里浩访华的行动，并非意味着英国政府想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因为在现时还不存在一个“讨论香港问题的适当时机”。这个“适当时机”是什么时候，1980年英首相卡拉汉访华时说“两三年以后”。

于是，“两三年以后”的1982年1月4日到8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北京会见英国副外交大臣艾金斯时，代表中国政府系统地阐述了对香港问题的立场：（1）在较近的将来，中英双方进行讨论；（2）中国方面的态度将是合情合理的；（3）在作出正式安排之前，希望双方都不要做任何有损于香港经济繁荣的事。

赵紫阳的谈话，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回应。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着大批智囊谋士、新闻记者来到了中国，中英两国围绕香港的前途问题，开始了国际社会所说的“慑人心魄的反复较量”。

9月24日，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这两位被国际社会公认的铁腕政治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就解决香港问题正式摊牌。

撒切尔夫人的立场甚为强硬：中英谈判只有在承认“三项条约”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下去。

邓小平针锋相对：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同意英国延长统治，就有如过去李鸿章和清廷卖国贼以非法和无效的条约把中国领土割让给英国，中国肯定要收回主权，而主权包括治权；英国必须下旗归去，英国总督必须离去；中国政府唯一有权决定对香港未来的适当政策；不迟于一、二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

撒切尔夫人有备而来，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她切转话题，危言耸听地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将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邓小平面带微笑，平静地说：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尽管分歧如此大，但两位领导人还是达成了通过外交途径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的共识。

会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步出人民大会堂，一向举手投足极有分寸的她，在下台阶时忽然一个跟跄，半跪在地——“铁娘子”在福克兰战争中指挥若定的统帅风度安在？

在离开北京前回答记者提问时，撒切尔夫人说：“我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是友好的。我们承认有分歧，但是我们的共同目的大于分歧。”并进而明确表达了英

国政府的立场：“管理香港的条约，至今仍为国际法所公认，在双方未同意做出其他安排之前，英国将以条约处理香港问题。”

27日，在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撒切尔夫人又重申了“三项条约”是“有法律根据”的强硬态度，并向香港许诺：“我会承担作为英国首相相对香港的责任。”以争得所谓的“港人意愿”，增加与中国较量的筹码。

对此，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重申中国的严正立场：“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过去英国政府同中国清政府签定的有关香港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中国人民从来是不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不受这些不平等条约的拘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收回香港整个地区。中英双方都希望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为此将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

中英两国毫不隐瞒的分歧，给即将进行的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既然谈判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要走出阴影使前途明朗，就必须寻找到求同存异的契合点。

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对记者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包含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样一个富于想象力的概念

历史形势的发展，常常会超过人们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准备，而每当这种情况来临时，又往往是扭转局势的机遇。要抓住机遇，就必须改变自己的主观世界来重新认识不断变化的客观世界。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将从母体分离多年的香港重归祖国的“适当时机”来临时，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坚强决心背后所依托的心理和思想上

的准备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和平统一祖国的基本国策。

“一国两制”方针的产生，有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时间可追溯到1974年，当初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来的。这年10月，“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在会见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时说：解放台湾有和平方式和非和平方式两种，即使台湾解放，我们也不会把大陆的政策搬过去。1979年，邓小平在出访美国时，又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台湾的主张：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一提法了，只要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这应该是“一国两制”的最初设想。

1981年国庆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宣布台湾回归祖国的九项条件时说：台湾在实现祖国统一后，台湾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

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一位海外朋友时又说：“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至此，“一国两制”的概念，开始正式使用。

邓小平在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还将目光放在了香港和澳门。他说：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我们正在逐渐地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澳门也属类似的问题。

1982年9月，当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进行“慑人心魄的较量”时，正式提出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来解决中国收回香港主权问题的主张。他对撒切尔夫人说：这一设想不是随便提出来的，它的根据是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及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宏伟目标。说到这一设想的实行，邓小平很幽默地解释道：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马照跑，股照炒，舞照

跳”。中英谈判开始后，中国政府与英国谈判的12条基本方针政策，即是以“一国两制”的构想拟定出来的。

可惜，当时还陶醉在马尔维纳斯岛胜利的喜悦中的撒切尔夫人，殖民主义残梦的阴影未消，不愿正视这一现实。英国政府的谈判代表仍然坚持三项条约“有效论”为谈判前提，在遭到中方的驳斥后，又抛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致使中英双方近10个月的第一阶段会谈，一度陷入僵局。

对此，中国政府做出相应对策，敦促谈判继续进行。1983年6月，香港报纸披露，邓小平副主席在会见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代表时表示：中英谈判若于1984年9月尚无协议，中国届时将公布自己的解决方案。

这一消息的披露，在英国政府看来无疑是一张“最后通牒”，立即引起了英政府的惊慌。女王在国会年会上，不得不表示：“政府将会继续就香港前途与中国谈判，以期达成一项为本议会、中国及香港居民都能接纳的解决办法。”

但是，7月12日在北京重新开始的第二阶段的谈判，起初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因为英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幻想。这一方案的实质是：在英国放弃对香港名义主权的前提下，达成某种修改后的条约，以延长英国对香港的治权。英国振振有词地阐述了理由：第一，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的管治；第二，香港总督要代表500万香港人的利益和意愿。为了实现这一方案，他们精心构筑了一条“三脚凳”。

这是1982年12月10日，英国外交部及联邦事务次官贝尔斯特德在香港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他在回答记者“英国政府能否就中英谈判向香港发给一些信号”的提问时说：我们想要的是

一张三脚凳，第一只脚是可以为北京领导人接纳的；第二只脚是可以为英国国会接纳的；第三只脚是为香港人接纳的。抛掉一只，台就倒了。

“三脚凳”方案包藏的祸心是：在中英两国的谈判中，插进“香港”一条腿，再假香港人民之名，为谈判制造麻烦，为1997年后的香港设下障碍。中国政府当然不会容忍这种混水摸鱼的手段。所以，在中英第二阶段谈判开始前的7月7日，当港督尤德声称他将以香港总督的身份代表500万香港人参加谈判时，我外交部发言人严正指出：尤德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谈判只能代表英国政府。同样理由，外交部在9日拒绝发给以“港督私人新闻主任”身份赴京的曹广荣的入境证。

“三脚凳”虽然被关在了谈判大门之外，但是在谈判桌上，英方依然不改“以主权换治权”的老调，致使前4轮的谈判结束后，前景没有明朗转机的迹象。

中英谈判前途黯淡，导致香港政局不稳。1983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也认识到香港“正面临着重大的金融和政治动荡”的严重后果。为避免这种后果的发生，10月，撒切尔夫人捎来口信，表示原则上同意中方的12条方针。谈判步入正确的轨道。

1984年4月15日，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访问北京，对谈判的进展表示了关注。中英双方发表的新闻公报，向世人通报了谈判的明朗前景：“双方一致认为，会谈已取得了可贵的进展。”20日，杰弗里·豪在香港发表的声明更令人振奋。他说：“要达成一项使香港在1997年以后仍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目前英国的方针，“是与中国政府研究怎样可以达成会确保香港在1997年之

后，在中国主权下得到高度自治权，并且会使香港的生活方式及现行制度的本质得以维持不变的安排”。

历经1年多的谈判，英国终于正视了现实，真正将谈判落脚点放在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上。

在谈判紧罗密鼓进行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场合阐发“一国两制”的丰富内容，以期让世界了解中国政府的谈判诚意。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同来访的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曾经担任国务卿的布热津斯基谈话时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可以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不同，香港是自由港。

6月22日至23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说：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变。他强调指出：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是符合500万港人利益的。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随着谈判的顺利进展，英方也逐渐认识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在解决香港问题的巨大作用。7月27日，再度访华的杰弗里·豪由衷地说道：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策，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振奋人心的概念，它能够保持香港在1997年以前和以后的繁荣和稳定”。

中英双方既有如此共识，谈判也进入了顺利进展的阶段。8月1日，中英双方公布了成立联合联络小组的协议。这预示着中英双方最后协议的签定，已经为期不远了。

十一、英国政府在港散发的《白皮书》中说：《中英联合声明》，是两个主权国家所能达到的最高承诺

1984年9月5日，中英双方的第二阶段的第二十二轮谈判开始了。中方首席代表周南和英方首席代表伊文思握手致意后，周南意味深长地说：你到北京后，经过冬天、春天和夏天，现在已是收割庄稼的秋季了。伊文思含蓄地回答道：在英国，九月份也有一个庆祝秋收的节日。两位首席代表的画外音，意味着两年来的紧张谈判进入了“收获的季节”。

9月26日，周南和伊文思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草签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郑重宣告：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同日把香港交还中国。

周南和伊文思把盏举杯，共庆“丰收”，并向世界公布了这一“丰收”的喜讯！——中英谈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联合声明”草签后，中英两国依照各自的法律程序进行了审议。

1984年11月6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代表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的全部文件，连同以上报告和说明加以审议”。11月14日，六届人大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联合声明”。

1984年9月26日，即“联合声明”草签的当天，港英当局散发了英国政府《中英关于香港前途的协议草案的白皮书》。《白皮书》向

500万香港人郑重宣告：中英两国业已达成的协议，“是两个主权国家所能达到的最高承诺”；英国政府相信，“已成功取得一个符合香港人的需要和意愿的协议”。为此，《白皮书》强调指出：“为避免有任何误解起见，英国政府有责任清楚说明，除了接受本白皮书所载的协议外，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英国政府的意见是：要更改这份协议是不可能的。假如不接受这份协议，就会没有任何协议。”“这并不是英国政府设法强使香港人接受的选择，而是一项历史事实留给香港人的选择。”

10月9日，港英政府市政局会议通过接受关于香港前途协议草案并向市民推荐；18日，香港立法局经过三天的辩论，通过罗保动议，决定接受并向香港人推荐协议草案。

12月6日，“联合声明”协议草案摆在了英国下议院的桌上。经过6小时的辩论，下院批准；10日，上院在进行了5个小时的辩论后，一致通过。

沉溺了143年的“日不落帝国”梦，如今已是“梦醒时分”！

1984年12月19日，入冬的北京已是寒气袭人，但是，人民大会堂内却春意盎然。17时30分，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等中英领导人参加的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举行了。

赵紫阳和撒切尔夫人分别在铺着墨绿色绒布的长桌本国国旗一侧入座，代表两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上各自的名字。

“日不落帝国”在亚洲的最后一块殖民地，在撒切尔夫人的签名落笔后，永远从帝国的视野中消失了；英帝国主义欺凌中国的最后痕迹，在赵紫阳的签名落笔后，从此洗刷干净了。香港未来蓝图的新的——一页，由中国人民开始构画了。

1984年12月19日，成为彪炳

史册的时刻！

当天，邓小平同撒切尔夫人进行了会谈。与两年零三个月前来北京相比，撒切尔夫人重负已释了，因为香港的历史和现实使她摆脱了殖民地迷梦的羁绊，正视现实了。两位本世纪的风云人物的会谈，不再是“慑人心魄的较量”，而是平等、祥和的祝福了。邓小平所说的“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的话，也成为撒切尔夫人此刻的心声！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是这样评价这“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的：“在紧张的对抗不幸地笼罩着世界许多地区的时候，对香港未来前途的谈判取得成功，将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有效的、静悄悄外交的一项极为突出的首例。这是中英两国政府的智慧、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富有想象力的思考的胜利，对所有认为决心、政治意愿和建设性对话可以克服最难以逾越的障碍的人，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这“一项极为突出的首例”，首先“鼓舞”了葡萄牙政府。在中国政府提出收回澳门的问题上，葡萄牙政府采取了合作的良好态度。中葡双方只经过几轮会谈，便达成了协议。1987年4月13日，两国代表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将在1999年收回澳门的主权。

十二、英国殖民地史上屡试不爽的“政改方案”失灵了

1985年5月27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换文生效，香港开始了长达12年的过渡时期。

中国政府为忠实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在声明签署仅仅8个月

后，就开始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本着对历史负责，对祖国的统一大业负责，对几百万香港同胞负责的责任感，采取了一种不忘历史、尊重现实的求实态度。在起草基本法的条文中，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并广泛听取和吸纳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荣毅仁语）。经过4年8个月的努力，1990年4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诞生了；香港未来的政治蓝图日益清晰可见了。

1992年7月3日，“慕莲夫人”号横渡维多利亚港，送走了第27任港督卫奕信，10日，迎来了第28任港督彭定康。这年49岁的彭定康，是历任港督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第一位由职业政治家而非由殖民地官员或外交家出任的港督。

以一位职业政治家替代一位职业外交官而任港督，伦敦此举意味着什么？

前任港督卫奕信，为香港过渡时期的平稳，在中港英之间发展了和谐的关系，为人们所敬重。彭定康的到来，是为卫奕信时代画上句号还是继往开来？

正在人们为此关注之际，7月10日，彭定康在就职演讲中明确表示：在他任职期间，将为中英两国间建立彼此间的信任而竭尽所能。这就是说，他将为卫奕信时代继往开来。

然而，正当人们对他的这个言词中肯的演讲寄予厚望时，10月7日，彭定康却带着一副香港人的“救世主”的神态，抛出了令世人震惊的“政改方案”：《香港的未来——五年大计展新猷》。

尽管彭定康信誓旦旦地保证，“政改方案”都是在“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条文的范围内，尽量发展代议制度”，“所有建议都符合基本法的条文”，但是，熟知英国殖民地政策的人都明白，彭定康在“政改方

案”中所要“尽量发展”的“代议制度”是个什么货色。

在英国殖民历史上，每当要从一块殖民地“光荣撤退”时，几乎都要进行所谓的“政制改革”，在实行自治的一段过渡期内：首先民选立法机构，扩大立法机构的权力，成立“议会”，产生由当地人组成的政府；其次，逐步实行公务员本地化。这两步实施完毕后，总督撤退，在“还政于民”的幌子下，英国在殖民地独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着控制权。

英国准备将此法在香港炮制施行，不始于彭定康，早在中英关于香港谈判时即已有所表露。当中英谈判的落脚点聚集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时，英国即开始为其“光荣撤退”作准备，英国当局以“英国对香港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为名义，加速推行“代议制改革”。1984年7月18日，港督尤德在立法局会议上提出了《代议制绿皮书》；同年11月21日，就在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前一个月，《代议制白皮书》又出笼了。

然而，英国在其它殖民地屡试不爽的这一招数，在拥有强大主权的中国却行不通了。“代议制改革”一出笼，中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政制改革是英国搞的，中国将“不承担义务”。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也正式讨论了“代议制改革”问题，并一致同意将政制改革的落脚点，放在“香港政制应与1997年后保持连续性、注意前后衔接”这一基本点上。1985年11月30日，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发表的公报指出：“双方同意香港政制的改革和基本法衔接是一个重要问题。”

而彭定康都无视中英双方已达成的协议，在他所炮制的彭氏“政改方案”中，所包括的行政局和立法局分家、立法局1995年选举两大方面，从根本上超出了中英

“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范围。对此，中国政府立即表明了严正立场。

10月8日，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指出：我们注意到彭定康先生在他上任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中包括对香港现行的政治体制做出重大改变的内容，还注意到他对1995年立法局选举的一套打算。这些决定和“建议”都是在没有同中方磋商的情况下做出的，……我们对此深感忧虑。我们不能不严肃地指出，假使香港在后过渡期发生的任何改变不能同基本法衔接，其责任完全不在中方。届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其有关机构将按基本法和全国人的有关规定加以设立。

10月20日至23日，在彭定康上任后首次对北京的访问时，钱其琛外长毫不含糊地指责他：“政改方案”明显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有关规定和精神，违背了英方关于要使香港政制发展与基本法相衔接的承诺。

在彭定康离京之际，鲁平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政改方案”进行了猛烈抨击，并义正辞严地声明：我们认为目前双方的分歧的实质不是什么加快不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问题，而是究竟要合作还是要对抗。我们不愿意见到对抗，因为这对香港不利，但对方一定要对抗，我们也只能奉陪。

与此同时，10月28日，中国公布了中英双方就香港政制问题磋商的7份文件，将英方当时的承诺昭告天下。

从保证香港政权顺利交接的良好愿望出发，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从1993年4月至11月进行了17轮磋商，希望就香港1994、1995年的选举安排达成协议。在会谈中，虽然英方不断横生枝节，但中方为推动会谈仍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表现了巨大的诚意。但是，

英方已置“老牌绅士”的脸面于不顾，在1993年12月初，港督彭定康在中英关于香港政制会谈尚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悍然宣布将其部分选举方案公诸香港宪报并提交立法局审议。

彭定康把自己推到了悬崖的尽头。中英谈判破裂了。

在我们的文章问世的1月，中英“联合声明”签定已11周年了。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块牵动世界炎黄子孙的“倒计时”牌，所显示的时间已不足20个月了。

11年来，尽管英国出尔反尔，为中国政府接管香港主权设下重重障碍，但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香港的回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11年来，为了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中国政府为中英合作付出了真诚而艰巨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虽然世界的炎黄子孙希望英国成为“迷途知返的羔羊”，揭开香港前途上再一次蒙上的这层阴影，但决不为香港卜问前程。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讲：中国敦促英国执行联合声明，不是把香港平稳过渡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中国政府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包括依靠六百万香港同胞的力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恪守中英联合声明的坚定决心，已向世界展示了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光明前景。

据有关新闻媒介报道，1997年7月1日香港各大酒店、宾馆的客房都已被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订满了，很多人为能目睹解放军进驻香港、香港主权移交这一历史盛会而自豪。

1997年7月1日，炎黄子孙期盼的历史时刻！世界瞩目的历史时刻！

（责任编辑 洛松）

五、六十年代关于道德继承问题的

大讨论

● 张国春 牛京辉

1956年至1965年，可谓我们共和国史上的一段“多事之秋”。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十年间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四清、五反等一系列大规模的运动。这期间，学术界曾就道德继承问题开展过两次激烈的讨论，一次因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而起，一次由吴晗的“批判继承论”而发，这两次讨论表面上集中于道德遗产的继承问题，但深层触及到社会主义新文化、新道德的构架和走向，因而引起了当时学术界及社会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应是当代中国哲学史、伦理学说史上有书必谈的一段史话。

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识界疑云渐逝

历史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1955年末，即将完成的农业集体化和正在大力推进的工业化运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预见到社会主义建设越来越需要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的积极参与。1955年12月3日的《光明日报》写道：

“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势要求知识分子，特别是有学术地位和专门技术的高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

但是，由于当时反胡风运动过于猛烈，许多知识分子对这种号召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对此，1956年党采取了一些有力步骤，解放知识分子的思想。

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说：经过建国后六年来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为此，周恩来主张，实行某种改革，以激发知识分子的热情，重视知识分子的专业研究，尊重知识分子的学术观点，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待遇，毛泽东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赞同周恩来的观点，并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了这一方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5月26日作的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作具体阐释：

“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的讨论，那末，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

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

他允诺给知识分子在艺术、文学和科学上以批评、言论、坚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这些领域的活动不能跟政治等同起来，要鼓励文化领域中的辩论，使知识分子在选择研究课题和方法论中有更多的活动余地。

中央的一系列工作，使许多知识分子逐渐消除了疑虑，学术空气开始活跃起来，学术争鸣不断出现，各种学科都开始了重要的辩论：遗传学界辩论李森科主义；历史学界讨论分期问题；而在哲学界，则围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用、哲学遗产的继承等问题展开了大讨论。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及有关的讨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并展开的。

冯友兰，是当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哲学大师之一，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的一个“诗礼之家。”1915年——1918年就学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涉入哲学领域。1919年赴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当研究生，师从新实证论者孟太格。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回中国。回国后，先后在中央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执教。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因创立新理学体系而蜚声学术界。冯友兰在《三松堂学术文集》序中说：“我在一九一五年到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

1957年，冯友兰对“这一类问题”，开始了“正面解决和回答”。

当时的哲学史研究领域，一方面由于新中国诞生后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占据主导地位而显示出一股除旧布新之势，另一方面，由于受苏联哲学史研究思想的影响而出现了一股简单化、贴标签的风气：其一是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简单化理解，只讲排斥和斗争，不讲影响和渗透；其二是对中国传统哲学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简单否定过多，全面分析不够。针对这一情况，冯友兰提出了他的“抽象继承法”，强调继承中国传统哲学遗产。由于其内容本身涉及许多道德问题，因此，又被伦理学界称为“道德抽象继承法”。

二、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1月8日的《光明日报》发表的《中国哲学遗产

底继承问题》一文中，冯友兰说：

“我们近几年来，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中，对中国古代哲学似乎是否定的太多了一些。否定的多了，可继承的遗产也就少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作更全面的了解。”

“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的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过去我个人，对中国哲学史中的有些哲学命题，差不多完全注意它们的抽象意义，这当然是不对的，近几年来，我才注意到这些命题的具体意义。当然，注意具体意义是对的，但是只注意具体意义就不对了。在了解哲学史中的某些哲学命题时，我们应该把它的具体意义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跟作这些命题的哲学家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况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它的抽象意义也应该注意，忽略了这一方面，也是不够全面”。

那么，什么是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呢？冯友兰解释说：

“比如：《论语》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这句话的具体意义看，孔子叫人学的是诗、书、礼、乐等传统的东西。从这方面去了解，这句话对于现在就没有多大用处，不需要继承它。因为我们现在所学的并不是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从这句话的抽象意义看，这句话就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及时的、经常的温习和实习，这就是很快乐的事，这样的了解，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对我们现在还是有用的”。

冯友兰还结合对古代思想家的某些伦理命题的分析，间接地阐述了他的道德继承观。他说：

“《庄子·胠篋》篇中说：‘盗亦有道：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此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在当时的统治阶级看，跖是一个大盗；在农民看来，他是农民起义的领袖。这一点我们现在不论。专就庄子这一段话讲，他的意思就是把仁义道德看成象刀枪等武器一样，谁都可以用，仁义道德可以为统治阶级服务，也可以为反抗阶级服务。他认为仁义道德就是一种组织力量，谁想组织起来，谁就用它，不用不行。谁用它它就为谁服务。《庄子》的这段话，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以说明哲学思想中，有为一阶级服务的成分”。

这篇文章的内容，后来被称为“抽象继承法”。

第一次把冯友兰的这种观点名之为“抽象继承法”的是吴启启的《从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看他的哲

学观点》，关锋认为这符合冯友兰的意见的本质，于是在他的《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一文中沿用了这一说法。之后，这一名称逐渐被哲学界所采纳。虽然冯友兰在其后的自我批评中也使用过这一名称，但他并未真正认同。他认为他的文章之所以引起批判或者误解，是由于“抽象”这个词的严格的哲学意义没有先说清楚。“把我的主张名为‘抽象继承法’就是要利用人们对于抽象的这种混乱的理解，以说明我的主张的荒谬和不可能，这也是戴帽子的一种办法。”（《三松堂自序》）。

鉴于人们对于抽象和具体这两个词有混乱的理解，但是对于一般和特殊这两个词的理解比较清楚，所以冯友兰接着在《哲学研究》1957年第五期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的文章，承认自己有些提法不妥，调换了一些名词，将“抽象意义”、“具体意义”代之以“一般意义”、“特殊意义”，但观点没有改变，且进一步作了较全面的阐释。

其实，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这种观点冠之以什么样的名称或一两个名词，而在于其内容本身。冯友兰的这种道德继承观是他对待传统道德遗产的一贯思想。在他哲学思想发展的前期，曾提出过“不变的道德和可变的道德”这样的命题。抗战末期，他以《可变的道德与不可变的道德》为题，作过多次讲演。其所谓不变的道德是超阶级超社会的，可变的道德是有社会性、阶级性的。在晚年所写的《三松堂自序》中，他仍坚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

“道德是随着社会而有的。社会是人的组织，如果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如果没有社会，就没有道德。……社会有各种不同的组织这就有各种不同的社会，比如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不同的社会。但是它们都是‘社会’，它们的组织不同，所以也有不同的道德。说不同的社会涵蕴社会，或者说社会发展为不同的社会，无论用哪种说法都可以，但是无论用哪种说法，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那就是有些道德是跟着社会来的，只要有社会，就得有那种道德，如果没有，社会就根本组织不起来，即使暂时组织起来，最后也要土崩瓦解。有些道德是跟着某种社会来的，只有这一种社会才需要的，如果不是这种社会，就不需要它。前者我称之为‘不变的道德’，后者我称之为‘可变的道德’。我的企图并不是要把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一套’道德‘都’当作不变的道德，正好相反，我的企图是要把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一套道德，加以分析，看看哪些是随着封建社会社会而有，所以是可变的，哪些是随着社会而有，所以是不变的。所谓不变，也并不是专靠什么人说的，靠的是它本身的作用，谁要硬要变它，谁的社会就会有土崩瓦解之。”

冯友兰的两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轩然大波，一场热烈的讨论由此而展开，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积极地参加了这次大讨论，有的单位还进行了有组织的活动，较集中进行的，有1957年1月间在北大哲学系召开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1957年5月间在北大又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哲学研究》编辑部还编辑了《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于1957年7月出版，汇集了许多有关文章，推动了讨论的深入进行。

冯友兰的观点，既赢得了一部分人的支持或对他观点的部分赞同，也招来了许多人的批评。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抽象意义”以及“抽象”与“具体”关系的理解；二是由“抽象继承法”而引出的对哲学遗产、道德遗产的继承方法、标准、原则、立场等重要问题的看法。

“抽象”是冯友兰文章中的核心概念，当时人们对这个概念理解并不一致，而冯友兰本人也没有明确地界定其哲学内涵，只是凭借例子来说明，这是引起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冯友兰稍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在《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中用“一般”和“特殊”代替了“抽象”和“具体”，但并未收到预期效果，批评者认为前后无大差别。对“具体意义”，冯友兰在第一篇文章中指出它“与提出这些哲学命题的哲学家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况有直接关系”。晚年的冯友兰指出，一个哲学命题实际上应该排斥具体意义，它只具有抽象意义，“具体意义”不过是一个哲学命题在实际情况中的应用，或是人们对它的不同了解。由于这些提法本身有不妥当之处，所以在当时的辩论中，他自己也觉得难于自圆其说。

在对冯友兰“抽象”观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学者们对哲学遗产、道德遗产继承问题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充分的探讨。

很多人都指出，“抽象继承法”是从“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寻找好东西’并现成地拿来使用”这个前提出发的一种继承方法，这种方法容易产生教条主义，忽略对古代哲学家或某一哲学学派作全面的研究，而走到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地步。它撇开了哲学的理论体系、思想实质，把命题的形式绝对化，将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归结为对哲学命题的意义的理解问题，从而把那些该继承的遗产加以抽象化，结果只有使丰富的哲学遗产显得苍白无色。因此，这样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如何继承哲学遗产的问题”。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也承认这一批判有合理性，认为“把哲学的继承归结为对某些命题的继承”是不妥当的，应当是对体系的继承，“离开了体系，命题就显得单薄、空虚，而且对它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容易作出误解”。

更多的批评者指出，冯友兰划分抽象意义和具体

意义、继承命题的抽象意义的主张并不能为继承哲学遗产提供简单可行的方法。因为在中国古代哲学命题中,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很难确定其应否继承的标准;另外,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离开了其具体意义,所谓“对现在还是有用”往往导致牵强附会地联系现实,甚至庸俗化。因此,“抽象继承法”在运用中难免有主观随意性的错误。而且,很多人指出,继承哲学遗产、道德遗产的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新道德,所以,在继承问题上,精华与糟粕的区分标准,不是冯友兰所说的具有一般性与抽象性的东西,而是具有民主性、科学性、大众性的东西。对待哲学遗产,应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肯定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否定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因素。

有的批评者指出,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将继承性与阶级性对立起来。这方面的批评主要集中在道德的阶级性的认识上。论者认为:判断一个道德命题能否继承,要看它的阶级内容,社会主义时代能继承的道德是具有人民性的道德,如果道德的继承只是抽象而普遍的概念,势必要达到否认道德的阶级性的结论。冯友兰在后来的文章中,虽然也修正自己的主张,认为要继承中国哲学史中有人民性的内容,但仍回避谈道德的阶级性问题,并且认为,“这个方法(抽象继承法——引者注)底应作,并不需要预先决定,在哲学遗产中是否有可以为各阶级服务底成份,这是另一个问题”。事实上,冯友兰一直坚持他的“可变的道德与不可变的道德”的主张。

现在回过头来看冯友兰的这一主张,在当时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某些局限性。

一方面,冯友兰提出分别传统哲学、伦理学命题的双重意义,强调继承其抽象意义,其出发点旨在反对对传统哲学、传统道德的虚无主义态度,无疑具有纠偏作用,而且,就其理论和方法来说,也颇有启发意义,揭示了理论新旧交替的一个侧面。揭示了传统文化继承方法的一个侧面,具有其合理的一面。

但是,抽象继承法确有其理论的局限性,第一,它脱离哲学家的哲学体系讲继承命题的抽象意义。历史上每个重要的哲学家对当时的哲学问题、道德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都有自己的宗旨,并且从多方面进行阐明和论证,由此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因此,一个哲学体系、伦理学体系固然可以归结为几个重要命题,但是,只有结合体系才能真实把握这些命题的抽象意义。脱离了体系,一个命题往往可以作多种解释,甚或截然相反的解释。这样便会造成对命题本身的误解或歪曲,继承就有了一种主观性、随意性的色彩。第二,抽象继承法脱离人的认识发展来讲抽象意义,因而也不能讲清一个命题的抽象意义的逐渐展开、深化

的过程。实际上,有些抽象意义在某一阶段的哲学家那里是不自觉的、潜在的,后继者才自觉地揭示这一命题所潜在的抽象意义而加以发挥,同时克服这一命题本身的局限性,如此层层推演、发展,而发展的基点始终是社会实践。冯友兰抽象继承法重视命题之间的承接,而忽略了基于实践的发展而展开的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这样,抽象继承法就失却了坚实的基础,至少说,没有完整地描绘人类思想联系、发展的图景。

三、毛泽东对冯友兰说: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

这次讨论的各方都强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许多人还把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作为自己观点的支点,但一向对哲学感兴趣的毛泽东本人对讨论过程并未作评论和干预,只是采取了一种热情关注和宽怀观望的态度,而且在许多场合给冯友兰以特别的关照和鼓励。

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曾邀请冯友兰和金岳霖、郑昕、贺麟、胡绳等参与此次讨论的学者到中南海颐年堂共进午餐、讨论学术。当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冯友兰应邀参加,并在分组讨论中和毛泽东分在一组,毛泽东一见冯友兰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种招呼方式幽默而亲切,说明毛泽东细读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这篇文章。会间,毛泽东叫冯友兰发言,冯友兰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

冯友兰说:“照现在的讲法,有些很难讲通。”

毛泽东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

在散会的时候,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

“好好地争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但是,毛泽东鼓励冯友兰的“最高指示”,并没有使他摆脱挨批判的命运。因为转过年的1958年,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带来的自由的学术讨论,即逐渐被有浓烈火药味的大批判所取代。

1958年1月,关锋发表《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2月,吴传启发表《从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看他的哲学思想》,这一系列文章开始将冯友兰“抽象继承”的观点与他的“新理学”联系起来作为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和修正主义进行批判,学术分歧上升为中国哲学史工作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学术探讨转变为意识形态的批判,影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1958年3月10日,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谈哲学、社会科学如何适应大跃进的政治形势,他

指责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主要缺点是，“言必称三代（夏、商、周）”。陈伯达要求高等院校文科发动广大师生批判教学中的所谓“厚古薄今”的“资产阶级倾向”。此后，北大哲学系7月间召开两次讨论会，批判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和其他哲学思想。其他一些单位的哲学系、所也召开会议或汇集文章集中批判。当时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反对抽象继承法的运动，一边倒地冯友兰的思想进行批判。冯友兰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措辞逐渐强硬、严厉的批判，也写了《批判我底抽象继承法》一文。文中，冯友兰把此间主要的指责全部包揽下来，他承认“抽象继承法”是“新理学”幽灵的再现，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修正主义，是用个别与一般割裂的诡辩术来说明道德的超阶级、超时代的永恒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挑战。1958年底的一篇学术观点综述对此文的反应是：“问题不在于对自己扣很多帽子，显得‘沉重’和‘严肃’，而在于要端正态度，老老实实地彻底地改变过去的立场和观点，否则割不尽的尾巴，遇有适合发展的场合和气候又会重新露出来”。从中可见冯友兰在讨论后期的处境。不过这篇文章后半句话倒是说对了。冯友兰虽然被迫做了自我批评，却一直未放弃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思想。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1962年11月召开的孔子研究会上，他又提出关于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的问题，当时有人评论说这是“抽象继承法”的新版。

1959年《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陈伯达的文章《批判的继承与新的探索》，对冯友兰的观点和这次讨论作了实质上是定性、定调的发言。陈伯达说：

“有些人，他们倒不去搞许多烦琐的考证，却是在继承历史遗产、文化遗产的名义下，在玄虚中绕圈子，把古代加以现代化，把现代加以古代化。例如冯友兰先生曾以提出所谓‘抽象继承法’，在实质上就是这样。……在这种所谓的‘抽象继承法’里面，倒真正有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蕴藏着一种具体的复古主义，即企图经过某种形式保留中国历史上的唯心论体系，企图把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一套道德都当作永恒不变的道德。”

这种将学术观点作政治的引伸，将自己的臆想强加于人，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的恶劣做法，使一向恢宏大度的冯友兰也极为愤怒。

冯友兰后来指出：“陈伯达所说的‘抽象继承法’的真正具体内容，倒是有一半对，有一半错。对的那一半是，我确实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有些道德，从其抽象或一般的意义说是不变的道德。不对的那一半是，我没有说，也没有企图，把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一套’道德‘都’当作不变的道德”（《三松堂自序》）

尽管“抽象继承法”被定了性，冯友兰作了“自我批判”，但当时的学术争论毕竟还没有过多地染上政治批判的色彩。所以，与下文我们将提到的六十年代那场争论的主角——吴晗相比，冯友兰要幸运得多。

1964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冯友兰作了一个发言，讲了一点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和将来的计划。当时的执行主席是陈毅。事后有人告诉冯友兰，说陈毅认为他的发言很好。闭会的那天，毛泽东和中央全体领导接见到会的委员并在一起照相，冯友兰恰好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就座的时候看见冯友兰，便拉着冯友兰的手又问起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情况。

毛泽东说：“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吧。”

冯友兰说：“我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

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

说到这里，刘少奇插言说：“你的发言很好，言简意赅”。

周恩来也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一次开会，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铭任老是他的岳父，孙维世是任老的外孙女，是第三代。”

冯友兰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在这一次谈话中，无论是就谈话的内容或谈话的态度说，毛泽东都好像是对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回家之后，冯友兰即赋诗一首来表达他当时的感怀：

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

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

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这段史话，冯友兰均写入了他的《三松堂自序》。

及至六十年代初，当吴晗提出他的道德批判继承观的时候，伦理学界又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讨论——关于道德的继承性和阶级性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表面上看与上次讨论没有直接联系，讨论的主题与人物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本质上是上次讨论的继续。所不同的是，吴晗既不敢有冯友兰“两派史论待衡量”的想法，更没有“愿随日月得余光”的奢望了。

四、再次强调“双百”方针： 吴晗领衔推出《三家村札记》

1957年开始，经过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诸次政治批判和思想改造运动之后，进入六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度陷于消极被动之中。针对这种情况，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中央文艺座谈会上指出，“现在

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几年来有一种作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例如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这种风气不好,要把这种风气反过来”。周恩来说:

“总之,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允许有不同的意见,这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才有心情舒畅,实现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造成这样一种空气,收到这样一种效果。”

7月19日,中央在对聂荣臻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作出的批示中强调,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

这标志着,党希望给知识分子造成较宽松的气氛,同时严格划分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的界限,鼓励他们对于学术问题进行深入、自由的讨论,身为北京市主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的吴晗,应党中央的号召,写出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

吴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生于1909年,早在解放前,吴晗就以著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和爱国的民主主义斗士两项赞誉而闻名于国人。1949年,吴晗作为民主同盟的成员,响应毛泽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携夫人辗转进入解放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和热情鼓励。北平解放后,吴晗重返清华大学,担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49年11月,吴晗被选为北京市副市长,主管文教工作。

1961年9月,吴晗应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的约请,同邓拓、廖沫沙一起,以“吴南圣”为笔名,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至1964年7月专栏结束,近3年的时间里,吴晗共写了21篇杂文,这些文章讨论现实问题、学术问题,多以鲜明的阶级观点,以强烈的无产阶级爱憎观和是非观,批评现实生活中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因素,颂扬了那些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积极因素。

在《说道德》、《再说道德》两篇文章中,吴晗提出了后来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

“……道德是阶级的道德,道德是随着阶级统治的改变而改变的,但是,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无论是封建道德,还是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都可以批判地吸收其中的某些部分,使之起本质的变化,从而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生产服务。”

这一观点就是吴晗在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

上的基本观点,后来被称为“道德继承论”,吴晗本人则始终认为自己的观点应称为“道德批判继承论”,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观点与吴晗历史研究中的其它思想是互相联系、一脉相通的。

作为历史学家,吴晗一向重视历史遗产的继承,注重古为今用,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分析研究中吸取有益的成分,1959年,毛泽东在4月份的上海会议期间提倡研究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根据这一指示开始研究海瑞,很快写成《海瑞骂皇帝》,发表在同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1960年底,七易其稿,改写成京剧剧本《海瑞罢官》。剧中赞扬、宣传了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品质。其后,吴晗发表的多篇评论历史人物的文章,如《文天祥的骨气》、《况钟和周忱》、《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等,都称赞了古代社会中出现的一些民族英雄、清官、忠臣,认为他们所具有的美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值得今人学习的。在1961年至1966年间,吴晗参加了关于历史剧真实性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史和论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大多是由于吴晗的文章所涉及的观点引起的,在这些讨论中,吴晗坚持了对历史遗产、文化遗产进行批判地客观地分析、研究,取其精华,为今天服务。这样一种基本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在《谈框框》一文中说的:

“空谈打倒一切旧的,是没有意义的,旧的必然灭亡,新一定成长,要善于批判地去继承发展,必须重视新生事物,但对旧的也要分析研究,区别对待。”(见《光明日报》1962年2月3日)

道德批判继承论,正反映了吴晗从历史研究角度对道德继承问题的思考,他在《再谈历史剧》一文(《文汇报》1961年5月3日)中也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

五、三说道德,吴晗慨叹:道德继承是最苦恼、最想不通的问题

吴晗的《说道德》、《再说道德》两篇文章后来收入杂文集《学习集》,于1963年出版,同年8月,许启贤发表了《关于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的一些问题》一文,对吴晗文章中有关观点进行商榷,吴晗立即写了《三说道德》作为答复,以此为契机,一场关于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的讨论全面展开,

从1963年8月到1965年间,讨论比较激烈,虽然观点有分歧,但从学术角度看,论者比较一致地主要涉及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一)怎样理解“阶级的道德”?在阶级社会有两种道德,还是只有一种道德?

吴晗在《说道德》中指出,“所谓阶级的道德就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它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统治阶级的道德论在一般情况下,也就成为被统治阶级的道德论,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了。”

参加讨论的人几乎都不同意这段话,在阶级社会中,所谓阶级的道德,既包括统治阶级的道德,又包括被统治阶级的道德,而不只是一种道德。

吴晗在《三说道德——敬答许启贤同志》中解释说,他对于阶级社会存在两种道德一说也是赞同的,但他进一步强调,统治阶级的道德与被统治阶级的道德之间可以相互吸收对方的某些道德作为自己阶级的道德,这一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它涉及此次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二)两种道德——统治阶级的道德与被统治阶级的道德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在这一问题上,很多人不同意吴晗的关于两种道德可以“相互吸收”的观点,有人指出,由于阶级道德所反映的阶级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不可改变的,因此,对立阶级的道德之间只能是相互斗争的关系而不是别的;不能将对立阶级的道德观对彼此阶级的成员个人的影响,混同为两种对立阶级的道德观之间的影响。

也有人部分地同意吴晗的观点,如王熙华在《统治阶级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中认为,“两种对立阶级的道德都包含有维护对方阶级利益的道德成份”,“统治阶级的道德不仅可以批判继承,而且批判继承是为今天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务的”。王熙华的上述观点受到一些论者的批评,他又写了答辩文章进行讨论。

(三)历史上统治阶级的道德能不能继承?哪些能继承?怎样继承?这是讨论的焦点所在。

吴晗认为,无产阶级应当善于吸收过去统治阶级某些优良的东西,这是完全必要的,他认为,封建社会道德的某些部分,有值得今人批判地继承的地方,“例如忠,过去要忠于君主,今天呢,难道不应该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如孝,对父母要好,父母年老,丧失劳动力了,子女难道不应该照顾父母?”,“至于诚实、勤劳、勇敢、刻苦、耐劳、雄心壮志这些美德,难道不都可以移在今天?”,“不止是封建道德,就是资产阶级的道德,精打细算,多方赚钱,难道不应成为管理企业的一条重要原则?”又比如“民主”和“自由”,“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而起着本质的变化”,无产阶级也是可以继承,拥有属于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在另外的文章中,吴晗指出,对于“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些旧时代的道德都应该批判地继承、应用于今天。

当时很多文章一致认为封建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都不能继承,许启贤在原则上肯定了“要批判地继承剥削阶级的道德”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同时认为,封建道德的“忠”和“孝”是不能继承的,忠于君主的目的为维护和巩固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封建秩序服务的,与今天的爱国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孝”实际上是忠君思想在封建家长制家庭成员关系上的一种体现。至少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多方赚钱”的道德,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道德原则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从道德方面讲也是不能继承的,李之畦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所讲的人民的民主,和资产阶级所讲的资产阶级民主之间除去“民主”两字之外究竟有什么继承的联系呢?她认为,把道德概念和当时的阶级实际割裂开来研究道德的继承问题,就“只能陷入抽象的继承和道德的永恒论”。

赞成吴晗观点的人,如江峰撰文指出,“历史上统治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主要的道德规范,其根本观点,是不能继承的,应当全盘否定,但是,除此而外,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统治阶级中某些思想家,历史人物所留下的个别思想材料中,有些东西我们还可以借鉴、可以批判地吸收。”华山也是认为,岳飞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可以批判地继承的,他指出,“有人一方面承认岳飞的爱国主义对我们还可以起很大的鼓舞作用,同时又说这是封建道德,是有毒素的,是不能继承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如何能使人信服呢?”

(四)无产阶级道德是从哪里来的?无产阶级究竟到哪里去吸取自己的道德观点?

吴晗认为,“无产阶级若不善于吸取过去统治阶级某些优良的东西,甚至完全摒弃,那么,看来只有向古代的无产阶级继承,或者自己来凭空创造了,问题是在古代,无产阶级并不存在;自己凭空创造呢,也不大可能……”王熙华也指出,如果认为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的道德都不能继承,则是一种对待道德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

大部分人对吴晗和王熙华的观点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是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和自己的斗争经验中,而不是从师承过去统治阶级的东西中产生出自己的道德观念的,因此,我们的任务主要不是从故纸堆中去寻章摘句,到古人那里找无产阶级道德的来源,而应该把精力集中到无产阶级自己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中来,从刘胡兰、黄继光、雷锋等英雄模范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中,去发现无产阶级本身的高贵的道德品质,从理论上加以系统的研究、总结和提,有人指出,对于剥削阶级的道德,是应该从根本上批倒、剔除的问题,而不是继承的问题,还有人指出,无产阶级坚决摒弃历史上统治阶级的道德,但是并不拒绝历史上劳动人民的

优良道德传统，因此，“对道德遗产的虚无主义”一说是没有根据的。

客观地说，在这次道德问题大讨论中，多数学者都是以热诚的态度积极参与，尤其是在1963、1964年间，讨论及了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的许多重要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益的问题。

吴晗本人提出的道德批判继承的观点，主张对道德遗产采取具体分析、批判继承的态度，有其合理性；但是，吴晗的观点缺乏系统严密的说理、阐述，因而很容易招致各种误解和曲解。另外，在讨论中使用的一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均未得以明确廓清，争论双方都是从各自立场出发，各有理解，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以致于吴晗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道德继承问题，是他在六十年代初参加的学术争论中“最苦恼、也最想不通的问题”。就连姚文元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中也说，“我们不在这里谈道德问题”，“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冯友兰曾提出一种分析方法，他在四十年代写的《新事论》一书指出，“忠、孝”均是“可变的道德”，会随着社会组织的变化而变化，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孝”是一切道德的中心及根本；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现代社会中，“孝”虽然也是一种道德，但已不再是一切道德的中心及根本，只是一种一般的道德，“忠”也是如此。冯友兰的这种分析重在说明，旧的伦理道德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其地位、作用程度和范围也产生变化；既不是完全丧失生命力，也不是全然不起任何变化，这一观点有其可取之处，吴晗恰恰在这一本该讲清楚的地方，没有明确指出，因而引起众多批评。

批评吴晗观点的人，强调新旧伦理道德之间的区别，也是合理的，但是其立论的前提是，夸大伦理道德的阶级性，用以涵盖道德本身具有的其他丰富的特性。从这一前提出发，他们所注重的是“忠、孝”道德所依附的社会结构的属性，因而社会结构的更迭，必须导致对旧的“忠、孝”道德本身的否定，这种泛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当时社会的一个通弊，它造成对待传统文化、传统伦理道德态度中的“否定太多，因而可继承的太少”那样一种局面。

六、《海瑞罢官》连“道德”，吴晗惨死“三家村”

这场讨论虽由吴晗文章中的观点引发的，但实际上，吴晗写完《三说道德》后，就不再参与，余下的讨论是在有关专家学者中间进行，然而讨论的收场却与吴晗绝对相关，并因为他的剧本《海瑞罢官》所引起的

某些人特殊的政治联想而倍受牵连。

1965年11月11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用阶级调和论代替阶级斗争论，并无中生有地将剧中“退田”、“平冤狱”等情节，与1961、1962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认为《海瑞罢官》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株毒草。

姚文元的文章引起广泛的震动，因为此前中央有规定，点名批判应经过政治局常委批准，而此文却是在政治局成员除毛泽东外，无一人知晓的情况下，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手炮制的，其政治意义非常明显。

11月29日、30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批示下转载此文，并加了由彭真和周恩来分别审阅定稿的编者按，《人民日报》按语强调《海瑞罢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办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北京各报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后，开始就此问题展开讨论，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市委书记邓拓以“向阳生”的笔名写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从学术角度对《海瑞罢官》作了批判，文中称“道德继承论”是《海瑞罢官》的错误思想基础，文章最后特别提出，希望吴晗能够继续参加讨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按照“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并说，“如果这样做了，那末，我相信不管发生多么复杂的问题都是可以弄清楚的”。向阳生的文章试图将对吴晗的批评限制在学术争论范围内，其后，吴晗于12月27日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刊于《北京日报》），他一面在史料或观点上对姚文元文章进行驳斥，一面违心地就一些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他也提到在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上，“有时糊涂”，“强调封建道德也可以批判地继承，犯了绝大的错误”。

吴晗的自我批评未起多大作用，因为康生已从政治方面发现“问题”。他将《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毛泽东也肯定了《海》剧的要害是“罢官”，于是《海》剧有成为直接代表彭德怀等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严重政治问题，学术批判很快向着剑拔弩张的政治批判发展。

此时的吴晗仍希望能够象向阳生提醒的那样，在学术争论范围中，专就道德批判继承问题进行自我批评，1966年1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他的《是革命，还是继承？——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文中对向阳生和许启贤（许文见《光明日报》1965年12月24日《对立阶级道德相互“接受”论的实质何在？》）的批评，

“诚恳地接受”，并表示“深切的感谢”，吴晗将他从1962年上半年到1963年4月五年间所写的有关道德问题的文章，讲话中的主要观点一一列出，做了自我批评，但他不承认自己的道德观点全部都是错误的，他说，“我对阶级道德的看法是混乱的，认识不清的，错误的，有的地方说对了，有的地方又错误了，有的开头对了，末后却又错误了”。吴晗指出自己一系列错误的根本出发点，归根结底是个立场问题，他说，“我的思想深处，却无论如何不肯对忠、孝、节、义这些封建道德名词割爱，硬把社会主义时代的道德品质，塞进封建时代的道德名词里去，不只是名实不符而已，严重性在于把革命和继承混淆了，把应该打倒的东西，用继承的手法使它复活，混淆了阶级界限，混淆了是非概念，后果是十分有害的。”

署名严问的《评吴晗同志关于道德问题的“自我批评”》很快见报，指责吴晗“在自我批评的形式中保护自己的错误观点”，认为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本身的错误实质在于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受苏联二十二大提出的超阶级的全民道德说的影响，是国际阶级斗争的反映；并且是具有严重政治意义的，带有系统性的资产阶级理论，这篇文章，同向阳生的文章一样，在当时“山雨欲来，黑云压城”的政治气氛下，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作了不恰当的批判，即便是这样，在后来日渐升级的政治批判中，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仍以对吴晗假批判，真包庇”的罪名攻击《北京日报》，邓拓（向阳生）本人也在政治批判中含冤自尽。

关锋、林聿时发表的《评吴晗同志的道德论》（见《哲学研究》1966年第一期）应该算是这场以政治批判收场的道德讨论中最后一篇，除了政治帽子之外，多少还有点理论色彩的批判文章，关文在对吴晗的道德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后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彻底摒弃地主阶级的旧道德，才可能发扬无产阶级的新道德。文章饶有兴趣地“温习”了“中国近代革命史，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史”，指出，从曾国藩、袁世凯等人的尊孔复古，到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中国国民固有的道德”的提倡和宣扬，“每一次封建道德复辟活动，每一次复古尊孔运动，都是反动阶级政治复辟运动的先导，都是对前一次革命运动的反动”。关文认为，吴晗的道德论正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

此后见诸报刊的多是学术界以及其它各界群众对吴晗道德继承观及其毒害性的一致声讨，其中的一些牵强附会之处令人啼笑皆非。

不久，对《海》剧的批判，对“道德论”的批判很快发展为对“三家村”的批判，发展为横扫全国文艺领域的大批判运动，吴晗之后，又揪出邓拓，锋芒直指北

京市长彭真，继而矛头又指向“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

吴晗再也没有申辩的权利和机会，他在遭受两年多的揪斗、折磨后，于1969年1月10日惨死狱中，吴晗夫人袁震和养女小彦也先后被迫害致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在文艺界的一次座谈会上，又借谈批判继承问题而提出“扫荡一切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习惯”的口号，大搞文化虚无主义和道德上的虚无主义，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一度成为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禁区”。直到八十年代初，伦理学界才又重新就道德继承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纵观这两次论战，其中涉及了社会主义新文化、新道德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即如何处理好古今、新旧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怎样对待文化道德遗产的继承问题，自“五四”运动以来，这一直是个重要问题。虽然建国之初，就已确立批判地继承，古为今用，去粗取精等方针，但在实行中仍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五、六十年代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将无产阶级与一切旧阶级在阶级属性上的彻底决裂简单地移用到文化继承中，出现一种主张否定传统、摒弃旧文化的倾向，一些知识分子主张的继承古代遗产、不能一概否定的观点被指责为“超级的观点”、“复古主义”而加以批判。可以说，从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到吴晗的“道德继承论”，十年间的两次论战真实的反映了文革前人们在新旧文化、新旧道德关系以及文化遗产（包括道德遗产）的继承问题上所作的曲折探索。

十年文战并未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紧随其后的文化大革命则以全面否定传统、毁灭文化道德遗产的简单粗暴态度压抑了所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继承探索，在实践上造成的后果也是惨痛的。读史使人明智，今天回顾、反省这段历史，会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在今天的社会，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关系问题仍是众人瞩目的焦点问题。

我们仍有必要继续从理论上探讨“十年文战”中未造成共识的那些问题，例如，如何看待从传统道德到现代道德，其间的“变”与“不变”，如何决定继承中的“取”与“去”的具体标准和方法，如何取舍？怎样处理好继承旧的伦理道德与建设新伦理道德体系之间的关系？等等。

另一方面，今天在社会面临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及其对伦理道德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也使人们对伦理道德体系吐故纳新的转变调适过程产生新的研究兴趣，我们相信，这些都将促进伦理道德讨论的深入进行。

（责任编辑：萧 徐）

被“选”入汪伪中央的何世桢是爱国者

● 何祚榕

何世桢(1895—1972)先生是我的堂伯父,其祖父是我的曾祖父——何维健,字汝持,号芷芻,曾任晚清“汉黄德道”道台等官职,辞官后,经营盐商,于扬州建“何园”。我的祖父辈弟兄三人,世桢伯父是二房伯祖父之子。虽说有这样一层亲属关系,由于年龄的悬殊(伯父长我34岁),我对他的历史所知甚少,只是在1987—89年间,通过调查收集到若干史料,才弄清他确是一位“不屈的民主主义爱国者”。

一、名列三十年代《世界名人录》

现今人们知道何世桢的人已很少,何世桢已不是什么名人了。可是,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却是名噪一时的人物,名列三十年代《世界名人录·中国名人》(Who's Who in China p. 82)。其盛名并不在于他曾任多么高的官职,而在于他所参与的政法文教活动而知名于世。

1919年五四运动时,何世桢是上海学联会评议长,多次晋谒孙中山先生。1921年上海东吴大学法科毕业。1922年获美国密茨根大学研究院法学博士学位,其后开设何世桢、何世桢兄弟法律事务所,为上海著名的大律师。1923年,曾任东吴大学法科教授、上海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次年年初孙中山先生加委他为上海大学学长(相当于教务长)。1923年,代表中国法学界出席国际律师协会在马尼拉召开的学术会议。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上海方面,先选出十人再由中山先生圈定三人为代表,何世桢为其中之一。1924年上半年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青年部秘书。1924年12月创办私立持志(以其祖父汝持公之遗志为命名)大学(1931年办理立案改名持志学院),持志大学存在16年期间培育了不少人才,其知名校友有倪征燠、胡道静、顾廷龙等。1925年“五卅”运动中,宋庆龄召集各界代表成立后援会,指定何世桢为法律组副主任。1925年8月,何曾列名

于声援胡汉民、反对蒋介石之通电中。1927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年,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因病实际未赴任。1929年,任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院长。1931—1936年,何一直是胡汉民反蒋派驻沪办的负责人,其间1932年蒋曾委他担任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他拒绝接受。

二、在老一辈国民党人中,何是坚持民主主义的一员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指定胡汉民为国民党党章审查委员召集人,何为委员,由此得与胡相熟。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内部各派矛盾逐渐激化,何世桢就在上海致力于办学、做律师,“不问党事”。同年8月,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被罢黜,何曾声援胡汉民、反对蒋介石。11月国民党右派召开“西山会议”,何世桢其时不是中央委员,未参加会议,但因他与胡汉民、居正、许崇智接近,被开除党籍(后于1927年恢复),并被目为西山会议派。其实在老一辈国民党人中,何是坚持民主主义的一员。有以下事实可



说明：

五卅运动中，宋庆龄召集各界代表成立后援会，指定徐谦、何世桢为法律组正、副主任。何负责向租界捕房交涉释放被捕的工人学生，奔走两月，完成了营救任务。

1928年夏，何世桢被任命为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院长，当时他“热衷于想在国民党‘五权分立’的统治下，树立起一个‘民立’、‘法治’的楷模”（何世桢遗著：《记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4辑第140页）。他敢于顶撞来自各方面的干扰，秉公办案，终于不能见容于当局，以致上任不过一年被迫辞职。所遇到的干扰部分来自租界的领事团个别成员，更主要的是来自南京政府。例如，1928年12月9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公安局会同租界捕房拘捕了28人，国民党认为他们都是共产党，要求全部移送市公安局。临时法院承办推事已同意移提。当被告向上诉院提抗告时，兼任上诉院院长的何世桢却不同意移提，发回临时法院原审审理。结果28人中除1人因身上搜出革命书籍和传单，不能不按当时规定以“阴谋内乱罪”判刑四年外，其余27人均以罪证不足宣告无罪。四十年后何回忆写道：“当时我之所以作出原审法院有权受理此案的裁定，目的完全不是为了保护共产党人，而是为了贯彻我历来所幻想的所谓‘司法独立’。”（同上文，第143页）不久，接蒋介石电，令何在三天内亲自押送28人去南京。何电复27人“已判无罪，无权羁押。”

1929年至1930年，李济深、胡汉民先后被扣。1931年8月，邓演达也被捕。当晚宋庆龄亲赴南京营救，并派黄琪翔嘱何疏通租界，三天内勿解邓去淞沪警备司令部，以争取时间，何向法院做了工作，终于拖了一个星期。何因此被列入黑名单，并与邓演达、鲁迅、杨杏佛等人遭受蒋介石的密令通缉，悬赏现洋十万元，该密令系蒋发给军统蓝衣社的，现密令原件陈列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内。

“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抗日高潮，蒋介石被迫释放了胡汉民、李济深。同年11月，西南国民党在上海开会，胡汉民等书面提议，恢复尚被蒋扣押的邓演达的中委职务，何将此提案亲交会议主席，获得一致通过。而蒋介石竟于当天将邓枪决。

三、在汪、蒋夹缝中为抗战作贡献

抗战爆发，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何世桢即停止反蒋活动，并接受了向重庆当局提供敌方情报的任务。上海沦陷后，何世桢、何世枚兄弟法律事务所为了与敌伪司

法界划清界限，立即摘牌停业，不受理任何案件。

1938年，上海的伪政权即下令强迫租界内的大、中学校向他们“登记”，持志学院原在江湾的校址因受“八·一三”日军炮火摧毁已迁到租界内属于应“登记”之列，何校长置之不理。

1939年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其间派人接何世桢，称何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一定要何参加，被何拒绝。但汪仍宣布“选”何为“中央委员”。1939年9月13日，汪伪特工总部以持志学院暨附中抗拒“登记”为名，派出“暴徒”40余人将持志学院捣毁。为了坚持民族气节，维护师生安全，何世桢毅然宣布持志学院及附中停办。

不料就在持志学院主动停办的同时，重庆当局误信何世桢投敌，将何开除党籍并加通缉。重庆教育部亦据此饬令持志学院停办，撤销校董会立案。世桢先生闻讯后，立即致电蒋介石提出抗议，并不顾当时汪伪日敌的生命威胁，将抗议电文印成传单，租了飞机在上海及重庆两市上空散发，公开抗议蒋介石的无理举动。之后，又在上海办《正气》杂志，撰文叙述全部事件经过，揭露与抨击汪、蒋夹击之所作所为。不久，当教育部视察员周尚先生回到重庆时，才弄清真相，但并未撤销对何世桢及持志学院的错误处置。1940年初，汪啸崖由渝来沪，向何转告重庆最高国防会议的通知：此事纯属误传。其时何世桢正好利用这种处于汪、蒋夹缝之中的特殊地位开展工作，继续秘密为国民政府提供敌伪情报，为抗战作出重大贡献，并在抗战胜利之初代表国民政府负责联系在上海的“接收”事宜。直到1947年国民党监委才通知何恢复党籍，何未予置理。后应祖籍安徽省望江县族人所请，他以“如能对蒋介石的独裁有所限制也好”的心情竞选伪国大安徽代表。在伪国大，他投了居正的票，还提了个“限制总统特权”的提案。上海解放前夕，王宠惠曾力劝何去广州、台湾，被何拒绝。

四、历史遗案的余波

1968年6月，何世桢被“文革”时期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隔离审查，于1972年10月13日撤销隔离，此时何体力极度衰弱，回家仅三天即于1972年10月17日逝世。“文革”之后，1979年11月20日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对何世桢问题的复查决定写道：“现经复查，何历史上……曾做过有益于人民的事，是有贡献的。1968年6月至1972年10月期间对何隔离审查是错误的，何系属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致死”。世桢伯父之女祚章姐告我：在被审查的四年中，世桢先生共写了数十万字的史料，据当时军管会的干部说，每一

件资料都经核实全部是真实的，是一部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人民日报》1987年7月7日为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于该报第5版纪念专刊上载有署名史学所写《一场特殊的战斗——记坚持抗日斗争的上海学生》文第二部分第四段中有“上海持志大学和持志中学校长何世桢……公开投敌……”等语。我读后，甚感诧异，立即函告上海何世桢先生直系亲属，并发动持志大学校友上海胡道静等十老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去信要求澄清。在这期间，还发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周佛海日记》中第13页上，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许映湖、王仰清所编注的第二部分也有雷同提法，称“何世桢……投敌后充当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更感到此事确有澄清的必要。经过一年的调查与交涉，《人民日报》于1988年7月7日第5版刊登了史学的更正：“1987年7月7日，本报发表的《一场特殊的战斗中》提到上海持志学院院长何世桢‘公开投敌’，经有关方面查证不实，应予删去。”

据说，有关部门为进一步澄清事实，还责成曾经审阅并核实过何世桢全部档案的工作人员撰文澄清。1989年1月20日，我们在上海市政协主办的《联合时

报》第三版（《史苑》版）上看到徐克毅、张穆所撰《不屈的民主主义爱国者何世桢》（一、一桩历史的遗案；二、风雨持志十六年；三、遗案背后的历史原因），占该版3/5的篇幅，将此案的前后经过一一澄清。我在前面所列史料中有不少就是取材于该文。

1989年12月，上海市虹口区政协主办《文史苑（四）》发表周尚老人（时年88岁）撰《何世桢被诬投敌前前后后》。他是在看到《联合时报》上的文章之后写的。文中写道：“抗战军兴，我获邵力子老伯推荐进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于1939年夏，要我视察上海各大学，办理大学统一招生，劝说褚民谊‘归汉’，邀请国民党元老许崇智和李烈钧去重庆共赴国难，救出沪西‘76号’内的落水人员等等。其中有些事项通过何办理。”“当年秋，我回到陪都重庆……才知道我到上海后向部里汇报情报的几次电报，其中包括关于何世桢和持志真相的报告，均因电台人员投敌而未曾拍发，从而铸成如此大错。”文末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何世桢坚贞爱国，我是历史的见证人”结尾。

今年（1995）正好是何世桢先生百岁生日，谨以此文缅怀尊敬的世桢伯父。

（责任编辑 洛松）

刘禹锡是怎样写出《陋室铭》的

● 李春碧

提起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陋室铭》，凡知书者是无人不晓的。至于《陋室铭》是怎样写出来的，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唐贞元年间，刘禹锡任监察御史时，曾参加了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革新失败后，他被贬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及安徽和州县通判。按规定，刘禹锡应住衙门内三间三厅之房。但是，和州的策知县是个势利小人，认为刘禹锡是被贬之人，便安排他到城南门外临江的三间小房居住。对此，刘毫无怨言。但刘禹锡是个文人，根据住地景况写了一副“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的对联贴在门上。做贼心

虚的策知县见之，甚为恼火，便马上将刘禹锡移居别地，并把住房面积减去一半。此房位于德胜河边，岸柳婆娑。刘禹锡见此景色，更是怡然自乐。于是，他又撰写一联：“杨柳青青江水平；人在历阳心在京。”策知县闻讯后，又撵刘禹锡搬至城中一间只能放一床一桌一椅的破旧小房里居住。

半年光景，刘禹锡的“家”被折腾了三次。他在愤激之中，有话如鲠在喉，倾吐为快，一气呵成，写成了《陋室铭》，并请人碑刻竖于门外。

策知县闻之惊愕，趁人不备，便前去细读《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

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自命为“鸿儒”而实则若“白丁”的策知县，读罢扣心，能不愧悟？

字字（全文81字）珠玑、构思巧妙、称誉古今的《陋室铭》，充分表达了作者高尚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有识之士曾云：如果刘禹锡官运亨通，一直在朝廷为官，身居殿堂，他能写出《陋室铭》这样传诵千古的佳作？

李锐与《庐山会议实录》

● 张 扬

一、庐山会议与我

我是1959年升入高中的，学校在长沙城郊。庐山会议正是那年召开的，疾风暴雨立刻袭来：“彭黄张周”四人中有三个湖南人，周小舟还是庐山会议前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除周小舟外，湖南省委内还有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因庐山会议而有了“问题”的人……

总之，湖南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重灾区”，必须严加整肃。我所在学校的礼堂每天从早到晚开斗争大会，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挨批斗被打倒的都是附近农村的基层干部，还有我们学校和其他中学的领导。

“反右倾”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打倒了许多干部，开除了许多党员。接着，这种“伟大胜利”的后果很快显示出来，那就是大饥荒。饿死人的事发生了，我们这些青少年的成长发育受到很大影响。

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人们，错误被部分纠正，“苦日子”在延续三年后终于过去。但年轻的我并没有停止思索：明明是人为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为什么归咎环境或把口径统一于“三年自然灾害”？还有，多少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一风吹地平了反，为什么“彭黄张周”不能平反，排山倒海般的事实不是早已证实了他们在庐山上的直言和预见吗？！……

庐山会议后一段时期恰逢我从少年踏入青年，正在形成独立的人格和世界观；那段时期发生的大量的无情的事实促使我深思和早熟。

正是因为这一点，后来的“文革”一开场我便充满怀疑和抵触，从而没有堕落为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那样的人。这些“小将”中，我最憎恶的是韩爱晶；这种憎恶至今未减，憎恶之缘就是他对彭德怀元帅的残害。

1978年底彭德怀元帅平反，黄克诚同志发表长篇纪念文章。我至今记得那篇文章的第一句：“历史是这样的无情和公正！”

那句话顿时使我泪流满面……

后来，我第一次接见外宾时，对方问起我对中国当代伟人的评价。我答：“就人格而言，中国当代头号伟人是彭德怀！”

……

总之，庐山会议及随后发生的一切极大地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也极大地影响了乃至“铸造”了我。只要我还想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还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有责任感，我就不能忘记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首先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历史；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该了解庐山会议本身——我相信，很多人同我有一样的想法，一样的要求。

在拨乱反正之后，关于庐山会议，各种文件、决议是有的，必要的。然而我认为具体的、现场的、直观的记录却很少。而只要没有这种第一手的材料，人们体会就不会深刻，历史的教训就会随时间推移而冲淡乃至湮灭。

李锐写了《庐山会议实录》（下文简称《实录》），成了那个重大历史事件最具体的、现场的、直观的记录。

二、我读《庐山会议实录》

读着《实录》，我忍不住给李锐打了个电话。

我告诉他，1959年我才15岁，那以前和那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省委书记和中央委员这个层次的人物在我和一般干部群众心目中几乎都是楷模，偶像，完人，圣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虽然不准确，但仍然应该承认他们都曾是革命者，都有相当高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对敌斗争的艰苦岁月中都有不平凡的经历和贡献，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

然而就是这样一些堪称杰出的人物中，有些在庐山上的表现却使我失望。他们或根本不了解人们疾苦和真情实况，或明明了解情况却装作不知，或心存不平却不敢仗义执言。不但在当时铸成一大冤案，尤其留下后患，导致“左”灾泛滥，更为“十年浩劫”埋下祸根……

李锐倾听了一会儿，轻声道：“其实，还有些场面和插话，我没披露。”

我说：“这我能看出来。”

在这次通话中，他告诉我，河南人民出版社已经三次重印《实录》；尽管如此，盗版本仍大量涌上市面。为此，出版社不得不在1995年1月9日《新闻出版报》上刊登“郑重声明”，指出正本与盗印本的诸多差别，要求各地新闻出版管理机关和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协助查办……《庐山会议实录》引起了强烈的探

索欲。

不过我想,要研究这本书,自然也要研究研究它的作者。

三、早期的毛泽东研究

李锐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写的评论得到毛泽东赞赏。延安时代李锐在各种场合多次见过毛泽东。

像当时所有革命青年一样,李锐非常崇敬毛泽东。他的故乡湖南省平江县与毛泽东的故乡湘潭县相距不远。他俩都在长沙生活过相当长时间。湖南刚解放,李锐就先后担任《新湖南报》社长和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他又是个勤于收集资料、广闻博录、分析研究并认真思考和写作的人——凡此种种,使他在毛泽东研究方面具有独特条件;加上后来他与毛泽东之间有过一番众所周知的个人关系,他关于毛泽东或涉及毛泽东的多部(篇)论著在国内外影响不小,因此,八十年代以来李锐被公认为“毛泽东研究专家”之一。

解放初期在湖南工作时,李锐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和更早的湖南《大公报》、《湖南教育月刊》等报刊上找到毛泽东早年发表的文章30多篇。那些文章一般署名毛泽东或润之,也有未署名的,李锐能看出来。李锐还找到了毛泽东学生时代批注过的《伦理学原理》原本。他编了一本《毛主席旧作辑录》,只印50本,并向中宣部汇报。但受到了批评,认为这种做法“有害无益”,限令上缴。李锐只得遵命,但保留了三本,送给黄克诚、周小舟各一本,自留一本。

真的“有害无益”吗?从“造神”的角度看,确实如此;但是,从实事求是地看待毛泽东,科学地研究他的思想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角度看,应该是有益无害。譬如许多人热衷于把毛泽东解释成“天生的”科

学社会主义者,但李锐却在《实录》第一章《引论——庐山会议的由来》中指出,毛泽东早年受到“杂芜的思想影响”,这是个“沉重的负担”,且“彻底清理极为不易”。他引据毛泽东1919年的文章证实,毛泽东曾经受康有为《大同书》很深影响,后来也始终并未完全摆脱空想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某些特点便是他早年空想的“付诸实施”。李锐还引证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的高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李锐指出:除空想社会主义外,近世欧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国农民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或多或少都曾影响毛泽东。

——如果不是自建国初期开始便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率先对毛泽东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是不可能提出如此深刻的看法的。

李锐1952年7月26日日记:“向省委请假五个月。离湘前,将《毛泽东初期革命活动》一书突击写完。”9月9日日记:“书稿结束,今天完成‘结束语’。分请有关同志审阅……紧张工作了四十多天。”

他后来回忆:八、九月份的长沙,天气酷热,只穿了条裤衩,汗流浹背地坚持写作。

他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成了毛泽东研究或“毛泽东学”的发端。这部著作先于1953年在中宣部内部月刊《党史研究》第1、2期上刊出,又于1953年至1954年《中国青年》(半月刊)上连载了8个月。1957年出版了单行本,40年中出过3种版本,印数过百万,1992年第三版改名《早年毛泽东》。

李锐还著有《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和《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我认为,他对毛泽东的了解和研究是独到的。而且我认为他的《庐山会议实录》,是他在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

四、毛泽东“点状元”

1958年1月在南宁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左”风愈刮愈烈的一个里程碑。“南宁会议上,指名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认为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犯了离右派不远的政治方向的错误。”此外,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后,毛泽东将这件大事交给周恩来负责:“一年抓几次。”

——会后不久,李锐随周恩来视察三峡;他由此开始悉心研究三峡。

三峡水能资源非常庞大,可能居世界各坝址第一位。1956年,有人提出在三峡修筑水库和电站。毛泽东对此表现出很大热情,写下“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的著名词句,表明他积极支持这项工程。但这毕竟只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付诸实践可不那么容易。三峡自然条件极其复杂,三峡工程风险巨大。因此,在三峡工程问题上形成两大派,一派主张尽早“上马”,一派主张不上,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是前一派的主将,李锐则是后一派的代表人物。李锐在《中国水利》1956年5—6期上撰文《关于长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在《水力发电》1956年第9期“长江规划专辑”上发表《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几个问题》,从而引起广泛注意。毛泽东曾两次召见李锐,“垂询”他对三峡问题的意见。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把林一山和李锐找去,在毛泽东面前展开辩论;林、李后又分别写出文章,三日交卷,论证各自观点。

这场辩论使毛泽东对李锐有了深刻印象。他当场指着李锐说:“你当我的秘书吧。”还对大家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给毛泽东当秘书也许令许多人羡慕。有人对李锐说:“你中了状

元!”

李锐 1939 年结识胡乔木。次年,胡乔木就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延安时代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常给《解放日报》写稿,与李锐是文字交,往后一直“交”了下来。田家英后来也当了毛泽东秘书。

李锐深知给毛主席当秘书之难,所以他表示推辞。他说,水电部的工作很忙,离不开。那时他在水电部工作。

毛泽东说,不必离开嘛,可以当兼职秘书嘛。

毛泽东当年倒是很重视这位兼职秘书,经常找他来谈话,听取他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并且不限于水电建设方面。

李锐经常自称“少年气盛”和“少不更事”。也许还可以加上“恃才傲物”?

他在黄克诚面前如此,在柯庆施面前如此,在毛泽东面前也是如此!后来,全国全党醉心于几年赶上英国,十几年超过美国时,他又连续三次上书毛泽东,痛陈利害,对“大跃进”持否定态度……

对此,毛泽东虽然不以为然,但也不以为忤。对李锐等年轻人,小人物,他往往不乏足够的大度。

1959 年的庐山会议,宣告了这一切的结束。

五、《实录》的初版和新版

胡乔木同志早在 1980 年 11 月就要求李锐写这本书,但李锐工作太忙,一直没写。1988 年夏哮喘病又发,去青岛疗养,在一个半月内基本写成。在冯文彬、黎澍、李冰封、朱正等同志的关心帮助下,《实录》于 1988 年底编辑完毕,1989 年 5 月由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匆匆写成,多少有些粗疏。为了对历史负责,也对党和人民负责,对

自己负责,李锐又殚思极虑,多方搜集当年档案材料,反复回忆核对,历经多年修改此书。1992 年 8 月,李锐在北京医院病床上写了《增订版后记》;拖了一年多,1993 年 10 月,对书稿作了“最后修订”;又拖了半年多,《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从版权页上看,增订本 29.7 万字,比初版增加近 8 万字。原“出版说明”被移至增订版《后记》中。两种版本都有《前言》,但新版本《前言》较长,除作了若干语句的调整外,加了一段提纲挈领至为重要的文字:“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从此升级,引入党内,直到中央领导层,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

初版本连同《前言》和《结束语》共 26 节,新版本则为 29 节,对应各节的标题文字略有调整,使之更准确、全面;此外,附录了纪念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的四篇文章,另有一篇《增订版后记》。增订版新添了第 22 节《两天常委会的传达》;原书第 22 节《揭批“军事俱乐部”》在增订版中改写成《揭发批判“军事俱乐部”》上、下两节(第 24、25 节)。此外,新添了第 27 节《毛泽东 8 月 11 日讲话(论彭德怀及其“俱乐部”)》。

上面短短一段文字中,已经多次出现所谓“军事俱乐部”——这个根本不存在的被虚构和捏造出来的这么一个“俱乐部”!

六、“传世孤本”——李锐的庐山笔记

长期以来,李锐坚持写工作笔记,有条件有必要时也写日记;此外,还喜欢搜集、保存各种相关资料。几十年中的沧桑变故风云际会,包括许多重大事件,在他笔下,都有记载,历历在目。

由于种种原因,在我们的历史

上许多大事只有笼统的、原则的“决议”和这样那样、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回忆录”来加以表述,对不少重要人物和事件的说法因之变来变去。

庐山会议这个重大事件的叙述也不例外。因此李锐在庐山会议上的笔记显示了不平凡的价值。

《实录》7 月 31 日常委会:“两次常委会都由毛泽东主持,参加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旁听……开会时无人记录,彭真要我作记录。”

——彭真同志肯定没有想到,他这个临时指示对后世意味着什么!

“第一次常委会的记录,回到住处后,我将要点抄录在自己的记录本上(与随后逐日记的其他记录时序是衔接的);而第二次常委会记录,由于时间关系或心绪不佳,没有将要点再转录。因此,第二次常委会记录用的铅笔的信笺本,得以另外保存下来(信笺本已交中央档案馆保存)……”“这两次会议,为彭德怀的‘错误’性质定了调,算了彭德怀的历史总帐。”

《实录》8 月 1 日常委会:“仍然大多数时间由毛泽东讲话,进一步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帐。”“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态度比较温和……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朱德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林彪开始只讲了几句话,可谓‘击中要害’。为整个即将召开的全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林彪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他讲这几句话时是声色俱厉的。”

对这两次改变了中国命运的至关重要的会议,李锐作了详细记录。他回忆道:“两次常委会后,毛泽东都把我们列席的四个人留下来,又谈了一阵……(教育我们)不要再受彭德怀的信和彭德怀其人的影响。”

“这两次会后的谈话，我的记录本上也记不下来，我那时还很天真，以为真是还‘允许交锋’，可以‘继续申辩’的。于是在同毛泽东对谈时，我竟说：1958年钢搞800万吨就好了。毛马上说：“你这个人太斤斤计较，你的发言，倾向不好。这样，我才没继续讲了。”

“这两次常委会的场景，我终生难忘，当时毛泽东、彭德怀和各人的神情，乃至某些动作，我都记得。特别是彭德怀……痛苦的感情藏得很深，但还是使人能感觉到一点，我就坐在他的斜后面。我的手常不听指挥，心里非常痛苦，主要还是为彭德怀痛苦。”

——上述叙述，至今读起来仍感人至深，使人对从彭德怀到李锐的痛苦感同身受！彭德怀的失败，可以说是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作风的失败。失败的代价，是随之而来的大饥荒，接着，是人为制造的十年浩劫……

七、李锐笔记的保存经过和历史价值

“文革”造成的最大损失，是大批文献、档案被无知地或有意地毁灭掉。李锐的笔记能保存下来，堪称奇迹。

《实录》《上庐山开会（关于我的笔记本）》：“我在庐山会议时用的一个黑笔记本保存下来了。庐山会议后，在水电部受批斗时，我曾经将自己多年的全部日记本、工作笔记本、来往信件（主要是家信）等等，凡是可以反映思想动态的一切资料，统统上交了……唯独保留了这个记录本以及在庐山时的有关资料。我觉得这是山上这场大风波的真实记录，为历史也为我自己，我应当将它们留在身边。”

李锐此时已经离婚，孤身一人，因此，1953年12月下旬下放磨子潭时，将这批资料全部带去。1967年

8月北京来人调查他与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李锐公然说毛主席身边最危险的不是这三个人，而是陈伯达。李锐谈了许多实例，并为此给周总理写了信。他的做法当然引起了陈伯达的恼怒和恐慌。1967年11月，他被逮捕；清理书物时，他特地将这几个本子包在一起，写明“李锐庐山会议的记录本”字样，以防不测；他告诉前来执行逮捕任务的几个军人：“这些东西非常重要！”

1979年1月李锐回北京重新工作，有关方面清退他历年上交的全部材料，唯独不见这个庐山会议记录本。李锐明白当年被捕肯定同陈伯达有关，要求有关人员到陈伯达档案中寻找，果然找到了。

1980年10月—11月四千人大会上，李锐正是根据这个记录本作重要发言的。他在《实录》中写道：“现在还是这个记录本帮助我完成写这本实录的任务。”

李锐是1959年6月30日在北京接到赴庐山开会通知后开始作记录的。他的笔记贯串了庐山会议前后后全过程——这是特别可贵之处。此外，为了使《实录》准确无误，李锐还找来庐山会议的全部原始材料作了认真研究。

两次常委会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庐山会议和全党全国形势风云突变的转换点。但是从与会名单可以看出，在世者已很稀少；即使是在世者，甚至李锐本人，如果没有那本笔记，也不可能如实述说当时会议的情况。而只要没有这本笔记，那么，随着时间推移，种种臆测和谣言将会越来越多，也许有朝一日又会酿成新的灾祸——从这种意义说，李锐的这个“传世孤本”，功莫大焉！

八、《实录》总结的教训

每个读过《实录》的人——只要他还是个有良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和

中国公民，对书中记述的两次常委会“场景”，对两次常委会后精心策划的对彭德怀等人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特别是与批彭同步升温的疯狂的浮夸风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饥荒，不也会痛之切肤，深思再三，终身难忘吗？！

用李锐在《结束语——庐山会议的教训》结尾处一段文字作为阅读《实录》的结束语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庐山会议是全党和整个民族的历史悲剧……失败是成功之母。正视失败，才能从失败中得到启发；才能汲取教益，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九、庐山风云与卅载沧桑

李锐参加庐山会议以及“犯错误”的始末，《实录》一书有详细记载，此处不赘。这里只指出一点，即庐山上召开的是中央委员会，李锐不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他是以毛泽东兼职秘书身份到会的；如果1958年末至1959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没有当上“状元”，李锐的后半生以及终身评价也许会彻底改写过。

李锐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水电部内又弄出个“李锐反党集团”，他挨够了批斗。1960年2月被开除党籍，罪状达十几条之多。

李锐这“兼职秘书”也许是被视作了“身边的不定时炸弹”，被认为比一般“反党分子”更加“反党”，因此，受的处分比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更重。除了开除出党，还取消了一切职务级别待遇，一撸到底，每月只发生活费。

之后，1960年5月至1961年11月他被放逐北大荒，几乎死在那里。

李锐奇迹般活着回到北京，在冷漠、孤独中捱过两年，再度流放到安徽省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

当文化教员。“文革”开后，他在1967年11月10日被捕，单独囚禁8年半之久，囚号67126。

开始李锐以为自己呆不了多久就能出狱。但一年后的一天看见大吊车开进监狱，才意识到监狱要扩建，至少一两年内是别想出去了。他开始锻炼身体，学习旧体诗词写作，后来越写越好，可惜只能写在脑海中，容易忘掉；后来，他由涂抹伤口的紫药水得到启发，用棉签蘸着紫药水将每首新作抄录在书籍空白边角，积累达数百首。所有这些旧体诗词，后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名《龙胆紫集》，八十年代初期名噪一时。

出狱后，李锐重回磨子潭水电站。1976年9月毛泽东东逝世，10月粉碎“四人帮”，形势开始改观。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庐山会议冤案被否定，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1979年1月，李锐回到北京，重新工作，担任水电部副部长。1982年春节后，陈云同志提出让李锐到中组部工作；3月，李锐任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局长。“青年干部”在这里是个涵义非常复杂的字眼，那局长并不好当。十二大李锐当选中央委员，随即升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在这个职位上又遭到若干人指责。1984年国庆前后，李锐卸去常务副部长头衔。十三大，他当选中顾委委员。八十年代前期，李锐一面工作一面写作；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他悉心治学，埋头著述。十几年来除修订重版旧作外，先后出版（发表）了《起用一代新人》、《怀念甘篇》、《往事长短录》、《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思想初探》、《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和《庐山会议实录》等著作。

十、亲情与家庭

李锐1939年结婚。妻子是他在

武汉时的伙伴和战友，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口才文笔出众，容貌也美丽出众。看起来，这一对夫妇堪称才貌皆备，天作之合。但两人性格、观点存在差异。在“左”的年代里，人工炮制的政治运动和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使这种差异很容易演变为悲剧。

延安抢救运动时，问题较小者，在各自机关单位抢救；确凿无疑的“特务”，则关押起来，刑讯逼供。李锐属后者，从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被关押了一年另两个月。后来才知道，康生手下一名政治品质恶劣生活作风败坏的职业打手借“抢救”李锐之机企图破坏其家庭。

家庭虽未被破坏掉，夫妻之间性格、观点上的差异却又一次凸现出来。这种差异在1959年庐山会议更加强烈。李锐去北大荒劳改，在苦闷和饥饿中又接到要求离婚的信。他回信说：待我回到北京再说吧。

好不容易活着回到北京。一周后，离婚又被提出来；一月后，离婚终于成为事实。不管怎么说，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共同生活20多年，一朝离异，从兹永诀，对双方都是痛苦；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李锐“扫地出门”，搬到附近宿舍楼一间空屋里。屋徒四壁，连做饭的东西也没有，便弄来一只电炉。他已经在孤独落寞中生活了两年多，现在只是更加孤独落寞……

李锐的儿子生于1946年，1959年小学未毕业“家庭出身”已经成了问题，1966年高中毕业时更沦为“黑帮子女”。后来，这个孩子当了工人。

李锐的大女儿生于1950年，小女儿生于1958年。可怜天下父母心，李锐特别怜爱最小的孩子。《龙胆紫集》中的七绝《娇女诗》（选三首）中的句子如“一念么娃就动情，几回含泪伴行吟”（第一首，1970年），“明朝娇女十三岁，梦里依然抱

着亲”（第二首，1971年），“料是模糊难认父，街头邂逅两行人”（第三首，1974年），都感人至深。然而，就是这个“谢公最小偏怜女”，自李锐1963年离京赴磨子潭后，一别32年，至今没见过面。当时才5岁的小女孩，现在已过不惑，倘若真与年届八旬的老父“街头邂逅”，恐怕真的只能如同路人了！

大女儿李南央“文革”开场时初中毕业，后勤奋自学，“文革”后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当工程师，现在是美国的一位机械工程师，从事高能加速器工作。她理解父亲，热爱父亲。

李锐1979年重新工作时，历尽劫难，且年近花甲，身体大不如前，特别是五十年代患的哮喘病，年年复发，很受折磨，也很需要照顾。作为一个历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人，他也有权利在晚年得到温暖和慰藉……

外甥媳妇充当红娘，给李锐介绍了建设部做老干部工作的张玉珍。

张玉珍，1930年生，陕北米脂人，14岁进“抗大”，当过八路军。她富于同情心，很有正义感，“文革”中在自己家里保护过何长工等老干部。她没有生育过，先后收养了一个孤儿和一个孤女，精心抚养成人……

1985年春，我第一次见到李锐时，见到的夫人就是张玉珍。10年过去了，从她面貌上仍然不难寻辨年轻时的美丽；10年过去了，我发现老同志们谈论现在的李锐时，总是不忘赞叹他妻子的善良和能干；10年过去了，无论在北京，在外地，我每次看到李锐，都有他的夫人相伴相随，我能感受到他们晚年的温暖和幸运……

（作者张杨，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第二次握手》作者）

（责任编辑：杜晋）

港 岛 救 英

——文化名人及民主人士撤离香港纪实

● 马仲廉

1941年12月8日深夜，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廖承志，接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英、美建立统一战线问题的电报。其中第四点指出：“香港文化人、党的人员、交通情报人员应向南洋及东江撤退，此事应酌办。”接着，廖承志又接到周恩来关于转移在港各界朋友的电报。电报是发给廖承志和在沪、港等地开展统战工作的潘汉年、中共中央交通处驻港澳办事处处长刘少文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香港接朋友，如有可能，请先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

(二)请即刻派熊子民往桂林告梅龚彬、胡西民，并转在柳州左洪涛，以便招待你们。

(三)政治活动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可先到桂林，新华日报出去的人（如戈宝权、张企程等）可来重庆，戏剧界朋友可要夏衍组织一旅行剧团专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

(四)极少数的朋友也可去马来亚，但这要看香港的交通条件，恐不可能。上海、马尼刺已不可能。

(五)少数部分能留者尽量留，但必须合秘密条件，宁缺毋滥，必须估计到日军占领香港后能存在。上海必为日全部占领，饮冰能存在否，请考虑。

(六)(七)(八)(略——笔者)

(九)孙、廖两夫人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望派人帮助她（他）们离港。”

一场营救在香港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的艰巨工作，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周恩来的关怀下，由廖承志负主要责任秘密地展开了。

—

1941年12月8日（夏威夷时间12月7日）凌晨，日本海军飞机突然袭击美国夏威夷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就在这同一时间，日军飞机轮番轰炸九龙启迪机场。接着日军第三十八师团分两路沿青山道和广九铁路南进袭击新界和九龙半岛。香港

这块英国的殖民地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当时，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正在香港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光、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和中共南方局派到香港工作的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等人。战争爆发的当日上午，廖承志召集了工委紧急会议，重点讨论了在港的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如何疏散的问题。会上，廖承志决定派乔冠华和叶以群返回九龙，将住在九龙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立即转移到香港，隐蔽起来，等待下一步的撤退。接到党中央和周恩来的电报后，廖承志立即同南方工委的同志研究了撤退这批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问题。按照分工，廖承志和连贯立即到东江游击区和韶关、老隆布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掩护地点和交通线；尹林平负责布置九龙到东江游击区的护送接待工作；刘少文负责在香港方面的联络营救工作。而九龙到东江游击区这一地段，原为国民党统治区，现已为敌人的占领区，需立即打通这段交通线。因此，尹林平当即偷渡九龙前往布置。

12月12日，日军攻占九龙，进攻香港岛的行动迫在眉睫。18日下午，廖承志在香港告罗士打大酒店分批会见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向他们传达撤退方案，并征求他们有关撤退的意见。当时已经决定，撤退经陆路和水路两条路线分别进行。走陆路的由九龙经荃湾、青山、元塘进入宝安游击区，有的经九龙、沙田、大埔、粉岭进入深圳，然后再向外转移。从陆路走行程约100余华里，没有交通工具。走水路的是从香港坐渔船，经过长洲岛、大鹏湾、葵涌或海陆丰沿海地区，然后登陆，步行到游击区。还有一条路由香港坐渔船偷渡伶仃洋到澳门，再转移到台山、斗门一带。廖承志将撤退方案征得大家的同意后，并确定了撤退时的分组负责人，行前联系地点及注意事项，还分发了撤退时必需的经费。廖承志对那些与共产党关系不深的人士关照说：“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可能会碰到预期之外的险恶环境，那时如何处理，就只能请你们自己抉择了。”

就在18日这天夜间，日军在香港岛北角登陆成功，12月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正式宣布向日军无条件投降。

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由香港潜回九龙后，立即组织所属东江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展开营救香港撤退的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组织工作。

为了打通九龙至惠宝游击区的交通线，游击队派曾参加“洪门会”并在这一地区有影响的曾鸿文等人，插入新界、元朗地区活动，很快发展了数十人的游击队，并打通了从九龙青山道经九华径到基湾，越过太雾山到元朗十八乡进入宝安游击区的交通线——九龙进入游击区的西线。进入西贡半岛活动的短枪队一部与在九龙市区工作的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打通了从九龙市区到西贡，然乘船渡大鵬湾，在沙鱼涌等地登陆的交通线——九龙通往惠宝游击区的东线。

由九龙市区通往惠宝游击区交通线迅速打通，虽然为营救困在香港的文化界名人和民主人士创造了基本条件，但是，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了香港与九龙之间的交通。尹林平在九龙为此心急如焚。

12月28日上午，尹林平在九龙长沙湾道住所对正在这里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工作人员李健行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后说：“要将这几百名被日军围困的文化人抢救出来，首先要将我党在香港工作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等同志抢救出来。他们过去在香港同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有密切的联系，已经暴露了政治面目，是日军首先搜捕的目标。况且，他们有电台与中央联系，了解中央的指示精神，熟悉文化人的情况。只有先把他们抢救出来，才能了解整个抢救工作意图，才能找到港战之后失去联系的几百名文化人的线索，才能有成效地开展抢救工作，否则抢救工作就很难下手……，因此我们抢救工作的第一关就是突破日军严密设置的九龙——香港的海上封锁线。”尹林平严肃地对李健行说：“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去完成。你亲自去香港一趟。无论如何也要在三天之内打通港九海上交通线，安全抢救出廖承志等几位负责同志。”

李健行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正好这时廖承志由香港派联系人廖安祥来到九龙。李在当天下午同廖一起和尹林平研究了抢救工作问题。第二天，李、廖找到了一条小木船，混在偷渡的其他乘客中返抵香港。

三

廖安祥原是香港“又顺源南洋庄”的管店。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建立后，他即成为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的交通员。香港沦陷后，他将廖承志、连贯等人安顿在铜锣湾避风塘一艘长年租用的大驳船上。这条船以后就成了营救脱险人士的水上交通站。



在东江主持大营救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文彬

廖承志、连贯等人正在香港设法打通港九交通线，并仔细研究营救文化人士脱险计划时，又连续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询问：“港中文化界朋友如何处置，尤其九龙朋友已否退出？”“能否有一部分人荫蔽？”“与曾生部及海南岛能否联系？”周恩来的询问，表现出他在此时此刻对困留香港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的处境是何等的牵挂和焦虑！

廖承志、连贯等人何尝不也在为营救被困人士而正在焦虑呢！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前往九龙联系的廖安祥的消息。廖安祥、李健行终于经过曲折曲折的偷渡于31日返回香港，翌日来到了铜锣湾避风塘的船上。廖、李将尹林平要廖承志、连贯首先渡到九龙共同研究营救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并报告了一条十分重要的消息，日军为了解决香港战后缺粮问题，在近期要疏散港九难民到内地去。这正是营救在港人士可以利用的好机会。廖承志立即将这个情报通知了刘少文，并决定翌日同连贯、乔冠华在李健行护送下偷渡九龙。

1942年1月2日上午8时，一条小船离开了香港铜锣湾避风塘的大驳船，向九龙驶去。船中乘坐的是化装成“香港大亨”的廖、连、乔和护送他们的人员。廖承志在临行离开大驳船时，指示留在香港协助刘少文工作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工作人员潘柱：“现在还有一大批文化人没有离开香港，有邹韬奋、茅盾、张友渔、

夏衍、胡绳等，还有何老太太（何香凝）柳亚子他们。你一定要设法尽快找到他们。只要找到一两个，就能找到一大堆，然后将他们安全送到九龙。九龙那边我会布置人接应你。”

载着廖承志等人的小船顺利地偷渡成功，中午前抵达九龙红磡码头。上岸后，李健行迅速将廖等带到九龙旺角上海街一幢楼房里。尹林平正在这里等候。几个人立即搓起麻将牌，以此作掩护，仔细地研究了东江游击队在九龙接应和护送从香港救出来的人士到游击区的方案，对于陆路两条交通线上的护送、食宿、警戒及可能出现的情况与处理办法也作了具体研究与安排。研究决定后，由尹林平负责向游击队部署。当时决定的营救计划是：

（一）刘少文、尹林平分别负责港九地区的营救工作。潘柱协助刘少文。何鼎华、李健行协助尹林平。

（二）每批撤出香港市区的人数、名单、集合地点和撤出时间，均由潘柱确定。由李健行派交通员到香港接收，护送到九龙。然后由何鼎华安排撤出九龙的时间，并派交通员护送至宝安游击区的白石龙。如有经西贡交通线的，则由李健行直接派交通员护送。

（三）抢救工作必须安全快速。充分利用日军疏散香港难民的机会。

（四）脱险人士离开九龙后进入游击区的交通线，尽可能利用西线，因为此线一部分也是难民疏散回内地的路线。对于一些确实不宜走西线的人员才安排走东线。

（五）对于著名人士撤到九龙市区后，必须派专人同他们见面，介绍交通线情况和转移中的注意事项，并征求意见安定情绪。

这样，整个营救工作便有组织有步骤地顺利地展开了。

四

廖承志等人在九龙仅停留了一个晚上，便于第二天起程向东江游击区转移。他们选择了东线。因为这条线上有护送人员李健行的亲属关系可利用。早上8时，廖等扮作商行老板，在李健行护送下，由九龙旺角步行起程。他们混在难民中通过了启迪机场的日军岗哨封锁线。然后踏上了去西贡的公路。这时游击队短枪队已经在暗中护送。中午时，他们到达了西贡附近。这里已经有交通员等候和接待。到达西贡后，李健行将廖等交给负责下一段护送任务的短枪队后，便回返九龙。在西贡的大环头村，港九游击队负责人蔡国梁和廖等研究了下一步转移的安排。

当日晚间，夜幕刚刚降落，蔡国梁领着廖等到了歧岭下码头。这里有预先准备好的两条槽子船。船上的护

航游击队将船伪装在渔船群中。当蔡国梁引导廖等到达码头的时候，蔡将廖等交给护航队负责人肖华奎。蔡然后与廖等一一握别，并悄声祝他们“一路顺风”。

肖华奎将廖等接到船上，请他们到后舱体息。船将要启航时，蔡国梁嘱咐肖华奎说：“这次护送的都是重要人物，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证他们的安全。遇到日军巡逻队时，要及时回避，不要主动进攻，以免惊动敌人暴露我们的护航活动，影响整个抢救工作。”

两条武装护送船升帆离港。蔡国梁在夜幕中目送两船出港后才离港回转。

两条船保持一定距离，在大鹏湾海上顺风飞快地向前行驶，凌晨3时许，顺利地到达了沙渔涌海域，在距海岸五、六百米处停留。待到晨5时，船上用手电筒光发出了联络讯号，得到岸上的回答讯号后，两条船随即靠岸。岸上，惠阳大队的高健副大队长带着十几个便衣游击队员前来迎接。肖华奎护送廖等上岸后，将廖等介绍给高健后，便握手告别了。

1942年1月3日中午，廖承志等在高健游击队的护送下，到达坪山东南的石桥坑东江游击队第三大队队部所在地。在这里曾生大队长接待了廖等。至此，由香港脱险的第一批领导人终于抵达了东江惠阳游击区。

东江游击区是被营救者的第一个落脚点。由于东江游击区面积狭小，游击队力量有限，又处在日、伪、顽包围夹击之中，所以被营救的人士只能在这里短暂停留，尽快转移到内地的大后方。

这时，尹林平和张文彬也到了这里。他们同廖承志等在石桥坑的一座庙里开会，详细研究了从宝安游击区和惠阳游击区通往惠州的安全护送工作。会议决定，廖承志到重庆向中共南方局周恩来汇报香港沦陷后的工作情况；连贯留在老隆建立联络站；乔冠华到韶关建立联络站。会后，张文彬暂留这里检查工作；尹林平和曾生到广九路西东江游击队的总队部；而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则前往惠州。

1月中旬，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在惠阳大队人员的护送下，经淡水、茶园进入了惠州城。惠州是东江重镇，通往内地必经之地。日军占领后撤走，布满了国民党军队和警特。这里已经由中共惠阳县委派人以香港商人的身份建立了营救脱险人士的秘密联络站。廖在这里检查了联络站的工作，又派廖安祥和惠阳县委卢伟如在这里合营开设了一个“源吉行”商号，以便筹集脱险人员转移途中的食宿车船经费。

廖承志在惠州还与地方党组织进一步研究了营救转移脱险人士的工作。经研究决定，由卢伟如在惠州负责接待转运工作。连贯前往老隆负责惠州、老隆、兴宁、梅兴一线的接待转运工作。乔冠华前往韶关负责由韶

关经衡阳至桂林等地的接待转运工作。曾在香港作统战工作的胡一声负责老隆、兴宁、梅县转大埔、闽西南这一线的转运工作。

1月下旬，廖承志、连贯和乔冠华从惠州乘船到老隆。廖承志在这里安排好工作后即赴韶关。随后乔冠华也到了韶关。在这里，他们便继续展开了接待，转运由香港脱险归来人士赴大后方的工作。

五

廖承志等人向韶关转移之际，在香港，刘少文、梁广领导和组织下，一批批文化界和民主人士脱离虎口，向游击区转移。

香港沦陷后，日军立即派出大批特务，搜寻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进步人士，并贴出布告，限令抗日分子前往“大日本行政部”或“报导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被搜捕的这些人士，为躲避敌人，都分散隐蔽起来，有些人还不断调换隐蔽地点。营救他们首先是要找到他们，并通知他们撤离的方法和路线。还好，潘柱和他的助手黄施民、陈文汉都生长在香港，道路地址熟悉。他们首先找到曾在《华商报》工作的张友渔和“生活书店”工作的徐伯昕，然后通过张、徐很快找到了其他文化界人士，并通知这些人作好随时离港的准备。为了安全，要求他们不要出门，粮食、蔬菜由香港党组织派人送给。在第一批文化人偷渡九龙之前，潘柱先偷渡九龙与李健行等取得联系，并一起选择了登陆点。

1月9日下午5时，茅盾夫妇、叶以群、戈宝权、高汾等人到了洛克道的临时集中点。他们换上了广东人习惯穿的“唐装”，每人带着一个小包袱，装扮成疏散的难民模样，在交通员李锦荣的护送下到铜锣湾避风塘上船。他们混在难民中间，尽可能地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黄昏时，拐到铜锣湾的糖街。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穿过一层已被剪开的铁丝网，与岸边停泊的一只小艇取得了联系。这艘小艇是预先用重金租来的。小艇将他们送在了避风塘中一条大船上。这就是早已租用的“海上交通站”。船上已有由另处的交通员送来的邹韬奋、胡绳夫妇、廖沫沙、于伶夫妇等人。这些文化人在难中相遇，都显得十分兴奋，互问港战以来的遭遇。潘柱向文化人士交待了偷渡计划及注意事项。当日夜间，他们就住在了船上，等待翌日的偷渡。

翌日凌晨3时，海面上大雾浓罩，伸手不见五指。乘日军巡逻快艇停止活动的时机，第一批离港偷渡文化人，在交通员带领下，悄悄地爬进了三只小艇。待铜锣湾出口处的日军换岗的机会，三只小艇飞快地冲向海峡，划向九龙。天将拂晓，小艇到了九龙的红磡。他们迅速上岸，穿过九龙市区，到达旺角通菜街的联络地

点。在这里，早在等待的李健行接待了他们。接着李健行将邹韬奋等人安排在油麻地佐顿他的家里暂憩。

11日清晨，邹韬奋、茅盾等十余人，在交通员的带领下，混在难民中，通过了日军指定的难民向内地的疏散路线青山道，中午时到达了荃湾山脚下的临时接待站。休息一会儿后，他们脱离了向西疏散的难民群，向北走小路进入山区。游击队短枪队的人员紧跟在后面护送。黄昏时，他们穿出一个狭谷，走进了较平坦的十八乡地域，入夜时，到达了锦田村接待站。

第二天，他们继续上路，经元埗到落马洲。在路上，他们与乘车的日本兵相遇，幸好未引起日军的注意。经过半日跋涉，他们到达了深圳河边的难民蓬。这里也是预定的歇脚点。交通员办好了渡河手续，然后大家就乘船渡过深圳河，到达赤尾村住宿。这个村是游击队设在敌人封锁线上的一个秘密基地，群众基础较好。在群众掩护下，他们平安地度过了游击区以外的最后一夜。

13日，邹韬奋、茅盾等一行终于踏上了进入游击区的最后数里路程。但这短短的数里路中，却横拦着一条日军封锁线——宝（安）深（圳）公路。他们观察到公路上没有日军巡逻车辆时，快步通过公路，迅速进入丘陵地带，爬上了梅林坳。

梅林坳是宝安游击区南部的屏障。邹韬奋、茅盾一行登上山顶时，就见到了迎面走来的游击队警戒部队。一位游击队员高兴地说：“我们在望远镜里很早就看到你们了，一直在注视着你们的行动和周围的情况，可把你们平安地盼到了。哈哈，我们也可以交差了。”听到游击队员的话，大家感慨万千。其中不知是谁遥望南边九龙半岛重重山峦，高呼：“再会吧，香港！”

北面山下就是游击队临时指挥所驻地白石龙。下山了，大家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邹韬奋忘记了第一天上路就扭伤了脚的疼痛，激动地边走边说：“到家了，我们到家了！”还有的人高唱《游击队之歌》和《我们在太行山上》。

这时，游击队的领导人尹林平、梁鸿钧、王作尧、曾生等都在等待着第一批脱险归来的文化界人士。当他们看到了梅林坳上岗哨发出的“客人已到”的讯号后，就同接待人员到村前去等待，去迎接这批战斗在香港的文化斗士。当他们看到了脱险归来人士将要入村时，便热情地包围了上来。大家都沉浸在了欢乐之中。

几天后，凤子带领的剧团也到了这里。以后，一批批文化人士接踵而来。至1月底，先后到达宝安游击区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达300余人。接着还有其他干部、学生、工人等进入游击区，使人数达到千人之多。在这平时寂静的山沟里，这时变得十分热闹起来。文化人们自称是“文化游击队”。他们和“武装游击队”融合在了一起，表现出了如鱼似的真情。

六

1942年1月底，张文彬由惠阳来到白石龙，和游击队领导人进一步研究了脱险归来人士的行止问题。研究决定，从2月中旬开始，分三批从游击区出发向大后方转移。张文彬赞扬了游击队的抢救工作。他说：“你们虽然是一支小小的游击队，但是坚持了武装斗争，站住了脚，意义很大，假如没有你们在这个地区的工作基础，要进行这次有效的营救，是难以设想的。”

为了下一步的工作，张文彬将东江游击队进行了组织上的整编。在原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下的第三、第五大队和增从香独立大队的基础上，统一组成了“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梁鸿钧为总队长，尹林平为政治委员，王作尧为副总队长兼参谋长并兼第五大队大队长，曾生为副总队长兼第三大队大队长，杨康华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主任，李东明为副主任。总队下辖第三大队、第五大队、惠阳大队、宝安大队和港九大队。

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整编后，进一步明确了下属各大队的活动地区和战斗任务，以及营救香港脱险人士转移、护送的分工，使营救工作更加严密，妥善和安全。

困留香港的大部分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是偷渡九龙，经陆路转移到东江游击区的。但还有一部分人士，因在香港时间久，接触面广，走陆路容易暴露，便决定由水路营救他们脱险。其中何香凝女士和柳亚子先生不仅熟识的人多，而且年老体弱，不能走陆路，必须从水路乘船脱险。

由水路走的路线是，从香港乘渔船，经长洲岛，到游击队控制的大鹏湾、葵涌一带或海陆丰沿海地区，然后登陆到游击区；另一条是乘渔船到澳门，再转到广州湾（今湛江市）、台山到桂林。经水路走的，大多首先在由香港地方党组织掌握的位于上环干诺道的大中华酒店集中，然后乘游击队控制的船只，经长洲岛过伶仃洋到澳门。长洲岛是香港西南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很早就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日军占领香港后，在这个岛上驻军很少。小岛实际上由中共地方党组织控制。因此，这个小岛就成为由水路营救香港被困人士前往澳门的一块稳固的“跳板”。澳门虽属葡萄牙统治，也驻有日本领事馆，但当时葡萄牙属于中立国家。中共地方党组织在澳门设立了秘密联络站，为接待和转移脱险人士作了周密的安排。

何香凝和柳亚子是最先从海路上离开香港脱险的。在香港负责营救的潘柱等人将他们从罗便臣道住处首先转移到鸭街（永胜街）海陆丰会馆，又将他们转送至铜锣湾避风塘的船上。1月初的一天，在交通员谢一超护送下，何香凝带着经普椿和两个孙子，柳亚子

带着女儿柳无垢，乘船先到长洲岛，然后换乘一艘折掉机器的机帆船。由于行速度缓慢，在海上飘泊了七天七夜，才在东江游击队海上巡逻船的援助下到达海丰。这么长时间在海上的惊险的飘泊，使两位老人备尝苦头。对此，何老感慨之下，写下如下诗句：

“水尽粮空渡海丰，
敢将勇气抗时穷。
时穷见节吾侪责，
即死还留后世风。”

她们到达海丰后，在马宫港靠岸。登岸后，何香凝被人认出。于是，何老干脆向国民党海丰驻军提出保护。因为何是国民党元老，又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驻军不敢怠慢，安排她住在公馆内。国民党海丰县党部还开会“庆祝何香凝委员脱险”。而经普椿则不便公开，住在海丰城东门头春利旅店。柳亚子女女上岸后住在马宫附近的新村。何香凝在海丰积极宣传抗战，鼓动民众参加抗日运动，引起海丰国民党当局的不安。因此，当局匆忙决定将何送往韶关。

柳亚子是国民党当局追捕的人士。他们父女在海丰数次变换隐蔽地点。3月初，在海丰中共地下党组织派专人护送下，经河婆（今揭西县城）到安流；由此乘木帆船逆水上行，3天后抵五华县城；5月初乘汽车到兴宁。连贯专程到兴宁将柳接到老隆。月余后，柳到达韶关和先期到达的何香凝会合。他们随即北上衡阳，转车赴桂林。

1月初，香港各电影院公开打出幻灯，点名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到香港丰岛酒店（当时日军司令部所在地）与何久田幸助会面。何久是一个搞文化宣传的日本人，他的这一举动更给在港文化人士增添了离港的紧迫感。所以，范长江、蔡楚生、司徒慧敏和夏衍等数十人，即于1月上旬开始分批经长洲岛到澳门，然后又由澳门经都斛、台山、开平、肇庆等地转入内地。还有的是到澳门后经歧关、江门、杨梅到肇庆。

夏衍一行乘小艇偷渡伶仃洋时，遇到了日军巡逻艇。当日本兵跳上小艇检查时，夏衍用日语交涉，顺利闯过了这一关。由于出了这件事，当时混传出夏衍等人在赴澳门途中遇难的谣言。

千家驹一家和杨东蓀夫妇是于3月初乘船至广州湾的。然后他们乘长途汽车赴桂林。

李少石、廖梦醒夫妇也是由香港经长洲岛到澳门的。他们在长洲岛等赴澳门的时机，隐居了20多天。到澳门后，因廖梦醒害病，在此停留的时间较长，5月间才前往重庆。

最晚离开香港的是高士其。他因病行动困难，生活不能自理。他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护理下，于4月间离开香港，经广州、清远到韶关，转往桂林。这时，香港

日本特务机关在敌伪报纸上登出招降启事，点名“请”茅盾、邹韬奋等文化人出来参加“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他们那里知道，绞尽脑汁想捕捉的爱国文化人士早已脱离了香港这个牢笼，而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时刻注意着营救香港文化界和民主人士的进展情况。当他了解到大部分人士已脱离虎口进入东江游击区时，即电告南委副书记张文彬，指出，一、自香港撤退的人士，大多数是统一战线的文化人，过去在渝、港均已很红了，若久住，不仅国民党特务，就是广东当局也要注意。无论如何不能停留。二、已去电方方同志，告其处理方法：一些去浙江，经沪到苏北；一些去桂林，一些来渝。3月17日，周又电示方方和张文彬，“去上海的人数应减少到最低限度。”为营救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共南方局设法筹集了20万元经费，分别汇给东江和桂林方面。

按照已定计划，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已在由游击区经惠州、老隆、韶关转往桂林、重庆等地的路线上，布置了秘密交通联络站。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一起，共同组织了接待护送的具体安排。

从东江游击区向大后方各地转移，仍然是在严密组织下秘密进行的。

七

最早离开宝安游击区的是茅盾和他的夫人孔德沚、胡仲持、叶以群和廖沫沙。他们在宝安游击区住了数日后，便在游击队武装护送下向惠州转移。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他们白天休息，晚上行路，避开大路，翻山越岭，历尽艰险后，到达惠宝边惠阳大队驻地田心村。当他们准备由这里继续前进时，日军于2月3日、6日先后再次占领转罗和惠州。前进的道路被堵塞了。茅盾等人只好留在这里隐蔽起来。这时，由陆路东线转移的张友渔、沈志远、戈宝权、韩幽桐、胡风、宋之德等也到达这里。他们在这里滞留了约一个星期。日军在转罗、惠州抢掠后退走了。这批人士才在惠阳大队短枪队的护送下，到达惠阳县淡水附近的茶园。

2月14日，（农历除夕），茅盾等20余人，在中共惠州区委书记蓝造的带领下称程，中午在永湖休息，然后继续上路，黄昏时到达三栋。晚饭后，大家继续在夜暗中冒雨赶路。途中在经过一座小石桥时，茅盾夫人不慎掉到了河里，幸好桥不高，河里只有水草和烂泥，没有跌伤，只滚了一身泥巴。一场虚惊之后，继续赶路，至下半夜一点多种到达惠州。

惠州是东江地区通往内地的必经之地。日军撤出惠州后，国民党军队即进入城内。在这里，中共惠阳县委建立了专为接待和护送脱险人士的秘密联络站。茅盾等一行到达惠州后，受到了联络站负责人，中共惠阳

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的接待（卢那时在的名义是香港“昌业公司”经理兼“源吉行”的老板）。

2月17日，这批文化人士在地下党的交通员护送下乘船从惠州到了老隆。到老隆后，由连贯负责将他们转送韶关。然后，转移到桂林和重庆。

最后一批离开游击区的是邹韬奋。邹韬奋本来也想和茅盾等人第一批离游击区，经惠州、韶关回大后方，但考虑到国民党顽固派对他十分仇视，让他暂时留下来，等待选择好进入大后方的安全地点后再走。直到4月下旬，邹韬奋才离开游击区到达老隆。但在这时，国民党当局密令各地特务机关严密侦察邹韬奋的行踪，“一经发现，就地惩办。”在老隆负责的连贯接到周恩来的急电，指出一定要让邹韬奋就地隐蔽，并保证他的安全。连贯等人研究后，决定将他送往梅县畚坑乡江头村陈启昌家里隐蔽。江头村是一个偏僻的乡村，群众基础较好。陈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这时他的公开身份是“侨兴行”的经理。决定以后，邹即化名为李尚清，以陈启昌的同事和韶关“侨兴行”大股东的身份出现，因患脑病到乡下休养为由。他在江头村隐蔽达半年之久。

在此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并没有放松对邹韬奋的追寻。早在邹等脱离虎口向东江游击区转移的时候，韶关国民党党报的《时人行踪》栏即登载：“邹韬奋、茅盾、夏衍等十余人，由香港乘小渔船逃往广州湾，因中途遇风覆舟，估计可能因此丧命。”过了不久，该报又发出消息说：“据闻邹韬奋等已到东江游击区，在游击区担任政治文化工作，前讯广州湾消息不确。”以后该报登出，“邹韬奋原在东江游击队，后因日寇进攻，闻已离队住在东江乡村。”为此，国民党当局特派一个特务头子到广东坐镇指挥，对兴宁、梅县一带加强了侦察，扬言务必将邹捕获。在韶关的乔冠华闻到此讯后及时通知了胡一声，并说明党决定邹必须赶快离开梅县，经上海转移苏北新四军去，并要求胡保证邹的安全。

胡一声接受任务后，把党的决定告诉了邹韬奋并征求邹的意见。邹表示：“坚决执行党的安排。”他们研究了转移路线。考虑到邹体弱有病，不宜于走山路的情况，决定经韶关乘火车到渌口，改乘船往长沙、汉口，东下上海转苏北。这条路要经过国民党设置的许多关卡和敌占区，危险性大，需十分警惕。

临离开江头村时，正逢中秋节。陈启昌的父亲陈卓民为邹韬奋设宴渡节并饯行。邹心情激动，有感于当时的时局，奋笔疾书：

“翻开历史一查，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到莓苔上面的日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

这两段话出自鲁迅，前一段题词赠给陈启昌，后一段赠给胡一声，另题词给陈启昌父亲，感谢对他的照顾。

9月25日，邹韬奋和陪同人员郑展、冯舒之三人，由江头村起程到达兴宁。第二天，胡一声同邹等三人化装成运货的商人，办好了各种通行证件，分别乘坐两辆装货的卡车，通过了国民党设置的关卡，经老隆到连平，顺利地到达韶关，住在了市郊的“香港汽车材料行”，购买好去株州的头等车厢的火车票。第二天，邹韬奋在郑展和冯舒之陪同下，机智地应付了上车前和车上军警的检查，平安地到达株州的渌口镇。

株洲以北是沦陷区。这对邹的安全威胁反而减少了一些。在渌口稍停后，邹即在冯舒之的陪同下乘坐轮船到达长沙，在此改乘去武汉的轮船北行。由于轮船搁浅，到达汉口。在汉口等船的几天里，他们又机警地应付了日本宪兵的多次检查，然后乘船安抵上海。

到达上海后，邹韬奋住在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正泰商行”。商行的经理是原《生活书店》的工作人员。邹在这里住到11月，然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在南通附近渡过长江，进入苏北解放区。

八

脱险人士先后由陆路、水路分别向大后方转移的时候，中共南委组织部长郭潜于5月20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叛变。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被捕。粤北省委的严重机智地将电台及时转移，并将郭潜叛变，粤北省委遭破坏的情况电报中共中央的南方局。周恩来得报后急电南委，速告在韶关的廖承志即到重庆。如果走不了，应当同他母亲何香凝住在一起。并指示连贯立即撤到东江游击区去。可是，南委尚未与廖联系上，廖即于5月30日被捕。连贯接到指示后，将接送脱险人士的任务交待给郑展后，即离开老隆。周恩来得知廖承志被捕后，于6月8日致电南委书记方方：南委同江西、粤北党组织断绝一切往来，负责同志立即分散隐蔽。南委同廖承志和从香港归来的一切公开关系完全断绝。为避免波及，停止派人往桂林取款。立即斩断一切上层的公开关系。可是，此电方方未能接到。在此期间，南委副书记张文彬于6月6日在南委机关所在地大埔高陂镇也被捕。不久，蒋介石电令余汉谋逮捕乔冠华。蒋的这封电报被同情中共的机要员压了起来，并报告了余汉谋的参谋长赵一肩。赵是乔的同学与好友。乔就是在

赵的庇护下在韶关作营救工作的。赵一肩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乔冠华。于是乔立即化装离开韶关到桂林，后转重庆。

南方党组织出现的问题，在周恩来及时处置下，避免了大的破坏。几位组织领导脱险人士的领导人被捕或撤离，对于尚未离开粤北地区的少数文化人士的转移，也未受到大的影响。这样，从香港沦陷后展开的大规模的秘密营救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活动至9月下旬，经历了9个月后圆满结束。被营救者连其家属回到大后方的共计800余人。其中著名人士300余人，除前文已经提到过的外，还有于毅夫、刘清扬、张铁生、张明养、羊枣、黎澍、吴全衡、叶籁士、恽逸群、金仲华、杨刚、吴在东、徐伯昕、胡耐秋、黄药眠、周钢鸣、莎空了、表水拍、端木蕻良、沙蒙、金山、王莹、章泯、许幸之、金乃华、华嘉、梁若尘、赵树泰、李枫、蓝马、盛家伦、郁风、叶浅予、特伟、丁聪、胡考、成庆生、叶方、戴芙浪、俞颂华、司马文森、司徒慧敏、张文，以及梁漱溟、邓文田、邓文钊、陈汝棠、李伯球等民主人士，还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港特派员陈策、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贤德、电影明星胡蝶等。同时还营救了英、美、印（度）等国籍的友人近百人。

先后到达桂林的脱险归来文化界人士，激动之余，共同感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全力营救，我们这些人的命运，真是不堪设想。”梁漱溟先生到达桂林后，给他的儿子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我是注定不会死的，因为我要死了，中国的文化就会中断，“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为之改辙”，所以这次大难当头，到处都有许多不认识的人帮助我，使我化险为类，这是天意。梁先生那里知道“许多不认识的人”就是中共地下组织的人员和游击队员。所谓“天意”，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千方百计的营救。

组织领导营救工作的游击队领导人之一的曾生，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说：“在党中央、周恩来同志的指挥下，这场秘密大营救可以说是历史的奇观，体现了党和部队与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对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我们部队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茅盾于1948年写了一本《脱险杂记》。其中对这次大规模的营救行动评价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这场事后闻名中外的秘密大营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永远是光辉的一页。

（责任编辑：余广人）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

● 孙彦钊

1935年1月15日黄昏，从贵州遵义新城古寺巷一幢建筑精致的两层洋楼里走出了三个人，他们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带着自信，带着要战斗的激情，他们来到了旧城柏公馆。这里将要举行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遵义会议。

这一天来得极其不易。

10年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谈到这次会议时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即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张闻天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则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张闻天的转变

张闻天1931年奉命回国，就任中央宣传部长，负责编辑中央机关报。他作为“左”倾领导集团的成员，按照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高唱“左”倾高调，宣扬“进攻路线”，批判所谓的各种机会主义。但是在上海这一段时间内，张闻天思想也有些变化，并非完全盲从于“左”倾路线，而有自己一些独到的见解。比如他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中开始承认文艺界中间力量的存在及其进步作用，不同意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将中间力量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因

而实施“打击中间力量”的策略。张闻天指出“笼统的一百零一次的背诵‘右倾是主要危险’，但不要忘记‘左’倾这一套党八股，并不能丝毫帮助我们去同‘左’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

张闻天是中共党内第一个用“党八股”概括“左”倾教条主义的人。

但是张闻天仍然没有完全从“左”倾路线中转变过来，而这一转变的完成是他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的事情。

三十年代最初的几年，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因顾顺章、向忠发的被捕、叛变，已很难开展工作，请示共产国际后，决定在上海设立中央上海局，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

张闻天是1933年初化装成商人来到中央苏区瑞金的。张闻天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和党报书记。他到苏区后，首先整顿了党和政府的机关报，主持编辑《斗争》和《红色中华》。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时，面临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中央局领导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方针，要各区大幅度扩红，“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借二十万担谷子”。时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从边区实际出发提出了不同意见，博古等人就把它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发动了一场反“罗明路

线”斗争。

张闻天直接参与了领导。他到福建听取汇报，并做出错误判断，同时在《斗争》杂志上发表《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批判“罗明路线”，指出“罗明路线是反对党的总路线，同党的总路线对立的机会主义路线。”

随后张闻天被中央派往江西指导那里的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开展，在会、寻、安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批评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会议还决定“加强和部分的改造中心县委与会、寻、安县委之常委”。

张闻天返回瑞金后，写出了《罗明路线在江西》发表在4月15日出版的《斗争》上，文章称不仅会、寻、安存在纯粹防御路线的问题，江西其它地区也存在。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成了“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到批判。

张闻天在实际考察了“左”倾路线在苏区实施的后果后，逐渐对某些“左”倾政策产生了看法，同时与“左”倾领导人博古也发生了分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逐渐摆脱了“左”倾桎梏。

张闻天批评了过左的劳动政策，论证了资本主义在苏区发展的



1937年4月在延安机场迎接周恩来。右起：萧劲光、林伯渠、彭德怀、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

不可避免性，批评了那种企图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倾向，也批评了那种看低文化教育和对知识分子惧怕排斥的政策；批评并部分纠正肃反扩大化。当时担任瑞金中央红色医院院长的傅连璋，被怀疑是AB团、社会民主党，将要受到公审逮捕。后在张闻天的亲自过问下，傅连璋才得以解救。

随着张闻天对“左”倾错误路线认识的深入，他与博古等人分歧就越大。

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初，张闻天就怀疑李德、博古的政策，张闻天忧虑地对人说，“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

1934年4月，蒋介石调集11个师的兵力进犯广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张闻天曾建议放弃广昌战役，但博古、李德坚持调集红军主力与敌人硬拼，以堡垒对堡垒，实施“短促突击”，结果，即使李德、博古亲临前线督战，也难挽败局，红军一、三军团差点全军覆没。

事后，彭德怀指责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

文章，公开批评李德等人的“分兵把口”和“堡垒政策”“是纯粹防御的机会主义倾向。”“它不但不能保卫苏区，而且正便于敌人的各个击破。”

1934年5月召开的一次军委会上，张闻天批评博古，说不能与敌人死打硬拼，不能采取堡垒政策，打消耗战，使红军“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博古听后很恼火，反过来指责张闻天有右倾错误，说张闻天对他的指责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据理反驳，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批评博古把红军指挥权拱手让于李德，使李德成为红军最高首脑。张闻天表示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点主意。博古却认为执行李德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

事后，博古找到张闻天，传达了李德也是他本人的意思，“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我们内部不应该闹摩擦。”试图缓和两人之间的关系。

张闻天没有听从博古的劝说，仍然写文章批评“左”倾政策，这

自然招致博古等人的不满。张闻天被排挤了，被毫无理由地派往闽赣省做巡视工作去了。张闻天在调查过程更坚信了他对博古、李德做法的怀疑。他指出：“分兵把口，固守堡垒的办法是行不通的，”“这种公式必须立即粉碎”，闽赣的关键任务是“武装广大的群众，发展游击战争”，这样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和保卫根据地。

1934年9月26日张闻天受命写出关于红军战略转移的社论，发表在9月29日出版的《红色中华》上，题目是《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在这篇社论中，张闻天回顾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指出了在反“围剿”中存在着“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的错误，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一样都是错误的，不可取的，还指出“由于敌人堡垒的层层封锁线，使突破封锁线转移地区，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条件下，继续粉碎五次‘围剿’……”。为此，“我们依照当时的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

在社论中，张闻天既委婉地说明了战略退却、转移的必要性，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表明他的思想已经有了大的转变，与王明“左”倾路线有了明显的不同。

社论一发表，红军总政治部立即发表政治指令，要求全军根据社论，立即开始军事行动，“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

1935年秋，陈云曾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谈到这篇社论：“9月间在《红色中华》报（红色区域中央政府机关报）登载了张闻天（中央政府之人民委员会主席）之文章，微露红军有抛弃江西而到红军区域以外之‘围剿’军事力量空虚地区活动之可能。果然，10月中，全部队伍均行西走矣。”

董必武和何叔衡读到这篇社论方知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的。1936年，董必武在回忆长征的文章中称它是“一篇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

张闻天的社论可以说是红军长征的宣言书和总动员令。

逐渐从“左”倾路线中转向的张闻天，与遭受“左”倾路线迫害的毛泽东在观点上接近了，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在此过程中，张闻天为毛泽东的重新回到军事领导地位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崛起

三十年代初，随着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开始遭到排挤。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对毛泽东关于红军的战略战术进行批判，指责毛泽东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正确主张是“纯粹防御路线”，是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指责诱敌深入的方针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无视周恩来提议让毛泽东继续留在部队指挥作战的意见，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接着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瑞金，以博古为首的“左”倾领导人开始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王明“左”倾路线，毛泽东被进一步排挤了。1933年2月，在

福建批判所谓“罗明路线”，3月在江西开始批判以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矛头指向毛泽东。

1934年1月下旬至2月初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原来由他担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之职被张闻天所取代。毛泽东被架空了，成了“中国的加里宁”，无权而靠边站了。

博古本想让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来排挤毛泽东对政府的领导，又可以将张闻天从党中央核心排挤出去。

张闻天作为“左”倾领导集团的一员，曾在1932年4月4日根据中央会议精神写了一篇社论，即《在争取中国革命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在社论中指责毛泽东在反“围剿”中创造的“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策略是“浓厚的等待主义”。10月6日，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苏区工作时，张闻天提到“泽东可调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附和“左”倾领导思想。

即使张闻天在1933年初来到中央苏区后，对毛泽东的了解和认识也没有多少改变，他直接领导并参与了批判“罗明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但是，当张闻天就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和毛泽东在共事中增进了彼此的了解，逐渐接近起来。

张闻天在主持人民委员会时，总是请毛泽东参加与指导，并经常让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向毛泽东汇报和请示，注意发挥毛泽东在经济管理方面的作用。同时，1934年4月，人民委员会还专门出版了“张闻天、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这是毛泽东的《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和张闻天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的合订本，

当时被称为“苏维埃工作经验的结晶，宝贵的指针”。张闻天笑称他是“效法毛泽东同志的办法”，说明张闻天很赞成毛泽东的工作方法。

可是，第五次反“围剿”遭受挫折和失败时，毛泽东只能坐而视之，忧心如焚，无力改变。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这次蒋介石采取堡垒政策，层层筑堡，步步推进，用所谓“车干水捉鱼”的办法，消灭红军和共产党，摧毁革命根据地。而“左”倾领导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完全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实行个人专权，拒绝红军长期反“围剿”的宝贵经验，推行一整套错误政策，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御敌于国门之外”，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遭到挫折和失败，毛泽东后来论及第五次反“围剿”时说：“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打法。”尔后，福建事变爆发，这是粉碎蒋介石“围剿”的大好时机，但是博古等人顽固地称十九路军比蒋介石更危险，更具欺骗性，因而政治上加以揭露，军事上不予声援，拒不接受毛泽东提出红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赣地区，纵横驰骋，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老巢，以调动敌人主力回援，寻找战机，粉碎五次“围剿”的正确建议，反而坚持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这样红军损失严重，中央苏区大部分为敌人占领。为了扭转不利战局，毛泽东再次建议红军主力立即转入敌人力量薄弱的湖南中部地区，调动敌人，寻找战机，争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但仍遭拒绝。

博古、李德再也找不出什么良策了，只好准备战略转移了。

在此之前，毛泽东和张闻天又

一起搬到瑞金云石山上的一座“云山古寺里”，朝夕相处，互相聊天，更加增进了解，他们更加接近了。尤其是在红军长征前的一天，张闻天把他心中的不满向毛泽东“坦白了”。

中央主力红军突围西征时，经毛泽东提议、力争，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才未被分散到各军团去，而留在中央纵队里，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队三人团”，后来在酝酿遵义会议召开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时，李德、博古实行搬家式的逃跑主义，虽然比较顺利通过了敌人布下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但行进速度缓慢，红军机动性、战斗性无以施展。红军在突破第四道防线时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湘江战役的失败再一次证明了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路线的错误。毛泽东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张闻天也认识到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湘江之役后，蒋介石已洞悉红军仍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再次布下重兵，企图来个湘江战役第二，全歼红军。

博古、李德却不顾形势已变，硬要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硬要往蒋介石布好的口袋里钻。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张闻天坐不住了，毛泽东坐不住了，他们商量后找到了“最高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陈述意见。

1934年12月12日，中央在通道县城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打破两年来的沉默，首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反对博古、李德的意见，提出应改变与红二、六军团的计划，红军应向西进军，进入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内地。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提议，强调应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

况来改变红军的行动方针。周恩来也表示赞同。

李德在他后来写的《中国纪事》中谈道这次会议情况。他称“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即李德的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

毛泽东“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的通道会议，是他重新崛起的标志。

1934年12月17日，中央纵队进入黎平。次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与博古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又称《黎平会议决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等要中央红军在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指出要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以遵义会议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12月19日，军委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总政治部也发出了关于执行黎平会议决议的训令，实质上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但是，博古、李德仍不甘心自己的计划被否定，仍在作梗，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都很焦虑，他们在商讨，尽快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彻底解决军事领导权问题。张闻天、王稼祥出面联系各军团负责人，并且提议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等人早就有此想法，因而非常高兴。因为——正如当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一

文中说的那样：“人们对李德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了。这种怀疑、不满为否定“左”倾军事路线创造了条件。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再次肯定了黎平会议的决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决定渡乌江取遵义。随后又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1月7日，红军智取遵义，一下了将十几万“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东南地区，获得了十二天休整时间，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宝贵时机。

三、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作“反报告”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主持，与会者有20人。

首先是博古作主报告。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中，主要强调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过分强调敌人强大，革命力量弱小，因而第五次反“围剿”不能被粉碎。对于主观方面的错误却轻描淡写，甚至避而不谈。在他作报告中间，毛泽东不时在卡片上记着什么，张闻天等人在认真听，不时微皱眉头，李德坐在门口，听着伍修权的翻译，脸上显不出什么表情，会场气氛虽比较平静，但却给人透不过气的感觉。

接着，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开始作报告。他着重谈了军事问题，认为五次反“围剿”失利，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应负主要责任。他的讲话使大多数与会者长舒了一口气。这一报告又称“副报告”，与博古的主报告有明显的不同倾向，这一点连李德也感觉

到了。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指出“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

周恩来的“副报告”讲完后，博古提议与会者对“主报告”、“副报告”加以讨论。

博古话音刚落，张闻天就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提纲，很有条理、很有系统地讲起来了。张闻天开篇即称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他的发言一下震动了会场，尤其超出博古的预料。博古脸上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紧张与不安。毛泽东和王稼祥却十分平静地听着。

张闻天指出，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归之为敌人力量的强大，人民力量的薄弱，这样必然会得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取胜的机会主义结论，而事实上，“左”倾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是五次“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张闻天还批评博古的重大失误：拱手让权于李德，破坏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给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

张闻天的报告与博古的报告针锋相对，一下子将博古、李德推向了审判席。因而，毛泽东在后来曾称张闻天的报告是“反报告”，而张闻天“反报告”的提纲，则“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

因此，张闻天发言结束后，毛泽东接着发言。他主要分析了“左”倾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据周恩来回忆说，毛泽东的发言主要用三个“主义”概括了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即“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

随后，王稼祥发言。他明确表示支持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要求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并提议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然而，时任宣传部长的凯丰表示了异议。他认为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不懂军事，只是有时看看《孙子兵法》，翻翻《水浒》、《三国演义》，根本没有能力胜任红军指挥权。

随后的两天会议上，陈云、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及各军团负责人都从不同角度谈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纷纷表示支持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

其中，朱德总司令的发言很重要。朱德指责李德不仅把根据地弄丢了，还牺牲了很多人命，并且表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博古、李德处境虽尴尬，但是，据陈云同志回忆，“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即李德）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但是，遵义会议的天平，毕竟是向正确的一方倾斜了。

1月17日，遵义会议作出了下列四项决议：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这一决议使中国革命的航程，驶向了正确的轨道。

四、张闻天任中共总负责

遵义会议上，被取消了军事指挥权的博古，显然不再适合担当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可是，该由谁来接替博古呢？

张闻天等人都力荐毛泽东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但是毛泽东却提议让张闻天接替。

1972年中共中央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谈到过这一情况：“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



1956年10月张闻天（左一）同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一起

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

这样，1935年2月5日，红军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张闻天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并戏称：“我是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

张闻天被推举为党的总负责，这是和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分不开的，尤其是与他遵义会议的贡献分不开的。另外，张闻天曾是王明、博古的好朋友，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又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容易被共产国际认可。

张闻天接任中共总负责后，着手起草决议。并于1935年2月8日在扎西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

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此决议是张闻天在他所作的“反报告”的提纲的基础上，加以综合会议讨论中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及其他同志的意见写成的。

决议对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作了全面总结，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

该决议在1990年被收入《张闻天文集》中，其前曾作为中共重要文献收入《六大以来》一书，也曾曾在1948年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由此可见该决议的重要性。

同一天，会议还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

中央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经过讨论，正式通过《决议案》，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

经过紧张的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为广大干部战士所理解，为战胜困难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后，为了便于军事上的集中领导，经毛泽东提议，张闻天支持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进入军事领导核心。从此，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张闻天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是巨大的。毛泽东在“七大”期间提到这次会议时说：“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指张闻天、王稼祥）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但张闻天却对此轻描淡写。他在1943年12月论及该会议时说：“这个会议的功绩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其高风亮节，虚怀若谷的风范，足令后人仰止。

（责任编辑：萧 徐）

（上接 79 页）

模，先挖出城墙基槽，再用夹板拼成方框，往框内填土夯实，然后拆去夹板，便成一块长方形的板块。板块大小不一，一般长1.5~2米，宽1.2米。最大的板块长3.5米，宽1.5米，最小的长约1.5米，1.1米。块块相叠，分段逐层逐块往上加高。以西北角城墙为例，基槽东西宽约11米，随城墙高度增加而逐级内收，形成一级级台阶。基底一级内收幅度最宽，达1.8米，向上至第4级的内收幅宽仅约20厘米。越往上收幅越小，几成直壁，使人难以攀登。

筑城所需的土方是在城墙内外两侧就地挖沟取土，而以外侧挖沟取土最多。内侧的取土沟在城墙筑起后，随即填实，以保护墙基不

受破坏；城外侧保留，沟宽5—7.5米，深约4米，这是后来护城河的早期形式。

虽然，有关城门遗迹和城外环境，尚待进一步发掘和探索，就目前已知情况，西山古城确定为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建筑技术最为先进的古代城址，已为多数学者公认。这对于探讨中国早期城市的起源、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其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

考古学所称的仰韶时代，在中国历史编年中大体相当于炎帝、黄帝时期。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是中国古代五帝之首，名轩辕。经过阪泉之战，打败了炎帝，建立炎黄联盟；又经涿鹿之战，擒杀蚩尤，于是“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

是为黄帝”。这段文字反映了黄帝时代正处于社会激烈变动时期，军事斗争的结果，产生了联盟局面，推举了首领，逐渐形成国家。与之相应的，就是田野发掘中，早期城址的出现。《白虎通》称“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仰韶时代早期，虽然在遗址内，已发现房基，多半是地穴式的。到了晚期，如郑州西山遗址内既见城墙，又见建造整齐的排房，这同古籍所记一致。所以，有的学者认为，郑州西山古城是我国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一座城址，应该是一座“黄帝古城”。这座古城的出现，也应该说，中国文明起源的曙光已初现东方。

（责任编辑 洛 松）

江上青： 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最初奠基人

● 欧远方

1939年8月29日，在泗县北滩河边上的小湾村，迎面飞来密集的子弹射向江上青。江上青当即从马上倒在血泊中。当时称之为“小湾事件”。制造事件者是泗县反共地主武装。

去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也正是江上青烈士殉难56周年，为了纪念这位“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最初的奠基人”（杨纯评语），中共泗县县委于8月29日这一天，举行江上青烈士铜像揭幕典礼。江泽民及其夫人敬献了花篮。

一群少先队员，分为男女两排，登上铜像前台阶上齐声朗诵挽歌。这首挽歌正是当年在泗县崔集召开的江上青追悼会由“抗演六队”舒焚、张君亮创作的。词曲充满了悲愤的激情：

秋风里，陨落一颗大星，
陨落一颗大星，你去了！
带着音响，划过长空。
在封建余孽手里，
溅了你的鲜血，
让几一里的弱流，亲吻你的尸身，
无限的哀痛，刻上我们的灵魂。

死者啊，
你是生花妙笔的江淹，

你是朗朗照人的玉山，
你是铁腕斗胆的股肱，
打开皖东北的今天。

死者啊，
愿你手持巨灯，
照着我们前行。
抹干泉涌的眼淚，
掀起倒海的巨风。

挽歌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江上青光辉的生平和风范。

江上青祖籍安徽，1911年出生于江苏江都县仙女镇，家族是书香门第，父亲江石溪擅长诗文音美，尤精医学。生有七个子女。长子江世俊，号冠千，是朱自清同学，写得一手好文章；二子、三子早年夭折；四女江世英解放前逝世；五子江世雄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江上青排行第六；幼子江树峰。江上青和诸兄弟间感情极笃。可谓手足情深，兄友弟恭。江上青夫人王者兰上海人，有较高文学修养，品德高尚。1935年她和江上青结婚后，只生二女，长女名泽玲，次女名泽慧。按当时传统习惯，大哥江世俊将其次子泽民过继江上青为子。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江上青在南通高中读书时加入共青团，1928年在扬州中学读书时从事学



生运动被捕过，1929年考取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后参加共产党。在上海、扬州参加学生运动和文学活动，结识“左联”作家郁达夫、阳翰笙、蒋光慈等。创作了不少白话诗和古体诗词以及关于文学史、汉语、语文教学的论文，散文。

关于江上青的文才，1989年张劲夫曾评价说：“上青同志的革命激情、敏捷思路和文学才华，是极为杰出的，他的演讲和著文，都使听者（和读者）在心灵深处激起波澜，是名副其实的革命知识分子的精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缅怀江上青烈士》除刊登

张爱萍、张震、张劲夫、金明、杨纯、刘玉柱等人题字外，还选登了江上青数十篇诗文，并有手迹。

抗日战争爆发后，江上青立即和陈素、莫朴、王石城等在扬州地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后曾率“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辗转于江苏、安徽、湖北各地。本打算前往延安，后根据武汉办事处董必武指示。将宣传团人员分配到广西部队从事政治宣传工作，江上青的组织关系也从中共中央长江局转到安徽省工委、继续在大别山区进行抗日活动。1938年秋，国民党六安县长盛子瑾部收复六安县城，名声大振，盛部有共产党员杨能（杨效椿）担任政治处主任，吴云邨任县政府秘书，故具有一定的战斗力。省政府委任盛子瑾为安徽省第六行政区（即皖东北地区，辖泗县、五河、嘉山、灵璧、宿县、定远、凤阳、怀远、盱眙等县）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瑾为了扩张势力和能在皖东北敌后站住脚，要求省动员委员会派青年干部随他去皖东北开辟工作。时动委会完全在中共安徽工委领导之下，为了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当即由工委宣传部长张劲夫以动委会名义派江上青、赵敏、周邨、谢景鸿、李艺、吕振球（亮屏）、王毓贞（王韶、女）七名共产党员组成特别支部，随盛出发，于11月份进入皖东北。同时和随后来到的还有吴云邨、徐崇高、石膏、刘培芝、贺汝仪、廖量之等同志。江上青以其横溢的才华、超群的能力、深得盛子瑾的器重，被委任为盛的秘书（实为专署的秘书长）。江上青利用与盛的关系，大刀阔斧地开展统战工作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活动。

江上青首先抓党的建设，发展一批秘密党员，并和先期从上海工委派来泗县开展工作的朱伯雷、戴纪亢接上关系，派吕振球到徐崇富到宿、灵一带寻找失去联系的党

员，盛子瑾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里的联系由党员领导的地方武装。“特支”成员成了骨干。江上青的公开身份是盛子瑾秘书兼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吴云邨任专署秘书，廖量之、周邨、贺汝仪等均在政治部任职。经过特支安排，又陆续在区、乡政权和税务系统安插和发展党员。廖量之、贺汝仪、石膏等都是由江上青介绍入党的。他们后来在各个岗位上发挥了主干作用。

面对皖东北大好形势，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局面，江上青及时派朱伯庸到山东分局汇报工作，分局乃派淄博特委组织部长杨纯带着江彤（女）和一个保卫人员，越过封锁线南下皖东北。为便于掩护，杨纯曾化名陈光薇，剃光头发，女扮男装。这一传奇式经历当时传为佳话。杨纯来到管镇，和江上青等，组建中共皖东北特委，杨任书记，江任委员（特支负责专署机关工作）。为工作方便江又委任杨任政治部民运科长。保安司令部政治部竟成了特委的工作机关。

江上青积极扩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盛子瑾从大别山带来皖东的武装人员只一百多人。经过江上青和地方党的工作，加上原有的国民党部队，共发展到六个支队（团），其中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三个支队，即赵汇川的三支队、徐崇福前面为富的特务支队和石膏后期组织的农民支队。为了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和政治素质，江上青向盛子瑾建议学习八路军、新四军的办法，在部队建立政治机关，为盛子瑾所采纳，只有盛带来的陈大瑶四支队（陈兼五河县长）拒绝建立政治机关。政治部（特委）委派一批党员（或建党对象）去各部担任政治处长和指导员。

为了更快地打开皖东北抗战局面，江上青认为必须邀请在附近活动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进入皖

东北合作抗日。他针对盛子瑾急于求援的心理，建议并经盛同意派吕振球到豫皖苏，同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司令员联系，受到热情款待。1939年7月，张爱萍将军协同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东进皖东北。支队所属胡炳云大队（番号“泰山”）对日寇英勇作战，打了几个漂亮的歼灭战，军威大振。张爱萍、刘玉柱作为八路军、新四军代表由江上青介绍，和盛子瑾会谈，达成协议，由专署拨款和供应给养给张爱萍部队以支持，还按照协议建立了“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由张爱萍、刘玉柱任正副主任。这样，皖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形成，皖东军事斗争形势大变。

江上青深知政权之重要，以他为书记的“特支”实际已担任了专署和政治部的重要职务。专署虽管辖九个县，但真正能行使职权而面积又最大的是泗县，所以盛自兼泗县县长不放。在江上青推荐下，派赵敏任县政府秘书，县长不在，可以代行职责又征得盛子瑾同意，派秘密党员到该县各区工作，吕振球、石膏、朱青日、赵敏、郑淮舟都曾在那里工作，其中三人当过区长。特委还三派谢景鸿到五河县政府任文教科长，派廖量之任灵璧县政府秘书，廖的妻子苏音则担任该县党的领导，派党员到县大队担任政治指导员。

有更多的党员担任乡镇长，税务局长。如陈国栋当时先任灵璧税务局长，后来担任灵璧县长。

具有远见的一着，是创办“皖东北抗日军政干校”。皖东北各县沦陷后，广大有志青年报国无门、在江上青建议下创办的这所干校，由盛子瑾兼校长，江上青兼副校长，实际主持校务。校址在管镇东南数里、洪泽湖湖边的黄庄。干校完全采取陕北抗大的办校方式以抗大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训，以抗大校歌为校歌，只

是把“黄河之滨”改为“淮河之滨”。教员有江上青、陈光薇、吴云邨、廖量之、赵敏、周邨等，最为生动最为学员欢迎的课是江上青讲的辩证唯物论，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给学员以深刻教育和良好印象。

我是学员的一个，是谢景鸿从五河动员数十名男女青年来干校学习的一个。学习不到三个月使我懂得不少革命道理。江上青和几位教员，都是我走向革命的启蒙老师。

干校培养了600多名干部、加上其它各式训练班，以及不久创办的第五临时中学，培养了大批青年，后来成为建设皖东北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皖东北日报》的创办，对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统一战线政策，传播抗日各战场的作战信息（包括八路军新四军战报），对鼓舞军民抗日斗志，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活动都起了很大作用，这个报纸由江上青委派政治部副主任廖量之（他在上海办过报，后来任邵睢铜地委《团结报》社长）筹备，委贺汝仪任社长。这张报纸常刊登江上青、张爱萍等人写的社论和文章。报社还翻印了《论持久战》等毛泽东著作、广为传播。

江上青及其领导的“特支”，所以能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做了这样多的工作。除了江上青个人的品德才华出众以外，是他认真地贯彻了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盛子瑾是黄埔学生，有爱国热心，有工作魄力，想干一番事业。他在六安当县长时即有和共产党人共事的经验。这次他被省政府委任为皖六区专员，明为提升，实想借日伪之手将其消灭。盛到达皖东北后，各县县长皆为桂系所委派，地方一些土豪劣绅亦多与桂系相勾结。愈使他感到不依靠共产党不行，不与八路军、新四军合作不行，不团结广大革命青

年和开明绅士不行。江上青也认为盛是一个可以争取团结的对象，只要是对皖东北抗日大局有利的事，江上青积极支持，并为其出谋划策。所以二人配合默契，盛对江委以重任，有利于江大展鸿图。

盛子瑾和共产党合作打开了皖东北良好的抗日统一战线局面，引起了国民党省政府的注意，当1940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时，乃将盛子瑾撤职而派反共先锋马馨亭代之。盛与我军联合将马击败逃走，蒋介石也撕下假面纱，明令通缉盛子瑾，盛被迫率其亲信陈大瑶部千余人出走。此时，皖东北各项工作都已粗具规模，党已在各个领域牢牢掌握了领导权。在特委领导下，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个从小到大，从乱到治的发展过程中，江上青功不可没，所以挽歌之中称颂他是“铁腕斗胆的股肱”，是恰如其分的。

分析皖东北根据地的初创和江上青的贡献，当然也要看到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以泗县为中心的皖东北地区，地处洪泽湖边，河汊密布，物产亦丰，农产品水产品尤为突出。徐州失守前后，中共中央对这个地区如何开展工作即作过指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出：“江北的洪泽湖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据此，党的力量从四面八方伸展到洪泽湖周围。一些地方（如宿县、泗县）秘密党员的抗日活动也活跃起来。据我所知，首批到达泗县的、是1937年秋上海沦陷后，中共上海工委所派的朱伯庸、戴纪亢、吴为真（女）、王冠群（女）等人（内战时期安徽党组织一直受上海或江苏省委领导）。当时泗县县长黎纯一，受过高等教育、有抗战热情。1937

年12月日寇占领盱眙，黎纯一曾率县常备队配合盱眙武装从日寇手中收复盱眙城，并受到省政府嘉奖。朱伯庸、戴纪亢等来后受到黎纯一的欢迎。黎纯一委任朱、戴为县政府政训处正副主任，做了大量工作，派党员到五个常备大队担任政治指导员，提高部队战士觉悟，增强战斗力，这支部队还曾增援五河，收复时村。他们在泗县中学内（已停课）举办训练班，训练青年学生，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1938年夏我在泗县参加抗日活动，曾在泗城东郊松林内第一次听过这位共产党人的报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朱、戴还派吴为真到五河，和濮斗辰、丁明志、邱奕盛（成宣）、张光万、蒋荷仙（蒋敏）、俞蕙如等组成的“五河县战时服务团”联系，濮斗辰是从陕北回来的，是五河青年抗日活动的带头人。在宿县，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甚多，原徐州特委组织委员孔子寿、宣传委员匡亚明出狱后即到宿县，联系失掉联系的党员和进步人士戴晓东、赵一鸣、李时庄、董畏民、孔笑三、陈凤阳、赵汇川、陈吾等成立宿县抗敌“救亡社”领导全县抗日，1938年2月沈联成接受郭子化指示回宿发展党的组织，1938年6月成立宿县特委，戴晓东任书记。徐州失守后他们分别组织游击队打击日寇。其中戴晓东部后进入湖西地区编入苏鲁豫支队。赵汇川部后通过江上青改编为皖东北专署、保安司令部领导下的第三支队。1938年秋以江上青为首的“特支”来到这里后，才能开创出抗日根据地。

1939年秋，正当皖东北地区抗日工作蓬勃开展，统一战线政治局面已经形成之际，桂系军阀与中央系统矛盾日深。桂派委任地方实力派反共野心家许志远为灵璧县县长，阴谋推翻盛子瑾取而代之。为了维护皖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大好局面，张爱萍出面调解许、盛矛

盾，相约在灵北滩河边张大路苏鲁豫支队驻地举行和谈。盛子瑾在江上青、朱伯庸等陪同下前往赴会。许志远表面接受调解，答应团结抗日，会谈后还召开群众大会，由张爱萍、江上青等人在会上讲话。会议结束后，张爱萍洞察许志远并无诚意，劝盛子瑾提高警惕，从我军驻地马厂返回专署，以防不测，盛麻痹未听劝告，带着卫队沿滩堤东返，往至泗县北小湾村时，突遭大柏反共顽固地主武装柏逸孙、王铸九部队袭击。此时，江上青骑马上前高声喊话：“不要误会”，柏、王部队以为他就是盛子瑾、集中火力

射击，江上青当即遇难，同时牺牲的还有朱伯庸以及国民党几位进步民主人士。盛子瑾听到枪声，躲进树林幸免于难。八路军闻枪声赶来救援，并掩护盛子瑾绕道马厂返回专署。江上青牺牲后，敌人将其遗体抛入淮河，顺水向下游飘浮数十里为群众发现打捞上岸。噩耗传来，皖东北抗日军民、各阶层抗日进步人士，特别是受过江上青教育影响的青年，无不为之震惊、痛心、许多人伤心哭泣，盛子瑾也为失去股肱而抱头痛哭。在崔集，青阳召开几千人的追悼大会，当唱起挽歌时，全场一片哭声。江上青牺牲时

年仅 28 岁。

江上青夫人王者兰当时住在扬州闻讯悲痛欲绝，在大嫂吴月卿陪同下，由我二叔欧瑶圃护送并带路到崔集扫墓。王者兰作七律一首，题为《悼江上青》：

噩耗传来处处惊，才华未展恨难平。

十年壮志山河动，一片丹心日月明。

誓抚遗孤承素志，尽除奸慝报深情。

黄沙血染英雄骨，碑碣永留万古名。

（责任编辑 萧 徐 一民）

广告

中医肾病医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古都朝歌，人杰地灵，医圣张仲景的故乡，一颗璀璨的明珠吸引着海内外愈来愈多敬仰的目光。国内专攻肾病的同济肾病研究中心，集医疗、科研、制药、人才培养于一体，多年来历经临床探索研究取得中医肾病医学多项突破性成果，为国内外众多肾病患者解除了身心痛苦，赢得了千百万患者崇高赞誉。院长兼中心主任陈勇，因突出成就荣获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青联委员殊荣，领导全体医术精湛医学造诣深厚的专家同仁，瞄准国际最新水平，发挥群体专家优势，形成强大攻关阵容，在治疗急性慢性肾炎、肾病综合症、慢性肾衰尿毒症的领域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丰硕的成果。全国第三届中西医结合肾病研讨会上，该中心的成果肾特灵自然免疫平衡疗法，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与震惊，一致评价为近年来肾病治疗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科技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单位多次予以重点报道，高度评价为《中医肾病医学的突破性进展》、《肾病医学的一项突破性成就》、《同济肾病中心攻克肾病引起专家学者震惊》、《中医治疗肾病取得重大突破》……

肾为人体先天之本，生命之根，人体若有疾病必定会累及肾脏，而肾功能的盛衰又直接影响全身的健康。肾病是一种常见又多发的疑难病，也是长期困扰着医学界的顽症。病人身心长期倍受折磨。同济肾病研究中心，独辟蹊径，历经数年寒来暑往，春秋交替，长期而

艰辛的攻关，终于创造出全新的中医治疗肾病的系统理论和方法。他们以现代免疫平衡原理这把钥匙，揭开了肾病机理之谜。运用经典验方，进行筛选配制，以冬虫夏草、鹿茸、天龙地虎等几十味名贵中药，逐一核定用量，反复酌取，精心制练出有独特疗效的肾特灵、用于临床施治，不断观察、记录，修改治疗方案，在大量治愈患者中询问药效，采访反馈，临床攻关研究出“肾特灵自然免疫平衡疗法”，可使一般早中期肾病患者治愈康复，甚至能使部分晚期肾病患者的治愈康复，长期临床实践中“自然免疫平衡疗法”，形成一个系统完整治疗肾病的配套体系。历年来，中心为国内外无数深受肾病折磨的患者解除了痛苦，一批批重获新生的病人无不交口赞誉，相互传扬着神话般的康复福音。随着国内外各种邀请学术成果交流的日益增多，随着中心声誉远播四方，“肾特灵自然免疫平衡疗法”愈来愈受到海内外广泛的肯定和欢迎，连续荣获中国医疗博览会及中国医药科技精品博览会金奖殊荣。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表示：“自然免疫平衡疗法”可能将为中医走向世界攻克肾病难关做出突破性的中医学贡献。

联系地址：中国河南淇县朝歌路 34 号 淇县同济肾病中心医院

咨询热线：（0392）7222999 7221333 邮编：456750

陈布雷、陈璉

父女

分道扬镳

● 章学新

1967年11月20日，初冬的凄风苦雨，伴随着林彪、“四人帮”掀起的揪叛徒、特务的政治寒流，使上海人民感到透心的寒冷。就在这一天的凌晨，矗立在新闸路的泰兴大楼里，一个48岁的女干部，从11层楼的窗口纵身下跳……

她就是陈璉。从家庭出身来说，她是蒋介石的贴身秘书、“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的嫡亲女儿，天生的“黑五类”；但是，从政治身份来说，她是抗战初期的中共党员，新中国建立后，曾任青年团中央常委、少年儿童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全国妇联第四届执行委员，中共“八大”代表。1956年2月，她在第二届政协的大会上说：“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地，但是我们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恩来总理带头为之鼓掌，毛泽东主席马上说：“这话说得很好嘛！”

遗憾的是11年之后，在“史无前例”的年代里，党组织对陈璉的评价和结论，竟然统统被推倒，把陈璉和她早已背叛的阶级和家庭强行捆绑一起，当作“叛徒”、

“特务”肆意鞭挞。在严重的政治迫害下，陈璉不惜以生命进行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沉冤昭雪，真理复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陈璉恢复了名誉。

失态的父亲和倔强的“怜儿”

1919和祖父年10月3日，陈璉出生在浙江慈溪县西乡官桥，曾祖两代是茶商，到父亲陈布雷时由商入士。陈布雷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进入堂兄陈杞怀创办的《天铎报》当编辑，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传来，沪上各报还称革命军为“逆军”时，《天铎报》一枝独秀，称它为“义军”，陈布雷以文笔犀利的短评，在新闻界初露头角。母亲杨品仙和陈结婚后，伉俪情深。六年间连生了三男两女。由于生育过密，气血亏竭，以致生陈璉时血崩昏厥，又得了“产褥热”不治身亡。陈布雷因此迁怒于婴儿。一天，尚未满月的陈璉哇哇啼哭，陈布雷怒不可扼地说，“都是你这孽障害了你的母亲”，随即捧起襁褓往痰盂里塞，企图溺杀。小陈璉大声惨叫，家人破门而入，失去理智的陈布雷竟然提起襁褓掷向窗外……。幸而天井里有一个蔑棚，架住了襁褓。这时，外婆哭着叫着：“快把小囡抱下来，可怜的囡啊！”从此，婴儿就名唤“怜儿”，由外婆带回慈城抚养，直到上学时，父亲以怜字的谐音，起名为“璉”，一来表明他回心转意，认同孩子可怜；二来和怜儿的姐姐细儿的单名“琇”相对应。

丧偶以后，陈布雷重返上海，在陈杞怀办的《商报》做编辑主任。这时期，南北军阀混战，孙中山在广东举兵讨伐陈炯明，《商报》在反对曹锟贿选，军阀孙传芳入浙，段祺瑞把持军阀政府等重大事件中，立论和广东的革命政府遥相呼应，多数文字出于陈布雷之手，特别是“五卅”运动中，《商报》爱国反帝，每日一评，有的文章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响导》所转载。共产党人萧楚女为此致函陈布雷，赞扬他的战斗精神，希望他能为无产阶级事业贡献力量。但是，陈婉言相拒，他认为共产党的理论太激进。正是这种局限性，使他一步步地陷入蒋介石的政治泥坑而不能自拔。1927年2月，率北伐军打下南昌后的蒋介石，为拼凑班底和武汉政府分庭抗礼，当面拉这位宁波同乡入伙。陈先是推托，但经不起蒋亲自介绍的“盛情”，终于加入了国民党。国共合作破裂后，蒋介石打下平津，宣称统一大业“正告完成”，不可一世地一面整肃内部，排除异己，一面加紧箝制民众运动，“不容共产党存在”，陈布雷代蒋起草的《祭告总理文》中攻击共产党“背弃服从三民主义之誓言，压迫我党，姿意捣乱，故有清共之举”，说蒋的罪恶行径“无背于总理之遗教”。陈布雷既上了蒋的船，

他笔底的“文采”、“声情”自然为主子所用了。

童年时代的陈璉，失去了温馨的母爱，也难得和父亲见面。1921年冬，陈布雷续弦王允默后，在上海安家，怜儿继续在外婆身边，偶而父亲回乡省亲，来去匆匆，除了翻看怜儿的作业本外，总是道貌岸然，不苟言笑。陈布雷当年对怜儿的失态，外婆是耿耿于怀的，但是，说起女婿的才学，她不止一次向怜儿夸耀。比如，1904年陈布雷科举应试的故事：那时，陈布雷热衷于阅读《时务报》、《浙江潮》等新派报刊，对应付科举的制艺文字已不感兴趣，但他父亲却命他到县城去应考“童子试”，他仓促上阵，结果列名第151。父亲斥他：“全县应考者一百五十一名，你竟然‘背了榜’，有辱我家门楣”。陈布雷央求道：“父亲息怒，儿愿再试第二次”。经过一个多月准备后，他到宁波城里参加“府试”。考试共分五场，前四场考的是《四书》义、史论、策论和策问事务。第二场，陈布雷名列第一，第四场名列第二。第五场考《五经》义，交卷后没有发榜。这次的主考官特别看重年轻的考生，曾召陈布雷去内署书房，问他年龄，答：十五岁。接着又命题两道，要他当场交卷。最后发榜，陈布雷名列前茅。这个故事给陈璉印象很深。她心目中的父亲是严而少慈，敬而不可亲。

陈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是在1932年。那时陈布雷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家住在西湖的小莲庄，在鄞县上学的陈璉和陈琇被接到杭州团聚。一天，父亲嘱咐女儿：“女孩子家最好是学师范，将来不能在社会上做事，也在家教育子女”。他指点女儿去考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细儿考普师二年级插班生，琇儿考幼师一年级新生。”姐妹俩顺从父命投考。过了几天，陈璉站在杭师录取新生的榜文前，半晌说不出话来。原来幼师班录取的23名新生中，她列名榜尾，就是说和父亲应“童子试”时一样“背了榜。”

“肯定是因为阿爸的面子照顾我进去的。”倔强的陈璉又懊恼，又惭愧，她宁肯再考一次，也不愿意仗着父亲教育厅长的关系入学。回到家里，她蒙着被子哭了一场，后来才弄清楚，学校此次发榜以姓氏笔划为序，23名新生中，“陈”字笔划最多，她才排在了最后。一年后，她听说父亲当年毕业的浙江省立高级中学，以注重数理著名，但录取比例只有考生的十分之一。陈璉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知难而进，决定投考浙高。好胜的陈璉，终于戴上了浙高的校徽，穿上了闪耀着两排灿灿金光的铜扣的黑色校服。

这是陈璉第一次拂逆父命。

民族抗战洗礼中的父和女

陈璉到杭州时，抗日救国的声浪正在日益高涨。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五个月，“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20万日本海军陆战队猛烈进攻上海，英勇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和日寇相持33天，蒋介石对抗日军民不予接济，反而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下，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为了“安内”，身为浙江省教育厅长的陈布雷，和省党部、省警务机关结合，严密控制学生的言行，一有异动，立刻现场解决。这期间，陈璉经常和五婶洪克平、七叔陈训惠及表哥翁泽永来往。五婶和七叔思想进步，常常向他们讲述抗战大事，介绍进步书刊，还教他们唱催人奋进的《毕业歌》：“……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唱慷慨激昂的《热血歌》：“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牛马？”在陈璉的心目中，他们是可敬可亲的长辈。但是，在父亲的言谈中，却把他们看成是不安分的异端，说什么他们思想激进，是受了共产党的煽惑。陈璉为此纳闷。

为了“安内”，1934年陈布雷辞去了教育厅长职务，到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担任设计委员会主任，这以后，陈璉很难得见到父亲的面。后来才知道，那时正是蒋调集百万大军第五次“围剿”红军的时刻，他竟做了蒋“督剿”红军的心腹谋士。1937年初，全家相约回慈溪过春节，陈璉又没有见到父亲的身影，他正闭门造车为蒋介石编造《西安半月记》。根本没有在“西安事变”现场的陈布雷，却要蒋介石头上画灵光圈，难怪他在日记中自叹：他的“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伟大的民族抗战，使陈璉一步步认清生活的道路，也促使陈布雷重焕出爱国的热情。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时，共产党人邹荃麟、王闻识等创办了《战时生活》杂志，表哥翁泽永是杂志的编委，陈璉不但是《战时生活》的忠实读者，而且经常和编辑部来往。看到他们为抗日救亡奔忙于前线和后方，生活紧张而充实，18岁的陈璉跃跃欲试地正想和他们一起奋斗。

如果说，平津陷落后蒋介石对日寇还抱有和平幻想，那么“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讲话中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这篇出自陈布雷手笔的文稿，为蒋介石赢得了一块金字招牌。当然，这时的陈布雷对真诚抗日的共产党也讲过一些好话。9月，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他代蒋起草的讲话中，肯定《宣言》中所举诸项“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决议案相合”，在民族存亡危难之际，两党“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图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这是在民族大义前他天良未泯的表现。

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后，陈布雷派人接家眷，陈琏和陈琬离开杭州，随家庭入川。临行前，她们去向表哥告别。这时，上海已经沦陷，日寇的铁蹄已越过松江，美丽的西子湖，行将被蹂躏，翁泽永告诉陈琏，万一杭州陷落，他们将撤往金华去打游击。

陈琏随家西行，先坐汽车经皖南山区转到武汉，再乘长江轮上溯，一路上兵荒马乱，敌机空袭，遍地都是流亡的难胞。12月7日，他们到达重庆，20天后，杭州失守，翁泽永等辗转到达金华，在黄绍竑的游击队中做宣传工作。不久，翁泽永到武汉担任郭沫若的秘书。

陈布雷的家安在离重庆30多公里的北碚，这是嘉陵江畔的一个静谧小镇，此时人口陡增，来的多是从沦陷区入川的公教人员眷属。这时，陈布雷跟随“委员长”住在战时的政治中心武汉，武汉失陷后，又辗转于湖南衡阳，广西桂林，直到1938年末才到重庆。

在北碚，陈琏和陈琬先在小学里当了半年义务教员，第二年夏天，陈琬考入在沙坪坝的中央大学，陈琏进入国立二中。二中是在原来的合川中学基础上扩建的，学生大多来自沦陷区，国难当头，他们抗日救亡的热情很高。

刚进入青年时代的陈琏，勤学，敏思，又有主见，她出身宦门，但并不娇气，穿的是蓝布旗袍青布鞋，乌黑的秀发衬托着一张丰满的脸，热情而深沉的双眼，透出熠熠的灵气。在学校里，他除了担任夜校的语文教员外，还积极参加救亡活动。到农村去进行抗日宣传时，跋山涉水，她不觉得苦；重庆遭大轰炸时，她参加慰问难民，输送伤员的工作，日夜不停。她喜欢音乐，爱好文学，读了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罗亭》后，她鄙视空发议论而无实际行动的“罗亭式”的贵族子弟，而欣赏那些敢于为废除农奴制、反对沙皇专制而献身的革命者。有一次，她收到表哥从金华寄的一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心情激动地回信说：“这是一本好书，虽然我从朋友处借来读过一遍，得到你从前线寄来的这本书，更觉得珍贵。这本书本来值得一读再读”，她告诉表哥，“我这里也有一些朋友，常常集在一起讨论时事，也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这时，陈琏感到苦恼的是时间不够用。但她理智地认为国难当头，青年人不应置民族的命运于不顾，埋头书本。为了无愧于时代，她在信中告诉琬姐，在合理支配时间方面，她“完全是理智的了，我们不需要那种



陈布雷（右1）与陈琏的继母王允猷（右2）

‘死’的知识，我们的时间应该更有价值地利用”。这是在生活的激流推动下，她对人生的意义的觉悟。

她跨进了共产党的“门槛”

在陈琏特别忙碌的红五月里，年届半百的陈布雷因为精神疲惫、体力不支，来到北碚附近的古刹石华寺休养，在将近两个月里，父女间有较多的接触机会。

如果说，当年父亲曾把怜儿看作勾去亡妻性命的无常，那么现在他似乎想以爱抚来弥补前嫌。他翻阅陈琏的作业本，喜形于色，却不当面夸奖，只是在给四弟的信中说：“这次回碚，发现琏儿的英文比我年轻时还要好，甚为快慰”。有一次，在和他的下属“江西才子”陈芷町议论文字时，谈到陈琏的文才，两人满意地放声大笑。但是，当发现女儿思想“激进”时，他内心感到几分隐忧。

而陈琏，随着政治水平的提高对父亲的认识也在深化。父亲的文才，她曾听到一些褒贬。1938年纪念抗战一周年时，蒋介石发表了三篇表示要坚持抗战而被誉为“三联璧”的文稿，其中的《告全国军民书》出自陈布雷的手笔，《告日本国民书》由郭沫若捉刀。这年年底，汪精卫投降日本，陈布雷为蒋介石拟稿的《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一文中写道，“日本不过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义，首先控制我国。我们宁可举国牺牲抗战，如果这个共同防共的要求可以应允，还待今日吗？”其言不可谓不鲜明，可惜一个月之后，在国民党五中全会时，他为蒋起草的讲话中，却一反常态，大肆鼓吹要“强化”国民党以“防共、限共、溶共”，为蒋制造反共摩擦张目。政治上瞬息变色的陈布雷，连自己也说，“我如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

在生活上，陈布雷朴素廉洁，克己奉公。在国民党

的豪门官僚中不断爆出贪污腐化，发国难财的丑闻时，他不仗权谋私，还谆谆告诫家人保持清白家风，在政界文界颇有好评，陈璉对此是尊敬的。

这年夏天，陈璉高中毕业了。7月，在国民党顽固派加强反共宣传和特务活动时，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在日记本中抄录了屠格涅夫所作《门槛》的诗句，来表明入党的心迹。原诗描述一个帝俄时代的女革命者，参加“十二月党”起义时接受考问的对答：

“好。你准备着牺牲吗？”

“是。”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被毁掉甚至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也不要怜悯，我也不要声名。”

俄国的“十二月党”起义，因脱离人民群众而失败，但他们的牺牲并非徒劳，正如列宁所说，他们“帮助唤醒了人民。”集中在陈布雷身上的矛盾现象，陈璉入党以后，渐渐明白过来，原来他既要抗日，又怕人民力量壮大；既有爱国热情，又不愿人民起来革命；良知未泯而身不由己。所以，陈璉借屠诗明志，向党表明背叛家庭，矢志革命的坚定意识。温文尔雅的陈璉竟然蕴藏着如此坚烈的决心。

高中毕业后，陈璉不投考近在咫尺的中央大学，却报考了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因为那里有吴有训、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等名教授，而且在学生运动中又具有民主传统。这一天，陈璉到重庆美专街1号侍从室的办公处，向父亲告别。

“你考的什么系呢？”父亲问。

“地质系。”

“这就对了。璉儿，我希望你好好地学技术……”陈布雷点起一支烟，说：“我历来反对自己的子女搞政治，青年人何必卷入政治呢！”

这时，陈璉感到父亲希望她做一个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青年，谈话的词锋便尖锐起来。

“阿爸，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爱国总是应该的。”

“璉儿，我也爱国，当年……”陈布雷侃侃地向女儿叙述当年他发起过反清组织，反对过封建军阀，以及在“五卅”运动中的光荣史后说，“爱国当然应该，但我希望你无论如何不要参加反政府的活动。”

“阿爸，前方将士在浴血抗战，后方的官僚却在发国难财；汪精卫又当了汉奸，青年人关心国事，怎么能说是反政府呢？”

“这……这……”陈布雷噤嘴半晌说：“璉儿，你要进步我不能阻挡，不过你要考虑为父的处境啊！”

“我不会做出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也一定保持清白家风。”陈璉理直气壮地说。

陈布雷望着从点燃的纸烟里袅袅上升的青烟陷入

沉思。

陈布雷托周恩来寻女儿

自从西南联大迁到昆明，山城里抗日民主的气氛非常浓郁。西南联大由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合并组成。平津失守后，三千多学生先迁到长沙，接着南京失陷，师生们跋山涉水，跨洞庭，过沅江，徒步三千里，沿着红军的足迹，出湘入黔，到达大西南后方昆明，一路采风，光大了“五四”和“一二九”的革命精神。但是国民党当局对学生防范有加，陈璉入学时，重庆当局甚至要取消校里的进步社团活动，幸而朱德总司令利用旧谊，致函云南省主席龙云，希望他“发动民众，巩固其爱国热忱，发挥其救亡伟力”，联大的秘密党组坚持开展工作，国民党也无可奈何。

联大的党支部书记是经济系二年级的袁永熙，他1938年入党，曾参加过中共南方局的训练班，陈璉接上组织关系后，就在袁领导下工作。后来联大建立了党总支。袁为书记，学生团体“群社”的负责人邢方群为组织委员，陈璉为宣传委员兼女生支部的书记。

陈璉对人热情，乐于助人，有一次，“群社”的曹学源等同学办的民众夜校经济发生困难，陈璉得知后，便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陪同曹去找著名妇女运动领袖罗叔章，请她设法筹募，夜校得以如期开学。

为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联大的剧艺社准备上演《阿Q正传》，党组织派陈璉负责前台的招待工作。她和同学一起，成天忙碌，丝毫没有“小姐”的架子。

来自沦陷区的同学，经济拮据，靠贷学金生活，有的冬天连袜子都穿不上。但也有一些达官贵人的子弟，女的浓装艳抹，浑浑噩噩以“校花”自居，和西装革履的追逐者出入歌舞厅、咖啡馆，陈璉颇为反感。有一次，南方局主办的《战时青年》约陈璉写文章，她以《孔雀》为题，在文中写道：孔雀开屏是供人欣赏美丽的羽毛，进步的女青年不能只炫耀自己美丽的外表，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美丽的灵魂。

一位杭州的老同学来向陈璉求助，她叫郑延，正和一位秘密党员恋爱中。她父亲对左派青年不满，出面干涉，托人为郑延另择对象，男方恰好是陈璉的近亲。陈璉为此转告她的亲戚，说郑已有对象，理应成人之美，不可强行插足自讨没趣。郑延感激地对陈璉说：“你这釜底抽薪的妙计真灵啊！”当问到陈璉的恋爱问题时，她没有明确答复，事实上，爱情的种子正在陈璉和袁永熙的心坎里悄然萌芽。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一面残杀新四军，扣留军长叶挺，一面严密封锁消息，歪曲事实真相。联大党组织冒着危险，将登有周恩来题

词：“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和周写的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新华日报》张贴在校园里，还抄贴了中共南方局散发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遭围歼真相》。顿时，激起了师生们的强烈义愤。特务分子如临大敌，紧急动员起来追查。当特务头子康泽从重庆赶到昆明，企图兴师问罪时，陈璉和袁永熙等离开了联大。原来，为了保存力量，避开锋芒，中共云南省工委指示，联大已受国特注意的党员和进步同学，立即撤离学校，在袁永熙领导下分散隐蔽到滇南个旧地区，万一形势进一步恶化，准备在当地农村打游击。

在陈璉的人生道路上，这是头一次面临战斗的考验，她处变不惊，沉着地按平时的习惯把床铺整理得干净整齐，书籍文具安放有序，悄悄地踏上征途。她“躊躇了很久”，提笔给琇姐写了她所谓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说：“时代既然决定了要在我和家庭之间排演悲剧，我是无法拒绝的”，“相信你的怜妹，不是随便给自己选择路的。这道路诚然会很艰辛的，但是为着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说”。信是1940年1月23日发出的。

陈璉失踪的消息，使陈布雷家里惶惶不安。正这个时候，陈琇把琇儿的“最后一封信”交给父亲。陈布雷反复阅读琇儿的信，似乎有些意会。“一定是到延安去了！”于是，委托他的外甥、郭沫若的秘书翁泽永设法从中共方面寻找。

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到重庆天官府郭沫若的寓所，翁泽永趁机把陈布雷寻女的请求，当面向周恩来夫妇汇报。这时，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被击退，形势开始缓和，周恩来微蹙浓眉，思考了一会：“我马上查一查，如果在我们那里，总是可以问得到的。”

周恩来立即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延安方面发了电报，回电一致答复陈璉没有去抗日根据地。周恩来请翁泽永转达陈布雷：“既然不在前方，也没有去延安，可能是隐蔽起来了，再不是被你们的特务机关扣押了。大家再设法找一找吧？”陈布雷得到周的答复，连声说：“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过了几天，昆明和重庆的报纸上同时登载一则启事：“琇儿，见字盼即回家。父示”

陈璉在何处呢？离开昆明后，她化名程国仪，在石屏县高级师范附中教英语，兼任初二的级任导师。邢方群在蒙自高级职业学校任教，袁永熙先在一个旧安排疏散的同志，后利用社会关系隐蔽在四川白沙国立编译馆的姐夫孙国华教授家里，那里靠近重庆，信息较为灵通，临走时他叮嘱大家：“耐心隐蔽，形势好转后组织上会派人来联系的。”

新的学期开始时，陈璉在石屏的教职发生了困难。因为有一些三青团员从联大毕业后，分派到滇南的学

校里任教。真是狭路相逢。为了不暴露身分，陈璉和邢方群只得另觅途径，转移到宜良狗子街镇附近的西村，一个当地同志的姐姐家里。他们分住在农村的土楼里，一时找不到社会职业，只好吃包伙，读书报。

1942年春节前，袁永熙利用寒假从白沙来到重庆，向中共南方局请示行动。他先通过沈钧儒的侄女沈语和邓颖超接上头。一天，他以手持报纸为暗号，等候在指定的地方，搭乘周恩来的汽车进入上清寺50号周公馆。邓颖超便找来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让袁把联大疏散的党员的姓名和隐蔽地点一一汇报登记。

“陈璉在哪里？”邓大姐关切地问。

一听说陈璉在宜良农村又没有社会职业掩护，邓颖超说：“这样反而容易暴露。”

接着钱瑛传达了中央对蒋管区党的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根据这个方针，周恩来向大后方的党员提出了“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具体要求。

不久，党组织派人把陈璉接回重庆，“失踪”一年的女儿回到了父亲身边，陈布雷喜出望外，干姜瘪枣般的脸上，浮现出难得的笑容。

她听从党的安排

重庆美专街1号是陈布雷主持的侍从室二处所在地，二处是侍从室的核心，主管政治、经济和党务，以及蒋介石直接交办的急务，位居机要，所以戒备森严。这时，陈布雷的家眷已由北碚迁到和侍从室二处毗邻的4号楼。陈璉回家以后，进出很不自由，她感到自己被关在一个无形的笼子里了。她遥想北国的延安，遐思驰骋在抗日前线的同志，更惦记着回西南联大复学的袁永熙。她向周恩来和邓大姐请求，批准她到延安去。

“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战时期，你去了延安，如果布雷先生再向我要人，你说我是给好还是不给好？！”周恩来要陈璉以大局为重，留在陈布雷身边，借此机会使陈接触一点进步思想。他强调说：“这有利于促进他对抗战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邓颖超也谆谆劝说陈璉，听从党的安排，陈璉这才安下心来留在父亲身边，并且进入中央大学历史系借读，组织上由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直接联系，这以后，她周末从沙坪坝回家，总是先到1号楼，再和父亲一起回4号楼，这是父女俩接触最多的日子。

1942年10月，正在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爆出了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巨款的丑闻，许多爱国的参政员联名提案要求政府严办，连监察院长于右任也提出要弹劾孔祥熙。会议主席不知所措，只得报



陈布雷和儿子必大、小代（1963年上海）

告侍从室。

一个周末的晚上，陈布雷愁眉深锁，不知该如何向“委座”提出处理孔案的建议。他想听听社会上反映。

“琏儿，通货膨胀，金融紊乱，社会上有何反响？”陈琏不知道参政会上追查孔案的情况，但她听到了许多象“孔二小姐”丑闻的社会舆论。她就势问父亲：

“阿爸，你知道孔祥熙劳军的丑事吗？”

“不知道，你讲一讲。”

有一次，孔祥熙为收买人心，“慰劳”驻军，每个战士一盒纸烟、一条毛巾，招待看一场电影。不料战士们对孔家的丑闻很是反感，结果有的战士把香烟和毛巾丢进了厕所。陈琏说：

“他大发国难财，却以小恩小惠欺世盗名，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

陈布雷没有责备女儿，只是一声长叹，一阵呛咳，自言自语地说：“唉，倘若我能重返报界该多好，只是……他肯放我吗？！”

蒋介石当然不放他的“文胆”。在陈布雷向他报告了参政会上要求弹劾孔祥熙后说：“庸之先生也太失公务人员的体统……”，蒋介石当即嘱咐陈布雷，为维护党国声誉，友邦观瞻，孔案参政会不得制成提案，可用书面“检举”，由蒋亲自处理；同时，要陈布雷控制舆论，以新闻界前辈的身份，找有关参政员“谈话”。原来，这个独裁者给陈出了一个难题，要他一身二任，既当“保镖”，又当“说客”。陈布雷只好从命，以报领袖“知遇之恩”。

又是一个假日的晚上，陈布雷正伏案修改文稿。这

是一篇被蒋介石用红笔删改得面目全非的稿子。见女儿进来，他搁下笔，情不自禁地说：“唉！为人捉刀，不能以己之笔达己之意，最大的苦事啊！”

陈琏说：“阿爸，你经常头疼失眠，这苦差事也该交卸了！”

陈布雷没有理会，若有所思地拉开抽屉，拿出一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交给女儿说：“你上次忘记了一本书。”接着，又老调重弹：

“琏儿，我多次说过，希望你体谅为父的苦心，不要从事政治，应当静心读书，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

“阿爸，你不谋高官，不图厚禄，但你何曾脱离过政治？多年来你积学储宝，也该酌理行事了！”

“儿啊！你还年轻，国府虽然腐败，总是正统啊！”

“其实，你维护的正统，已经违背了历史潮流，你为何要迁求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呢？”

陈布雷愕然，内心里一阵震撼，半晌，无可奈何地说：“好了，不要说了，家庭里不谈政治，不谈……”。

有情人终成眷属

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响彻山城时，陈琏已是中大历史系的研究生兼助教了。正在家里过暑假的兄弟姐妹们兴奋异常，提议要去参加欢庆胜利的游行。陈布雷一边念着“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诗句，一边又茫然地对妻子王允默说：“太突然了，准备不足啊！”

胜利来得“太突然了，准备不足啊？”对陈布雷脱口而出的这句话，陈琏感到莫名其妙。8月底，毛泽东主席飞抵重庆，参加和平谈判，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便以武力进攻解放区。陈琏这才意识到父亲所说的“准备不足”的真正含义，原来蒋利用谈判的时间在积极准备内战，这种违背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的行径，激起了热爱和平人民的强烈抗议，于是，以西南联大为核心的昆明大中学校师生，率先举起反对内战的旗帜。国民党当局竟不顾一切向手无寸铁的罢课师生进行武力弹压，酿成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消息传来，陈琏义愤难平，并且深为在第一线组织群众斗争的袁永熙的安全担忧。

1946年4月，袁永熙来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工作。主管学运的钱瑛赞扬了他们的斗争精神，向袁布置了新任务，要他率领联大的党员随学校复员迁返平津，并且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最后，钱大姐说：“陈琏在中大，你可以去看看她。”阔别数年的恋人，终于在嘉陵江畔互道别后的经历；行色匆匆，又在互相祝福中分手。这时，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大批接收人员涌向收复区，陈琏也和家庭一起，在“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诗句感染下，坐长江轮出巴峡穿巫峡，顺流东下……

这年秋天，陈琏在上海《申报》馆的资料室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为什么她不住南京，不回中大而到上海呢？因为陈布雷的家安在上海。战前，他住在南京颐和路43号，这里建筑并不豪华但环境非常幽静。1月间，陈布雷曾托南京市长马星樵要他原住的寓所，马答复说房子已被捷足者占去，另觅住房要支付一笔押租，陈只得将家安在上海，这时他“健康日损，脑力益衰”，便到蒋介石的家乡溪口，借休养之机，为蒋修家谱去了。陈琏本来不满意中央大学的政治环境，趁此机会放弃了历史系助教的职务，回到了上海。

不久，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成立，陈琏和钱瑛接上了关系。钱瑛是中共上海局的成员，但她却直接联系着平津的学运工作。为了适应西南联大复员后的新形势，党组织决定平津地区学运的组织领导分南北两系，南系由袁永熙负责，和钱瑛直接联系；北系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领导，在中央的统一方针下，工作上互相配合，这样既照顾了联大结束后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的历史关系，也保障秘密工作的安全。这时学运蓬勃而起，陈琏要求调到北平和袁永熙等在一起工作。钱瑛完全理解她的心情。

10月，陈琏登上从上海到天津的邮轮，奔赴北平，一路上她默诵着雨果的名句：世界上最宽阔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心灵！

全面内战的暗影笼罩着古都北平，袁永熙和邢方群等正在这里发动群众为反对内战而奋斗。陈琏到达后，先在《益世报》编辑副刊，旋到贝满女中担任历史课教员。根据工作需要，袁永熙决定由邢方群、陈琏和《平民日报》的李炳泉三人组成职业青年支部，邢为书记。

这年圣诞节，发生了美国兵奸污北大女学生的“沈崇事件”，北平的大中学生率先起来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天津、上海、南京的学生继而罢课和举行示威，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暴”运动。国民党北平当局出动八千多警察和宪兵，大肆逮捕学生和市民，妄图一举扑灭势不可挡的革命烈火。谁知事与愿违，5

月初，学生提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口号，反蒋的斗争如春风烈火，燃遍全国六十多个大中城市。在国民党军警的镇压下，天津和南京酿成了“五二〇”血案，正在转战陕北的毛泽东为此发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文，称正义的学生运动是反蒋斗争的“第二条战线”。

“五二〇”之后，袁永熙到上海向钱瑛汇报工作。上海的中共办事处已撤退，钱瑛化名陈平，隐蔽在上海，在蒋介石“勘平共匪叛乱”的叫嚣声中，从事秘密工作。她带着袁永熙在一个阁楼上和中共上海局主管学运的吴学谦等一起听取汇报，研究工作。一致强调蒋管区的斗争，中心是教育人民，壮大革命力量；要积蓄力量，准备长期斗争。当袁提出和陈琏结婚时，钱大姐非常支持，她知道这对情人已经相爱七年，组成家庭后，更可利用陈布雷的社会关系作掩护。她叮咛说：“婚事要办得体面一点，因为是陈布雷的女儿结婚嘛！”

陈布雷没有见过这位女婿。他写信给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请他了解一下袁的情况。张与文教界过从甚密，他打问了吴晗、叶公超和朱自清等教授。吴晗和袁永熙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就有交往，叶公超是袁的姐夫，朱自清早知道袁是孙国华教授的内弟，胡乔木曾托袁给他带过信。他们异口同声，说小袁是个正派的有才学的青年。张伯瑾把了解的情况函告陈布雷，同时指出小袁思想有点左倾。

“有点左倾也就算了，琏儿找的对象总是左的。”陈布雷放心地对王允默说：“左的青年一般比较正派，只要不是共产党就好。”

59岁的陈布雷自感“体力衰老已难补救”。抗战胜利侍从室撤销后，蒋介石又封他为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这时他正在庐山休养，琏儿的婚事特委托他的六弟《申报》总编辑陈训愈去北平主持。

1947年8月，北平东交民巷口的六国饭店豪华的大厅里，张灯结彩，共产党员陈琏和袁永熙隆重举行婚礼，精美的请柬上印着陈布雷的名字，北平市的各界要人纷纷前来庆贺，证婚人是北平特别市的市长何思源。

这就是生活的复杂性！

才过蜜月便入牢房

1947年秋，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东北民主联军的秋季攻势正猛烈展开。蒋介石集团在战场上捉襟见肘，在后方加紧特务活动。

临近中秋的一个晚上，刚刚度过蜜月的袁永熙正召集职业支部的邢方群、陈琏开会。10时左右，几辆

美式吉普驶进东城棉花胡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中，来人自称是李宗仁的行辕派来的，一定要找袁永熙。袁警惕地让陈琏去应付，自己返身回卧室，将油印的《民主青年联盟章程草稿》塞进一只软椅的坐垫内。转眼间，几个特务已经破门而入，持枪逼问：“谁是袁永熙？”

“我就是。”袁挺身而出，接着特务又问邢方群，邢答是北大的学生。特务们把邢看守在门外，随而在室内和院里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根本不理睬袁永熙和陈琏的抗议。

糟糕的是油印的《民主青年联盟章程》被特务搜了出来，前来向袁永熙汇报这一文件修改意见的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陈彰远从另一间房内被押了过来。机敏的袁永熙望一眼衣着朴素、状如失业青年陈彰远对军警特务们说：“他是我的同学，刚毕业，想让我们帮助找职业。”陈琏顺手拿起袁的一件衣服，又从口袋里掏出一点钱交给陈彰远，说：“工作不是马上可以找到的，你回家等着，这些你先拿去用。”

特务们那管这些，迳直把袁永熙夫妇和邢、陈二人押进两辆吉普，送到炮局的监狱。保密局又在袁宅布置了暗哨，继续遭逮捕的还有北大的吴谟，力易周，燕京的龚理康等学生。10月1日，燕京大学800多学生率先罢课，抗议国民党特务非法逮捕学生；继而北大、清华的学生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同学。

9月底，在转战陕北途中的周恩来得知北平的秘密电台被破坏、余心清等被捕，刚刚和任弼时等研究采取了重编密码、防止事态蔓延的措施。祸不单行。10月3日又从合众社电讯中获悉陈琏夫妇被捕。情报和学运两个系统的党组织是严格分开的，为什么几天之内先后被破坏？两案有何联系呢？周电示后方工委的李维汉、李克农：“此案发动为军统局，似牵连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不知因何亦牵连？”要他们立即通知在上海的钱瑛。于是，钱瑛立马离沪去香港。

三天以后，中共中央电示后方工委杨尚昆等，“应从各种可能上寻求破坏根据”，要后委通过晋察冀的保卫部长许建国和中央青委的冯文彬，“追查此类破坏真相，并研究有无营救可能和办法。”

情况很快查明：原来，贝满女中的教师田冲参加袁陈婚礼时曾和袁交换了一张名片：城工部的电台被破坏后，田冲的朋友、报务员李政宣叛变，田受到牵连，特务从田身上搜出袁的名片，袁因此被捕。

这时的蒋介石，正为挽救东北和华北战局忙得焦头烂额，10月4日飞到北平，8日又去沈阳督战，他生怕学生的抗议活动扩大蔓延，不得不释放部分被捕学生，邢方群（福建）、陈彰远等得以出狱。

保密局的特务想追查袁永熙和秘密电台的关系，

袁答：“我不知道什么电台，也不认识李政宣。”要他交待和田冲的关系，他答：“我和他初识，所以才交换名片。”

“是谁介绍你加入‘民青’的？”

“闻一多教授！”袁永熙胸有成竹，因为“民青”是群众性组织，“章程”又是草稿。特务初以为口供有所“突破”，仔细一想不对了，闻一多1946年7月在昆明已被特务暗杀了，袁的回答等于和特务开了个玩笑！

于是就用刑。在刑讯室里特务先用香烟火烧袁的皮肤，又用竹签夹他的手指，再用皮鞭死命往袁身上抽打。袁几度昏厥，但始终没有暴露身份。

特务要陈琏规劝丈夫，陈琏压着心中的怒火说：“他根本没有事，我劝他什么？”

保密局的特务既查不出袁永熙和秘密电台的关系，又不能确定陈琏和袁永熙的共产党员身份，再加上陈布雷的关系，“投鼠忌器”，他们只好提出两条建议，或送青年集中营感化，或交军法处审处。11月29日下午，一架飞机，押送着袁永熙、陈琏等23人，解南京保密局。

到“山那边”去

陈琏被捕后，陈布雷既是担忧又很恼火，他正奉蒋之命，主持控制舆论、打击共党“煽惑”的“宣传小组”工作，可偏偏自己的女儿出了这桩事，他意识到“委座”一定会审查他和此案的关系，后来，蒋得知陈琏他们和中共的情报电台没有关系，又审不出是共产党员。为了稳定他的“智囊”陈布雷的心绪，他授意陈：“青年人受了赤化的影响，你可以把女儿领出来，严加管教。”陈这才委托他原来的下属、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李惟果，把陈琏从保密局看守所“领了出来”。

陈布雷见了脸色苍白，形容憔悴的女儿，又得知她在妊娠期间，欣喜中不免语带责备：

“琏儿，为父多次忠告你不要卷入政治，你为何置若罔闻？！”

“阿爸，你不问政治，政治可要来问你啊！不就是为永熙一张名片才引起来的事吗！”

“那么，那些共产党的宣传品呢……”

“什么共产党的宣传品，你深居简出，不知民情，如今物价飞腾，民众的怨愤情绪报纸上也屡见不鲜。这样的材料在北平的大学里已是不胥而走了。”

陈布雷对蒋介石集团摇摇欲倒的内情比女儿清楚，一年前，当蒋手握的军队已由430万降为370万时，他对《文汇报》的徐铸成曾说：“国民党的举措的确不尽人如意。但是再腐败，我看至少二十年天下总是可以维持。”如今江河日下，“蒋公”的“势力”已是

“力”既不支“势”亦崩溃。此刻陈布雷既无力反驳女儿，只好规劝道：“社会恶疾日深，民众浮动已极，政府当局也在设法治理，但是，你不要受人利用！”

“我快三十岁的人了，三十而立，谁能利用我啊！古人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政府要治理社会恶疾，不用治本的方法是无济于事的！”

“琏儿，你现在不要再惹是非了，你先到慈溪乡下去休养一段，恢复一下健康，永熙还在看守所，我要去请叶公超把他保出来哩！”

袁永熙的姐夫叶公超是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次长。按照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惯例”，被保释者要填写一份铅印的“悔过书”，上面印着：余误入歧途，参加共产党，为共党做情报工作，今后悔过自新……等字样。“我没有误入歧途，也不是共产党，我不签字。”袁永熙断然拒绝，难友梁嵩然被捕前在北平市政府工作，他老练地对袁说：“既然我们没有做过这些事，那就在‘误入歧途’等字句前添上‘并未’两字，这样就改变了《悔过书》的性质。”袁永熙一想有理，就照此办理。保密局没有获得确凿的证据，对这位外交部次长的内弟，总统府国策顾问的女婿，也就不加追究了。

1948年5月28日，袁永熙出看守所后，陈布雷把他送到在上海的家里，再三叮嘱他不要再和“民青”联系。这时，陈琏正在慈溪等待分娩。

这年夏天，陈琏分娩了，可惜因为妊娠期间备受折磨，胎儿分娩时窒息而死。她痛惜孩子，惦念丈夫，乡居寂寞，便返回上海和袁永熙婚后重聚。

上海人民在盼望解放。“山那边呀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反映人民心愿的歌在车间和校园里传唱。有一天，陈琏夫妇去看望五姑母，正好表哥翁泽永和表妹郁文都在，大家关切地问他们的健康，问他们今后有什么打算。陈琏说：“一个人不工作有什么意思”，她已经请琇姐写信给父亲，为他们各找一份工作。她还殷切地向郁文打问：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到‘那边’去？”

沉默，翁郁文和翁泽永都没有接茬，但彼此心里都明白，这是陈琏夫妇向他们表示要到解放区去的愿望，限于秘密工作的纪律，彼此都没有明说。

不久，陈布雷为他们在南京找到了“差事”，陈琏在国立编译馆西洋史组编写世界史丛书，她

改名陈碧如。袁永熙在中央信托局。他们的小家庭安在中山东路。虽然没有和陈布雷在一起，但行动是被监视的。

郁文向上海地下党学委委员钱李仁报告了陈琏夫妇的意愿，经请示上级后，钱答复说：“上海党组织知道这两位同志，可以帮助送他们进解放区。”要郁文和他们保持联系，寻求适当的机会。

这年秋天，机会终于来了。国民党兵败如山倒，10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四天以后，淮海大战拉开序幕。蒋介石把最后希望寄托在美国总统杜鲁门身上，乞求他发表一份继续助蒋内战的宣言，但杜鲁门认为象蒋介石这样已经“没有感召力的领袖”来说，这样做“于事无补”。当这项信息传到南京时，蒋介石集团如丧考妣，11月12日晚上，陈布雷“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在“党国最艰危”、他自己又“油尽灯枯”的哀鸣中服安眠药“死节”“殉主”了。

1948年11月15日，蒋介石为陈布雷举行大殓，国民党的高级人员都参加了祭礼。尽管陈布雷在给蒋的临终上书中乞求“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但蒋介石心里明白，陈的自杀对早已涣散的军心只能是雪上加霜，以致半个月后，他冷漠而严峻地对亲信们说：“共产党的宣传厉害得很呐！连布雷先生这样的人，居然也会受共产党的影响，我们万万不可轻视啊！”

这时，郁文抓住吊唁舅父的机会，立即从上海赶到南京，她避开别人的耳目，把上海方面可以护送他们去“那边”的好消息告诉陈琏，要他们夫妇赴沪等候。

1949年1月10日，淮海决战胜利结束，半个月后扬州解放，人民解放军已经饮马长江了。这时，沪宁列车上，郁文陪同陈琏夫妇，在地下交通的带领下化装上路。陈琏身穿短棉袄，头包白帕，扮成一个农妇模样。

紀念共產黨員

陳琏同志

邵紹廷 1988年

临行之前，她给编译馆的同事李纯武发了一封信，称：“……现在局势又紧，且永熙‘台糖’工作已经洽妥，我们为赶最近一班船走，不及再回南京，好在东西大部已带沪。你前次来信曾说，辞职事可以代办，我就把这桩事拜托给你了。”台糖即台湾糖业公司，陈琏的大哥在那里任职。陈琏便托词赴台湾谋事作为掩护，实际上1月11日信发出时，她已离开上海了。

陈琏一行，到镇江下车，穿过封锁线，险渡长江，一夜行军到达上海地下党的联络站华中工委，接着又北行，穿过硝烟刚散的淮海战场，到达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所在地——山东兖州，途中，尽管冒着料峭的春寒，但是天津解放的捷报，解放军进入北平的喜讯，热乎乎地温暖着他们的心，切盼着早日到达目的地。

这时，中共中央将从河北建屏的西柏坡村进入北平，经华东局与中央联系，中央复电，要他们径向北平报到，于是，在翁郁文继续陪同下，陈琏一行加入了向北平进发的队伍，其中包括华东地区前去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团代会、妇代会的代表们。跻身在这支队伍中，陈琏夫妇感到特别豪迈，他们沐浴在人民解放的春风中，去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京华风云十二春

红旗，锣鼓，大秧歌；妇代会，团代会，民主青年代表会，北平在沸腾中。

一年多以前被国民党特务押解离开北平的陈琏，现在从一个大会场转到又一个大会场，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聆听周恩来副主席鼓舞人心的报告。她奋笔疾记，要把每一句话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把每一次接见化作前进的动力。

会后，她进入团中央少年儿童部工作，为培养祖国的花朵，建立新中国的少年儿童队贡献青春，她背起背包到广泛的农村去调查，和教师们一起认真探讨，即使是在怀孕期间也和基层干部同吃同住同劳动，把这一切看作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为了给少年儿童队谱写队歌，她登门约请郭沫若挥笔作词，请马思聪谱写谱子。有人轻视儿童工作，管这工作为“小儿科”，陈琏却愿做“小儿科”的“志愿兵”，她学习教育学，研究儿童心理学，力图把少年儿童队的建设提到科学的水平，因为她懂得，宏伟的事业要有革命的后继人来完成，谁想掌握未来，就必须教育第二代、第三代。所以，整个五十年代她在这个园地里倾注了全部心力。

1956年，全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共中央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陈琏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的大会上说：“少年儿童就是一支庞大的、不可缺少的后备队伍。这不仅是因为今天的许多高

小、初中学生在十二年以后就可以大学毕业，直接补充到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去；而且因为要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还必须普遍地提高我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特别是新一代的科学文化水平。”她吁请专家和科学家关怀和帮助少年儿童工作。

在这次大会上，陈琏还以亲身的经历，勉励非劳动人民家庭出生的和海峡对岸台湾省的青年朋友，她说：“我是陈布雷的女儿。在十几年前，我也是个怀抱爱国热情和苦闷的青年学生。为了寻求抗日救国的途径，我找到了共产党。党把我引导到革命道路上来。使我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社会解放的前途。我的苦闷消失了。”“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之地，但是我们完全能够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只要我们认对了方向，而且肯于努力，在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是有宽广的道路和远大的前程的。”

毛泽东、周恩来和全体代表报以热烈的掌声。

1957年，一个不平凡的夏天。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袁永熙。在一场从天而降的“阳谋”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陈琏怎么能想象在刀光剑影中坚持斗争十多年、在监狱中经过生死考验的丈夫，顷刻之间竟变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得知这一消息的当晚，陈琏向团中央少年部的汪志馨说：“我成了右派分子的妻子，孩子的父亲是右派分子，以后我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又怎么做少年儿童工作啊！”说着倔强的陈琏第一次在人前潸然落泪。

对于突如其来的打击，她无奈地和党组织站在一起，和相爱18年，共过患难的丈夫分手，单独挑起抚养三个孩子的家庭担子。1959年，正是物质生活因天灾人祸而处于很困难的时节，她决心到农村去经受劳动锻炼。1962年，为了改变一下环境，她向组织请求，调住在上海的华东局工作。

京华十二年，风云变幻，对陈琏来说生活既是甜蜜的，又是苦涩的。

有一天，陈琏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很了解这个具有特殊经历和特殊遭遇的共产党员，得知她要调离北京，关切地说：“你还是留在北京工作，中央了解你。”

但是，陈琏没有改变主意。临走前一天，她委托袁永熙的外甥女孙士洵，安排三个孩子和父亲相聚一天，晚上，由孙把孩子领回家来。夜阑人静，在孩子们进入梦境后，她抑止不住地和孙士洵抱头痛哭。这是她再一次在人前失声痛哭。

第二天，陈琏带着三个孩子踏上京沪列车。

陈琏没有被沉重的包袱压弯腰，她倔强地在逆境中奋斗。她到上海时，全国正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下，治理“大跃进”中出现的混乱局

面。在华东局宣传部长夏征农的主持下，她深入到上海和华东地区的高等学校作调查，为稳定教育秩序制订政治思想工作条例。1964年秋，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陈璉主动要求参加“社教”工作队，来到安徽全椒县的王山集大队“蹲点”，当时这里还是不通公路，没有电灯电话的贫困队。陈璉怀着由穷变富的美好愿望，和贫下中农在一起奋斗了一年半。

伏清白以死直

陈璉从农村回到上海时，“史无前例”运动已经揭开了帷幕。

如果说，多年以来陈璉对党的指示总是全身心地贯彻执行，唯独对这场运动，他一开始就陷于迷茫和困惑，尽管她不可能识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恶阴谋，更不可能意识到是一次时代性的错误，但是，对于违背党的传统，践踏党的政策的事实，却有所觉察，有所抵制。

斗争开始，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经常到华东局宣传部来煽风点火，攻击夏征农破坏“样板戏”，是“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在陈璉的心目中，夏是一位在文化战线上有丰富经验，作风民主，工作放手的前辈。因此，她沉默，会上不发言，会后不写大字报。

8月，“红卫兵”大破“四旧”，到处抄家。陈璉到泰兴大楼来看她。她神情严峻地安慰琇姐：“这是一场从未有过的运动，难免有点乱，但一切会走上正规的。”当反动的“血统论”泛滥时，大女儿陈必泓告诉她，中学生中在划分“红五类”和“黑五类”。陈璉鲜明地回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混蛋儿反动”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我们党从来不搞唯成分论，而是重在政治表现，老一辈革命家中有不少是剥削阶级家庭出生的，他们为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背叛了家庭。”

10月，琇姐又向她反映，有的教师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并说：“倘若我受到这种侮辱，我宁可自杀。”陈璉立即制止说：“你绝对不能这样想，一定要经受住一切考验。”尽管这时的陈璉思想上面临极大的苦闷：“我一言一行都是努力按党的要求去做，怎么会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呢？”在困惑中，姐妹俩相濡以沫。

1967年3月，在江青、康生等的煽动下，社会上掀起了“揪叛徒”的邪风。一天，陈必泓听到关于陈璉出狱的流言蜚语，她回家来问妈妈，陈璉以痛苦而激愤的目光直视着女儿，半晌说不出话来。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神色异状严峻，以致弄得必泓不知所措。

“难道你也不相信妈妈吗？”

“……”必泓无言以对。

“你现在长大了，许多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于是陈璉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经历向女儿说了一个星期。讲到被捕出狱时，她理直气壮地说：

“这些事，出狱以后我向党组织汇报过，组织上作过结论。”

接着，她陷于自言自语，时而深感遗憾地说“如果当年去了延安……就好了”；时而又充满幻想“如果现在能见到周总理和邓大姐……就好了”，“我的情况邓大姐、钱大姐清楚……。”随即，她收敛起微笑，因为她知道，此时此刻，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正在被揪斗；战功赫赫的彭德怀、贺龙元帅正在受冲击；连敬爱的周总理也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经受“炮轰”……。一切都颠倒了。“兰芝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

突然，被称为“重磅炸弹”的大字报向陈璉袭来，“造反派”从王允默的家里抄出了陈布雷的日记和登载治丧活动的旧报纸，于是，对陈璉的斗争升级了，不但把“叛徒”、“特务”的帽子扣在陈璉头上，而且要逼她交待是如何混到共产党里来的？变白为黑，倒上为下。这不仅是她个人的不幸，而是一代人在蒙难，而这一切竟被认为是天然合理的，非常及时和完全必要的。她不堪忍受。于是，她以生命来捍卫党的正确结论。她在绝笔书中写道：

“关于我被捕的情况，我一九四九年的交待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你们将来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陈璉切盼的“那一天”来到了。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在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的过问下，1979年3月21日，上海市委宣传部为陈璉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会上以明确的语言郑重宣告：

“1947年9月，由于北平我党地下电台被敌人破坏受牵连被捕。陈璉同志在被捕时机智地掩护了同志；在狱中坚定不移，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没有泄露党的机密。”

1988年清明前，年高德劭的邓颖超题词：“纪念共产党员陈璉同志”。一字千金，掷地有声。

胡耀邦赞扬陈璉的革命精神，题词：“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责任编辑 洛松）

冯恩洪，今年50岁，从教三十余年，德育特级教师。1985年任上海建平中学校长；1993年获上海市优秀教师标兵称号；1994年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1995年享受国家有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同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规范+选择”： 冯恩洪为跨世纪教育“抛砖”

● 萧 徐

一、一则报道引起的思考

1993年7月1日，由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组织召开“亚太地区学校高效能管理研讨会”在香港举行。新加坡、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中国大陆的许多名牌学校的校长云集香港，可谓群贤毕至。

上海市建平中学校长冯恩洪，带着他在教育战线奋斗三十多年的体会、他在建平中学8年改革的经验和成就，出席了这次研讨大会。

冯恩洪的发言被安排在大会接近尾声的最后一天，而且是最后一个。这种安排对于一个在会议高潮已经过去过的发言者来讲，先声夺人的优势已经失去了。

但是，当冯恩洪在发言中首先对“满足人的发展需要与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协调统一”这一指导建平中学改革思路进行阐述时，却达到了“后声夺人”的效果：与会者对这一指导思路议论纷纷，兴趣更浓，大会主席兴奋地对冯恩洪说：您可以不受前面每人20分钟发言的限制。

于是，冯恩洪抛开了原来浓缩的讲演稿，兴致勃勃地向与会者介绍了他主持建平中学八年来的改革历程，展示了建平人教育改革的思路，通报了建平即将实行的一系列宏大改革计划。

冯恩洪的演讲，获得了与会者阵阵掌声，引发了与会者更多的感慨：

香港一位教育界人士说：建平的实践，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新加坡一位中学校长说：听冯校长一讲，真是耳目一新；来自台湾的一位校长说：我这次来香港的最大收获，是了解了大陆同行的真正水平，明年我一定要去大陆，亲眼看看建平人的风采。

主持会议的东道主“顺乎民情”，干脆提议：明年的这个会，就定在上海开，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考察建平中学。

以分数为基础的考试只向升学率倾斜，中学教育还没有从“应试教育”转向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冯恩洪和他的建平中学的教育改革，显然是打破了旧有的“应试教育”为主的模式。

其实，从解放以后我国的教育发展看，我们并不是在刻意忽视进行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至今仍令人怀念的“十七年的教育”（1949—1966年），无疑是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轨道进行的。可是，十年动乱期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开门办学”，却上演了“只靠手上的老茧就可上大学”等等一系列闹剧，“又红又专”的教育模式荡然无存，中国不但关闭了大学之门，连中学之门也虚掩上了。

十年动乱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大学之门终于开启了，被“积压”和“挤压”了十几年的“老三届”，终于获得了一个最后的机会，而抓住这个让他们激动的落泪、幸福得落泪、焦急得落泪的机会的唯一手段，就是考试，就是“唯分数论”。

庸庸讳言，以考试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并不是一个高明的教育手段，人们可以举出诸如牛顿没有上过大学等事例来说明这一点。但是，在教育百废待兴、亟需更新的初始，这一手段无疑是必要的。但不幸的是，此后我们的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却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应试教育”的怪圈，“升学率”的高低，成为衡量一所学校质量高低的唯一标准。与此相适应，“优秀教师”这一荣耀的花环，也是“高升学率”扎成的。

无论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规律，还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来看，中学教育从单一的考试转向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都是刻不容缓的。小平同志在1983年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以及1985年中央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目的也正在于此。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正如一种观念的

形成不是朝夕之间的事情一样,改变这种观念亦然。我们的家长在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往学校后,要求学校给他们一个“光宗耀祖”的机会;我们的舆论还在传统观念里转圈,使人们得出只有成名成家的高级人才才是人才,教育似乎就是以培养这样的高级人才为目的的结论。受到这些压力的勤勤恳恳的“园丁”们,要率先打破“应试教育”的怪圈,可谓心有意而力不足。为此,中央不得不三令五申。1993年9月,中央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中小学教育要由‘应试教育’转向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很显然,这个文件把深化教育改革落脚点放在了“特色”上。

冯恩洪8年来在建平中学的实践,就是把中学教育落在“特色”上,以“满足人的发展需要和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的协调统一”为改革思路。

二、建平人有一个梦:要为二十一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模式

笔者特意采访了冯恩洪。他修长的身躯有点弯曲,面容带着些许倦意,这与他50岁的年龄似乎有点不太相称,可是眉宇之间自有一股沉着坚毅之气,不是英才勃发,是温恭蕴藉的那一类型。他虽然很健谈,但不善于客套应酬,因此,我们很快进入正题。

“任何一项改革计划的提出,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满足人的发展需要和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的协调统一”的改革思路的提出也是如此。”这位全国模范班主任、语文教师出身的重点中学校长,话匣子一打开,即滔滔不绝。

“正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一样,教育的改革也必须服务于现实。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是:建平中学的所在地是‘三年大变样’的上海,在开发开放的浦东新区。上海的浦西,由农村变为城市的过程为150年,而浦东由农村变为城市、建设成为二十一世纪国际大都市的过程,历史只容许我们20年完成。上海工人五年造两座大桥的胆识和气魄,南京路一年一个样的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无时无刻都在提醒我们思索:基础教育如何才能更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主战场?”

“计划经济所需要的人的最高品质是服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人的最高品质却是创造。服务于计划经济模式的教育,在师生之间,只能是我教你听,我考你背,我灌输你接受,我命令你服从。有知识

的交流,却没有心灵的沟通;有‘五分加绵羊’,却没有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潜在能量的开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已站在市场的门口,就要对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素质教育进行探索,就要有敢于为天下先的胆略。选择适应时代的教育。”

基础教育服务于社会现实的理论,是教育家历来所倡导的,但是像冯恩洪这样把自己的学校放在实实在在的“现实”,阐述这番理论,却是那样容易为人所接受。但是,理论与现实毕竟是有距离的。

“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缩短这种距离。”冯恩洪侃侃而谈,“我们现在的教育我称之为‘补短教育’,要求学生的每门功课都在85分以上。可是,如果一个学生将来不当医生,不搞生物工程,为什么一定要他的生物考85分以上?我看75分可以,甚至65分也合格。一个学生的有限的学习精力,应当让他通过选择,用到他的特长方面去。因此,我们思考的落脚点是,首先要把学生当做社会的人来考察研究,把全部教育的基础,奠定在每一个学生不同的发展需求之上。

“我们建平所做的,就是使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充分地完全地得到发展,改‘补短教育’为‘扬长教育’。我们提出了‘规范+选择’的教育思想,‘合格+特长’的教育目标。”

“坦率地讲,”这是冯恩洪最爱用的一句口头禅。“坦率地讲,建平人有一个梦:我们的目标不仅要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经验,而且,我们要为二十一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模式。”

现今是改革家辈出的时期,但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居多。冯恩洪在建平的改革已进行了十个年头了,依然锐气十足,这使我对他十年的改革历程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三、胡乔木欣然命笔:“建平中学现在所采取的教育方针是富于创造性和完全正确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教育界公认的一个规律。教育上的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不是急功近利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对教育模式的改革、探索所遇到的阻力就相当大。

冯恩洪所提出的“规范+选择”的教育思想和“合格+人才”的教育目标,从根本上讲,是摒弃那种因循守旧、代代世袭的“唯分数论”的“补短教育”模式,引导学生由知识型向复合型发展。但是,我们的社会对人才概念的误导,使我们的家长最大的希望是让孩子上大学,也使我们的教师以“我的学生升学率高”为最大的满足。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教育改革措施的施行,

不但需要足够的勇气，而且需要讲究策略。

冯恩洪就是这种既有勇气又有策略的人。

要开发学生潜能，发展学生的特长，给学生以选择的机会，最佳的突破口是开设第二课程，而第二课程的开设，又要对第一课程的教学形式进行调整，可第一课程森严壁垒，谁敢轻举妄动？因此，冯恩洪在推行教改伊始，便采取了“由外围向核心逼进”的策略。

1986年，冯恩洪到建平走马上任一年之后，即提出了他酝酿了一年多的第二课程计划：建平要给学生提供扬长的第二课程，并且要像第一课程一样有章可循，要系列化、正常化。

第二课程按照给学生发展余地的原则，设学科知识、学生技能等各种门类。学科知识类，目的是根据学生的兴趣，培养拔尖人才。他让高中部的骨干教师到初中部去“挂职”，“带小研究生”，对某一学科感兴趣的学生进行重点培养。技能类又分高级技能（如电脑）和基本技能（如修车、缝纫），目的是让学生具备最基本的生活技能。

为保证第二课程的有序进行，冯恩洪为自己提出了“五保证”：教育思想保证、师资保证、条件保证、经费保证和政策保证。为此，建平为第二课程提供了相当过硬的“硬件系统”：30间课外活动专用教室，清一色瓷砖铺地，室内设备一应俱全；计算机室的高级486电脑、英文打字室的打字机全部向学生开放；语言实验室的外语原版磁带可任意选听；图书馆每天都向学生开放，并实行开架借书……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第二课程激发了学生们的积极热情，所带来的效果也是巨大的：1978—1984年，建平中学获市级各类竞赛一等奖的仅一人次，而开设第二课程一年后的1987年，建平获奖人数就达151人次；而1985—1995年的10年中，建平学生在国内各级各类竞赛中获奖竟达2864人次。国内被称为“权威竞赛”——获奖者高考可以加20分的“华东杯”中学化学竞赛，建平蝉联五届团体冠军；国际上被称为“权威竞赛”的“奥林匹克邀请赛”，建平学生参加了四十三、四十四届，均获上海赛区第三名（第一名是有专门数学班的，第二名是设有理科班的；第一、二名并列得分450分，建平是445分）；1992年，建平学生代表中国在美国有65个国家参加的第十二届世界头脑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第四名，日本获得第六名……

这些的数字说明，建平在发展个性、培养特长方面是成功的，但对教学质量是否有影响呢？

“对于这一点，当初连我自己心里也没底。”冯恩洪说，“那一年暑假，高考发榜之前，我把学校骨干全部集中起来，拉到了风光秀丽的千岛湖，在学校只留一位同志看家。我对他说：‘高考一发榜，你立即给我打电

话，而且一定要我第一个接电话，我好决定怎么处理。’其实，那时我是作好了最坏的打算的，一旦高考升学率滑坡的坏消息传来，千岛湖山美、水美，大家心情舒畅，骂人的声音可能会小一点，思想工作可能会好做一点。谢天谢地，上海传来的是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们参加高考的164名学生中，考取大学的161人。这时，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地了。”

第二课程的成功，是发展个性的结晶；第一课程是否也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呢？

“暑假之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冯恩洪说，“首先从进度上讲，比如，你是喜欢物理的，而我不喜欢这门课，为什么我们两人非要在同一水平上学习呢？可不可以这样做，不喜欢的学得轻松一点，只要通过就行了，而喜欢的就学得深一些呢？大家各得其所不是更好吗？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对第一课程的教学模式又进行了改革，实行‘按程度分层次教学’。”

按程度分层次教学与现在流行的快慢班有什么区别呢？冯恩洪看出了我的疑惑。他解释说：“原来的快慢班是按总分分班，按程度分教是按能力和兴趣分班；原来的快慢班是大一统，按程度分教是快中有慢、慢中有快，灵活可变。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学生可以在A班学数学，在B班学外语，在C班学物理；也就是说，他可以在A班保证合格，在B班保证兴趣，在C班发展特长。”

这一方案一出台，校领导班子内部却一片哗然。有的说：我们的第一课程升学率在98%，第二课程也搞得学校颇有名气了，日子已经很好过了，何必冒这个风险呢？有的说：升学率是锦，第二课程是花，我们已经锦上添花了，别再改了。其实，冯恩洪心里明白，这些同志是怕动第一课程影响升学率。

面对这种顾虑，冯恩洪采取了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把将在高一出台的方案，放在初一出台，行不行？

领导班子五分钟之内就一致通过：行。道理很简单，初一离高考还有六年，即使试验砸了锅，初二收回来也不迟。

方案在初一出台了。初一的数学、外语两科实行一种教材，A、B、C三种进度。A进度实际上是面向学习有困难、弄不好还要亮红灯的学生；B进度是面向中等水平的大多数学生；C进度是面向有特长、希望进一步拓宽、加深的尖子生。

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实际水平和接受能力，选择进入不同程度的课堂学习。第一周，允许自由流动，学生自己挑老师，哪个老师上的课最对自己的胃口，就进哪个课堂；第二周，相对稳定；一个学期结束，还可根据各自的适应情况，再做一次重新选择。

在试验运转正常的一年后，这套改革方案又在高

中部推行。高中部学生兴趣相对稳定,效果比初中更好。“规范+选择”的教育思想真正走上正规。

但冯恩洪对此并没有满足,这个在上海教育界出了名的“不安分的人”,在下一步的改革中,又向第一课程这个“核心”更逼近了一步。1991年,他又提出了“提高课堂效率,压缩授课时间,加强选修课”的改革设想。

谈到这一举措,冯恩洪说:“我们习惯制的一堂课45分钟的授课时间,给学生留下的剩余时间少得可怜。以高一为例,13门课程,一周34个课时,门门重要,节节重要,这样的课程安排,学生哪里还有发展特长的余地呢?从我30年的从教经验来看,再好的老师上课,也有5分钟的话是可说可不说的。减少5分钟,增加课堂密度,提高教学效率,不应该有问题。”

基于这一考虑,冯恩洪决定,将每一节课压缩5分钟,上午4节课节约出20分钟,再与晨读的20分钟加起来变为第五节课,必修课在上午全部完成,下午全部为选修课的时间。

在冯恩洪看来“不应该有问题”的方案,到老师们那里却有了问题。有的老师说:我的一个实验,就需要十多分钟,40分钟怎么来得及?有的老师说:我的教案可是可钟可点的,40分钟难以完成。

冯恩洪此时却没了改革家的气派,而是到处给老师们作揖:掌握方法比结论更重要,老师们帮我一下子,试试吧,试试吧。

老师们看着冯恩洪面带倦意的面容,被感动了。这一试,果然“试”出了一派新气象。同学们的各种兴趣得到充分的发挥,求知的欲望被调动起来了。

电视台播放连续剧《攻关小姐》,学校开了一门公共关系选修课,200多人报名参加;上海开设证券交易市场,高中部学生交口谈论,有的甚至跃跃欲试,学校请财政金融学校的老师来开一门选修课,让同学对股票有个正确的认识;A型结构杨浦和B型结构的南浦大桥建成后,物理老师开了选修课,专门为同学们所关心的桥架结构问题,讲讲大桥结构中的力学原理……

虽然目前我们还无法对这些活动所产生的效果进行估价,但是,满足受教育者生动活泼和谐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协调统一的思想的正确性,是不容怀疑的。这里,还应该把读者所感兴趣的、建平升学率作一个交代:建平改革十年来,升学率一直稳定在98%左右。1992年,187名学生参加高考,考取了183人,其中考取重点大学的占70%,这在建平中学49年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这些数字颇耐人寻味:冯恩洪实行改革的目的是摒弃传统的片面升学率的做法,可建平的升学率却那

样高,难怪冯恩洪的“规范+选择”的教育理论会在香港研讨会上得到诸多的青睐了,引起了新闻界和领导的注目。

《人民教育》杂志发表了反映建平中学改革的长篇通讯《跨世纪教育工程》,在教育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央儿童电影制片厂抓住这一题材,拍摄了反映建平改革主体思想的故事片《世纪桥下》,今年1月将在全国公映。胡乔木同志生前视察建平时欣然命笔:“建平中学现在所采取的教育方针是富于创造性和完全正确的。”

四、“三个服务”的改革新思路

尽管取得了如此注目的成功,“不安分”的冯恩洪还是没有学会“稳当”一点。1993年9月,在建平中学进行改革的第八个年头,冯恩洪又将“规范+选择”的教育思想向更深处延伸,又推出了进一步改革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是根据“三个服务”的思想设计的:第一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第二服务于人民群众希望自己的子女受到良好教育的愿望;第三要服务于学生生动活泼的充分发展。

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建平中学采取了一系列大动作:

为给浦东开发提供合格的优秀人才,建平中学与陆家嘴国际金融开发公司联合,组建了“新上海国际职业培训中心”,设置的专业都是那时上海还没有的物业管理、大楼管理和现代办公手段等。学校实行双文凭制度,毕业的学生既可获得建平中学的高中毕业证,也可获得“新上海国际职业培训中心”的中专文凭。高中部学生和培训中心的学生可以自己选择,自主分流:高中部的学生如不愿考大学,可以到培训中心接受两年职业教育,而培训中心的学生如想考大学,也可以转到高中部学习。

与上海师大中文系合作,在建平开设涉外文秘专业,建平的学生在高中毕业的同时,可以拿到一张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单科结业证书;与上海外国语学院联办国际双语学校浦东分部,学生下午全部是英语课,4年以后,所有学科全部用英语教学。

把选修课开到名牌大学和科研单位去。1993年9月,建平将它的优秀学生每周一天,送到各个大学和科研机构去接受高水平的教育,以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的机会。

把学校的教育与世界接轨。与国外合作,组建了建平二十一世纪中学。

这一系列大动作,不由得令人感慨:建平中学有冯恩洪是幸运的,这所校园的年轻学子更加幸运!

明太祖朱元璋惩贪记

● 邱远猷

拔毛者慈，碰根者罚

“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这是1368年明王朝建立不久，朱元璋反复告诫官吏们的一段话。但有的官吏偏偏置若罔闻，“拔其羽”者有之，“摇其根”者有之。对此，明太祖朱元璋认为非惩治不可：“养粮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贱良民”。1369年，他便对群臣宣布要“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于是，一场历史上仅见的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逐渐展开。开国初，两浙、江西、两广、福建的地方官因贪污被杀的很多，而任职期满的很少。1385年、1386年朱元璋编定出与《大明律》具有同等效力的《大诰》，其中汇集了1万多个案例，内容大都是惩治贪官污吏、地方豪强以及滥杀百姓等问题。而且惩治极严，《大诰》共罗列凌迟、枭首、夷族罪，千余件；斩首、弃市以下罪，万余件，其严酷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

明太祖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痛恨之深、对惩治贪官污吏决心之大，是与他的特殊历经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密不可分。

安徽省凤阳县龙兴寺里，供奉着朱元璋的画像，两边有这么一副对联：

生于沛，学于泗，长于濠，凤郡昔钟天子气；
始为僧，继为王，终为帝，龙兴今仰圣人容。

这对联大体上勾划出了朱元璋这一传奇人物。1328年，他出生在安徽凤阳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传说在破小土地庙里哭出了娘胎。十来岁就当了小牛仔。17岁做了小和尚，而且是“游方”和尚，乞食于合肥、六安、寿县、固始这一带。3年后又回皇觉寺。三、四年后，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群雄四起。1352年，定远人郭子兴起兵，占据了濠州，朱元璋弃僧还俗，入伍当兵。由九夫长、低级军官，到都元帅、封王，终即帝位，成为大明王朝第一任天子。

历尽生活艰辛、饱尝政治腐败之苦的朱元璋，养成了嫉恶如仇的思想性格，对“蠹政鬻狱，大为民害”的贪官墨吏早就恨之入骨。明人李贽曾经分析过朱元璋，说他“盖自托身皇觉寺之日，已愤然于贪官污吏之虐民，欲得而甘心矣！”朱元璋自己也在告谕群臣时说过：“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平法之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明朝建立初期，地主、官僚受宋、元以来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刺激，更加贪婪，富于掠夺性。他们无视

连年战争之后社会经济的凋残，恃势骄盗，凌暴乡里，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的现象十分严重。这样发展下去，势必激化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侵犯皇室利益，从而影响和威胁着宋明王朝的统治。

而贫苦农民出身、参加过红巾军起义的朱元璋，是既了解民间疾苦，又深深懂得贪官污吏“蠹政厉民”的严重后果的。所以他常常告诫臣僚：“四民之中”，“农为最劳”，“今居官不知民艰，刻薄虐害，无仁心甚矣！”在谈到贪官污吏的危害时则说：“……多奸而弄法，蠹政厉民，靡所不至。遂使君听不宣，政事日坏；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强者去而为盗……”。

为了恢复社会经济，巩固明王朝的政权，朱元璋决心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他从即位后的第二年起，几次下令：“自今官吏犯赃罪者无贷”，并断然表示：“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

剥皮实草，触目惊心

在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中，朱元璋采取了各种有力的措施。首先是严禁官吏法外诛求，以峻法重绳贪官赃吏。

明初颁布的《大明律》对文武官员的职权和义务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后来，还颁布了《臣戒录》、《大诰》三编、《大诰武臣》、《醒贪简要录》、《申戒公侯铁榜》、《须知三十一条》等等法律、法令、条规、章程，对各级官吏所应该遵守的事项，也加以详细的规定和说明，严禁贪污受贿等行为，对贪赃枉法官吏严惩不贷。

明初惩治贪官污吏的法律，是既详细又严酷的。以《大明律》为例，在《刑律》中设有“受赃”专篇，设置了“官吏受赃”、“坐赃致罪”、“事后受财”、“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家人求索”、“风宪官吏犯赃”、“因公擅科敛”、“私受公侯财物”、“克留盗赃”、“官吏听许财物”等条。《大明律》还把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6种犯罪，即：监守盗、常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和坐赃，称之为“六赃”（其中4种是涉及贪官污吏的），绘成图，标在律首，以示重惩贪墨之罪。

《大明律》对于贪污的惩治规定得很具体：凡官吏受财而枉法者，1贯以下杖70，每5贯加一等，至80贯绞；受财不枉法者，1贯以下杖60，每5贯加一等，至120贯杖100、流3000里；凡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不分首从，并赃论罪，于右小臂上刺“盗官钱（粮、物）”三字，1贯以下杖80，至40贯斩。

《大明律》还规定，即使官吏没有接受财物，也没有枉法，但听任别人许诺给自己财物，也要严惩，重者

也可以处至流行。甚至就连因出差乘坐官畜车船附带私物超过规定的重量，也要处刑。

再如《大诰》还规定：凡犯赃罪，行贿者与受赃者同罪。“行人受命而出，或捧制书，或寻常差使，或催督六部都察院公事，所在受赃者”，“除民人被其威逼科敛不罪外，官吏与受者罪同。”

此外，朱元璋还告谕中书省臣：遇到发布大赦令，“凡犯赃罪者，罪虽已赦，仍征其赃”。根据这个告谕，中央刑部立下法令：“官吏受赃遇赦免，受赃并追纳，其在赦前犯赃事发，惧罪外避及事后发露，依律追究。”

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不仅编织了“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的严密法网，而且认真执行，雷厉风行。平时一发现官吏违禁贪贿，即按法令严加惩处。如郑州知州康伯泰、原武县丞柴琳等，不顾人民死活，各将赈济灾民钱财中饱私囊，以致“陈民卖妻，郑民卖子，原武之民难甚”。朱元璋发现后，立即把这些贪官处死。又如，广西都指挥耿良，与布政司官、府州县官勾结，“百般科敛”，“害军害民”。朱元璋“取回他来打杀了”。至于罪不至死的许多官吏犯赃就罚做苦役或屯田，如：1376年，“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谪屯凤阳，至数万（人）”；1385年，“尽逮天下积岁官吏为民害者，赴京师筑城”，其中就有不少是贪官污吏。

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多用酷刑：诸如墨面文身、捶足、刖足、挑筋、去指、腐刑，以至肢解、碎肉、枭首、凌迟、族诛等等，残酷至极。有的官吏“滥设无籍之徒”，“出入市村，虐民甚如虎狼”，朱元璋下令：“敢有仍前为非者”，“并有司官吏族诛”。族诛之法就是官吏贪赃枉法，不仅本人处死，还要株连到家族亲属。这种刑罚，自汉朝以来，只有叛逆罪才用此重典，现在却用来惩治贪污罪，说明“明（太）祖意在惩恶”。朱元璋对贪官污吏专用的“剥皮实草”之刑在历史上更是罕见的。当时各府、州、县、卫的衙门左首，都立有一座祭祀土地神的庙，官吏犯赃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后，还要提到那里剥皮。这个剥皮之场称为“皮场庙”。贪官剥皮后，中间填实稻草，然后便拿到官府公座旁边摆起来，使继任的官吏触目惊心，畏法却步。

不避亲贵，借民逼官

在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中，朱元璋还尽力做到不避亲贵。他曾经极其严肃而又十分恳切地告谕勋臣宿将说：“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年，正当留意”，千万不要因为贪赃枉法，最后落得身败名裂，晚节不忠。而他一旦发现功臣宿将和皇亲国戚，贪污受贿，“拔毛动根”，决不曲宥，照样依律严加惩处。

郭恒，因功官至侍郎，秩正三品，与尚书同为部级

堂官，权势显赫。可是，他不听朱元璋忠告，竟伙同别的官吏吞盗巨额官粮。1385年，郭桓案发，朱元璋穷究作弊等情，将他本人以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几百人都处死，数万人被治罪下狱，追赃700万石。

华云龙，是明王朝的开国元勋，官封淮安侯，禄1500石。可是，他贪婪之心日益膨胀，千方百计追逐奢侈生活。他私自占据元朝宰相脱脱的第宅，又擅自役使军民精心修缮，奢丽过制。他还潜用元代皇宫器物。这些违禁犯法行为被揭露出来后，朱元璋立即罢了他的官。

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驸马，并任都尉。当时茶禁方严。欧阳伦几次派遣家人偷运私茶出境，进行贩卖，从中牟取暴利。所至地方百般骚扰百姓，他的家奴周保尤其横行霸道。陕西布政使司为之移文所属，起车载运。过甘肃兰县（即兰州）河桥巡检司，竟捶辱司吏，司吏不堪忍受，把他们告发了。朱元璋大怒，不顾马皇后与公主的说情、哀求，1397年毅然将驸马欧阳伦赐死。陕西布政使明知驸马欧阳伦利用职权擅自役使吏民贩运私茶、触犯法令而不举报，朱元璋也将他赐死。

为贪赃枉法被鞭死、赐死的还有明朝勋臣官封永嘉侯的朱亮祖，官至右丞相的胡惟庸等。

朱元璋还曾建立了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希望借助民众力量惩治贪官污吏。

1368年，朱元璋刚一登基就下令：若官吏额外科敛，“许民人拿赴有司，有司不理，拿赴京来议罪梟令。”

1386年，朱元璋又下令说：“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或“赋税不均，差贫卖富”，或“造作科敛”，“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

《大明律·户律·户役》规定，若有官吏课征税粮和摊派差役作弊曲法，被害之民可以拘执该官吏自下而上陈告，若上司不为受理亦要依法论处。

《大诰》更明确地规定：“有等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

朱元璋所以要采取“民拿害民官吏”这一措施，用他自己话说，是因为“所任之官，皆是不才无籍之徒”，“若靠有司辨民曲直，十九年来，未见其人”。并说：“民从朕命，着实为之”，敢于捉拿害民官吏，那么，“不一年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为何以其良民自辨是非，奸邪难以横作，由是逼成有司以为美官”。可见，朱元璋对官吏多半是不信任的。“民拿害民官吏”是一种借民逼官的手段，通过这个办法想达到“化贪为贤”、加强封建统治的目的。

为了保证这一措施的实现，朱元璋进一步提出，要

给持诰赴京的平民以法律保障，规定：凡布政司、府、州、县耆民人等“拿害民该吏”赴京面奏者，“虽无文引”，关津也要“即时放行，毋得阻挡”。“其正官首领及一些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有了皇帝的圣旨和法律的撑腰，真有民人捉拿贪官污吏赴京告状者。如江苏常熟县陈寿六等人，见到该县官吏贪赃枉法，为非作恶，鱼肉百姓，极其愤慨，大着胆子把他们擒拿起来赴京告状。朱元璋一方面重惩了常熟县的贪官恶吏；另一反面又给陈寿六以奖赏，并称赞说：“陈寿六岂不伟欤！”要人们向他学习。对于官吏拒不执行上述命令和法律有关规定，居然阻挡耆民捉拿贪官赴京告状者，朱元璋说到做到，给以酷刑处罚。如浙江嘉定县淳化镇巡检何添观、弓兵马德旺，当本地耆民捉拿贪官墨吏进京告状时，他们擅自阻挡。朱元璋知道后，分别将何添观、马德旺二人处以刖足枷令、梟首示众的重刑。朱元璋还愤然下了一道命令：“今后敢有如此者，罪亦如之！”这里，抛开“民拿害民官吏”的作法是否真正能行得通不谈，仅从朱元璋制定这项举措的主观动机分析，一是表明了他惩贪的决心很大，二是反映了他对“官贵民轻”思想的某种否定。朱元璋这种借助于民众力量去监督、严惩贪官污吏的举措，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警省”臣民，预防犯罪

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严酷打击。过去人们往往把朱元璋治国的精神，概括为一个“猛”字。朱元璋自己也说过：“朕自起兵四十多年来，洞察人情的真伪。惩治……贪脏违法，有时使用法律规定以外的刑罚”。“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救中国，非猛不可！”“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但是，另一方面，朱元璋却又不失其“柔”，这就是他在“张刑制以齐之”的同时，提出了“警省”臣民的预防贪污犯罪的主张，认为把法律比作水火，警戒焚溺之祸，这是周于人情而熟于事理的。他为了收到“禁止将然之前”的效果，采取了许多措施，也订立了一些制度，来防范或减少贪污犯罪行为的发生与蔓延。

比较重视法制宣传。朱元璋执政期间，颁布了许多劝勉官吏的文书，如《官戒录》、《彰善瘅恶录》、《醒贪简要录》、《申戒公侯铁榜》等。1368年《大明律》完成时，朱元璋惟恐“小民不能周知”，而为了“使民知法”、防止犯罪，便命人制作《律令直解》，在各州县颁行。朱元璋认为这样做，至少可以“使吾民寡过”。1385年开始制订的《大诰》，把“被诛贪脏污吏，一切作奸犯科姓名，具列《大诰》中，前后三编。凡臣民务要家藏人诵，以为鉴戒。”1387年《大诰》编订成，朱元璋

亲御午门，面谕群臣，阐明其制《大诰》示臣民的目的。他说：“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诰条目……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为了使《大诰》的内容家喻户晓，戒惧臣民，朱元璋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并要“臣民熟视为戒”；还命令“民间子弟于农隙时讲读律令”，规定村社节日、民众集会时，官府派专人讲解《大诰》的内容。所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使人人不至为非”。朱元璋还借用法制的手段进行法律的宣传教育，规定如果发现有敬、不收藏《大诰》者，治以重罪，“务要家藏人诵，以为借鉴，有不守，迁于化外以不虚示”。如果囚犯也有一本《大诰》，还可能罪减一等哩。1386年，朱元璋还将《大诰》颁赐监生，命令全国各地学校都要用它作为学习的主要课程之一。学校要讲《大诰》，并以此作为录用生员的标准。科举考试的时候，要从《大诰》出题，以考生对《大诰》熟悉的程度资以录用。

设立“申明亭”。明朝开国之初，为了惩治“元季贪官重绳赃吏”，朱元璋下令建“申明亭”于大道通衢，命刑部抄录中央与地方各司官贪脏枉法罪状突出者，书之“申明亭”，让众人皆知，“以示惩戒”。朱元璋还命刑部，凡官吏有犯，宥者复职，要书其罪过榜其门上，“使自省不悛，论如律”。朱元璋企图通过这种把贪官污吏罪过公布于众的办法，使其“知耻”、“自省”，以预防犯罪。有人称它“此前代乡议之遗意也”。

严禁官吏下乡扰民。朱元璋在《大诰》中告谕各级官吏说：“十二布政使司及府州县，朕尝禁止官吏、皂隶不许下乡扰民，其禁已有年矣。有的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贪赃勒索。今后敢有“下乡扰民，罪在不赦。”

层层追赃，有司负连带责任。朱元璋在《大诰》中规定，如果中央六部有犯赃罪，必究赃自何而至。假若是布政司贿于府，则把布政司拘来，追问这赃从何得来。布政司必指于府，府亦拘来，追问这赃从何得来……。就这样，顺蔓摸瓜，逐级追查，直到查清、判罚为止。

凡犯赃罪，行贿者与受贿者同罪。朱元璋在《大诰》中规定，“行人受命而出，或捧制书，或寻常差使，或催督六部都察院公事，所在受赃者”，“除民人被其威逼科敛不罪外，官吏与受者罪同。”

遣牌唤民制度。朱元璋在《大诰续编》中规定，凡有临民公务，遣牌下乡，指乡村坐地名下姓氏，遣牌呼唤民人到来，“抚绥发落”。有司如果不遵从命令者，许民赴京城告诉。假若是遣牌到了民人住所，连呼3次而民人不到，才可以派遣皂隶到民人所在地勾拿民人到来，询问他不到的理由是什么。假若有司不照此办理“之罪巨微不赦”。朱元璋试图通过建立遣牌制度，防止

官吏故意虐待百姓，贪赃枉法。

取缔害民皂隶之法。朱元璋一直认为市井无籍之徒，“惟务勾结官府，妄言民之是非”。这帮素质极差的无籍之徒，假若官府让他们担任吏卒，充当官差，“其害民之心那有厌足”。于是，他下令：“今后诸处有司衙门皂隶、吏员、狱卒，不许用市井之民。”“有司仍前用此，治以死罪”。并且规定，皂隶名额职掌，要先行榜示民众。除榜上有名者以外，其他有假冒衙门名色称皂隶称簿书者，“诸人擒拿赴京”，严加治罪。

告诫吏卒亲属严守道德。朱元璋经常告诫吏卒亲属，一定要恪守社会道德，并以此劝导、约束丈夫、兄弟、儿子，不得胡作非为，坑害百姓，以饱私囊。他告诫说：“朕今独条特谕诸吏卒、簿书之父母、兄弟、妻子，呜呼，戒之哉！毋为民害。良心发于父母，嘉言起于妻子，善行询于兄弟。”凡走卒、簿书之家，有此三戒，害民者鲜矣。”朱元璋对于官吏贪污犯罪的防范，真是用心良苦。

考察监督，表彰清廉

朱元璋为了杜绝贪官污吏的仕途之路，还建立了严格的官吏考课和监督制度。对官吏的考课分两种：“京察”，对京官的考绩，每6年进行一次；“外察”，对府、州、县等地方官的考绩，从1个月到3年不等。考课官吏的标准定了8项：一贪、二酷、三浮躁、四不及、五老、六病、七疲、八不谨。考课结果，分几等：称职者；平常者；不称职者；贪污者；闾茸（地位卑微、品格卑鄙）者。朱元璋下令：“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降，贪污者付法司罪之，闾茸者免为民。”考核主要由吏部负责。

为了保证考核的正常实施，朱元璋还制订、颁行了《考察通则》，规定：凡内外官遇到考察，有央求势要嘱托者，即以“不谨”黜退；凡考察有诬枉者，令部院会同内阁考察；在京五品以下文职，并在地方布政使、按察使二司官有不公道者，准许科道官指实劾奏；京师南京考察不公者，许南京科道官劾奏；被黜官员有不服考察，撙拾妄奏者，发遣为民。

朱元璋对官吏的考课，既严格而又有法度，在明初都确实认真执行。1385年，吏部奏称天下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朝觐官4117人，其中称职者1/10，平常者7/10，不称职者1/10，贪污闾茸者1/10。

对于治绩特别优异的官吏可以免于考课。如云南布政使张纘，“治绩为天下第一”，朱元璋“特令吏部勿考”。保宁知府李忠信治绩突出，朱元璋特旨说：“李忠信能臣也，不在考例。”

监察主要依靠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及六科给

事中等监察机关。1393年，朱元璋制订和颁行了《纠劾官邪规定》，列出都察院对于文武百官违法失职，予以奖惩的4条规定。其中两条规定：凡百官有司，才不胜任，猥琐闾葺，善政无闻，肆贪坏法者，随即纠劾；凡在外有司，扰害善良，贪脏坏法，致令田野荒芜，民人受害，体访得实，具奏提问。

监察官吏只有严于律己才能秉公纠劾贪官污吏。所以朱元璋又在《监纪九款》中规定了对监察官员的纪律约束。监察官员“若知善不举，见恶不拿，杖一百，发烟瘴地面安置，有脏者从重论”，较其他官吏加二等。

这套严格的考课和监察制度，对官吏遵纪守法和贪赃枉法的赏罚分明，使清官循吏得以重用升迁，贪官墨吏门闾路绝，这对于澄清明初的吏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朱元璋通过考察和监督在对贪赃枉法者给以严惩不贷的同时，对清官廉吏则给以表彰奖赏，以达到扶正压邪的目的。如，山东济宁知府方克勤，为政有治绩，廉政不贪，“自奉简素，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朱元璋特“赐宴”，“嘉其绩”。四川定远知县高斗南，颇多“善政”，当时“举天下廉吏数人”，高斗南是其中之一，便把他的名字列在《彰善榜》、《圣政记》中，以示表彰；后又提升为云南新兴知州。

兰县河桥巡检司的一个小吏，当驸马欧阳伦违禁贩运私茶，所至骚扰，大吏不敢过问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揭发其罪行。朱元璋认为他这种“不避权贵”的精神十分可贵，还特地“遣使赍敕嘉劳之”。

朱元璋为了教育臣民防腐倡廉，自己以身作则，一生提倡节俭。陈友谅割据政权被歼灭后，江西行省为了巴结讨好皇帝，把陈友谅用的金缕床献给朱元璋。朱元璋指出，生活如此奢侈极慾，政治怎不失败？还说：“这和孟昶的七宝溺器有何区别？”一次司天监把元顺帝费尽心机作成的水晶自动宫漏（计时器）献给朱元璋，马屁未拍成，反被训斥了一顿。朱元璋下令把这两种宝物都砸碎了，他说：“珠玉不是宝，节俭才是宝。”朱元璋还曾让自己的儿子朱标“遍历农家，观其饮食”，然后对他说：“农民身不离田亩，手不离农具，终年勤劳，不得休息。而他们住的不过是茅屋草房，穿的不过是粗布衣裳，吃的不过是蔬菜糙饭，而国家经费都由他们负担，所以要让你知道。凡自己的居住食用，必须想到农民的劳苦。取之农民的要节制，自己的用度也要有节制。要使农民不苦于饥寒。如果横征暴敛，那就民不堪命了。”这段“安养生息”的话，既是对皇子说的，也是教育官吏的，要求他们力戒骄奢，提倡节俭，清廉自守。

随犯随杀，朝杀暮犯

由于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惩贪倡廉的有力措施，经过二三十年雷厉风行的斗争，明初的吏治，一反元末“赂遗权要”、“蠹政厉民”的腐败风气，日趋清明。从洪武（1368—1398）到仁宗、宣宗（1425—1435），“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尤其是在朱元璋统治期间，“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抚循休息，民人安乐”。有人描写明初的吏治情况说：

“爰从甲辰秋，始见官府明。

令薄来抚绥，曲尽父母诚。

流离渐怀归，沈痾渐苏醒。”

又有人描写朱元璋统治时期一个名叫陈景明的县尹的治政情况说：

“官情事省无鞭扑，县治门前可罗雀。”

“父老皆言大尹贤，愿留大尹更三年。”

以上这些赞美，难免有些过誉之词，但明初吏治较好，这是可信的。据《明史·循吏传》载，所谓勤政廉洁、功绩卓著者共120人，其中从洪武到宣德60余年中，有100余人（洪武年间30人）；正统至嘉靖130多年中，只有10多人；隆庆到万历50余年中仅2人；天启到崇祯24年中竟无1人。从这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明初反对贪官污吏斗争所取得的成效。与历史上各代王朝相比，朱元璋时期的吏治相对要清明得多，明史专家吴晗甚至高度评论说：“凡有两汉之遗风，且驾唐宋之上”。官场贪污腐败之风有所扫荡和遏制，既加强了国家统治效能，也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加上朱元璋其他轻徭薄赋等措施的实行，使得明初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所以说朱元璋反对贪官污吏斗争的历史进步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可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作用是短暂而有限的。朱元璋厉行严禁贪污、重刑赃官的做法虽说是空前的，其惩治手段之残酷也是历史上罕见的。可是，并没有真正达到他以重刑“化贪为贤”的预期目的，未能彻底阻止官吏继续贪赃枉法。刘三吾在《大诰三篇后序》中说：“治之虽严，而犯自若。”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1385年，吏部考课全国地方官吏，有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县朝觐官共4117人，称职者仅435人，不称职及贪污闾葺者竟达785人。时任山西平遥训导的叶伯巨说：“数年以来，诛杀亦可谓不细矣，而犯者日月相踵。”1391年，刑部尚书杨靖奏：“今天下有司，乃有累年稽缓者，致使案牘山积，庶务不清”，“当逮问者二百余人”。使明太祖尤为恼火的是，不仅“天下诸司，尽皆脏罪，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甚至连他自己派去监察百官充当耳目的御史，也是“假御史之名，扬威群众，

恣肆贪淫”。面对这种随犯随杀、随杀随犯、贪污不能根绝的现象，气急得朱元璋只是跺脚，说：“我欲除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脏的，不分轻重都杀了！”

何以出现“随犯随杀”却又“随杀随犯”的状况呢？今人可以从中总结哪些历史经验教训呢？

贪污腐化是封建剥削制度和官僚政治的必然产物。剥削阶级的贪婪性是产生贪官污吏的阶级根源，专制主义和官僚政治是贪官污吏借以滋长蔓延的社会条件。不彻底扫除封建专制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及其影响，单靠严刑峻法要想禁绝官僚的腐败和贪婪，是不可能的。朱元璋作为封建王朝的皇帝，自然不懂得个中道理。他惩治贪官污吏的最终目的是维护以他为首的封建专制制度，可这正是保护了产生贪官污吏的基础和土壤。

当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严重危害和影响国家政治统治与人民安居乐业时，根据“刑罚世轻世重”的古训与原则，从重打击贪脏枉法犯罪行为，这是必要的，也会有效的。可是，朱元璋却袭用了剥削阶级的片面的惩罚主义原则，竟使用了封建制“五刑”（笞、杖、徒、流、死）之外的重刑酷法。这种“法外加刑”，就导致了法制的破坏，治狱的失平，诛戮的滥施，无辜的牵连，一时“弊若蜂起，杀身亡家者不计其数”。1386年，朱元璋在作《大诰续编》时就曾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福建所设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他们往往是刚刚任用或不久，旋即逮狱。在这种紧张而又恐怖气氛之中，“为士者以溷遁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不少人遇事唯唯诺诺，蒙混度日。不少人朝不保夕，弃其廉耻，犯罪者比比皆是，“善终”者寥寥无几。而那些好贪巨滑之徒，“借贪婪苟免为得计，以廉洁受刑为饰辞”，借机大肆贪污，害民误国。朱元璋反贪污斗争，是注意到“明刑弼教”的，如比较重视法制教育和预防犯罪，这都收到了较好的成效。但总的

来看，他对儒家提倡的“德主刑辅”（治理国家以礼义教化为主，而以刑事惩罚为辅）认识很不深刻，不恰当地强调了“以刑专严”的主张，因而迷信严刑峻法，迷信暴力。这不利于深入地、顺利地、持久地把反贪官污吏的斗争进行下去。朱元璋到了晚年，他逐渐悔悟到，严刑峻法并不是有效的惩贪治世之道。1390年，他告谕大臣说：“愚民犯法，如啗饮食，嗜之不知止，设法防之，犯益众。唯恕行仁，或能感化。”

朱元璋创建的“民拿害民官吏”制度，也收到一定成效。但由于他阶级地位的转化，从农民小生产者的弱点到封建帝王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又不可能认真的较为彻底做到发动和依靠民众。他的“借民逼官”主张并未能普遍实行起来。恰恰相反，明初反贪官污吏的斗争，是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进行的。封建专制法制的特征是：法自君出，君主独断。朱元璋既是反对贪官污吏的立法者，也是贪脏枉法案件的最终审判者。总之，一切由他个人说了算。反贪官污吏的斗争本来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事情，“乾坤独断”怎么能行呢？加上，朱元璋片面认为“人皆贪”；“谕人为善，从者罕焉”，于是，往往态度偏激，凭感情用事，采取过火行动，凡“今后犯脏的，不分轻重都杀了”，使反贪官污吏的斗争不断扩大化，造成不少冤、假、错案。

明初实行考课与监督制度，还是比较认真的，人称“明兴考课之制，源法唐虞，近酌列代，最为有法”。对防范贪脏枉法起了好作用。但后来就不太认真严格了，以致中叶以后流于形式，而且积弊丛生。神宗时左副都御史邱橐曾抨击说：“如京官考满，河南道例书称职，外吏给由，抚按官概与保留。以朝廷甄别之典，为人臣交币之资。敢徇私而不敢尽法，恶无所恶，贤亦安劝，此考绩之积弊。”这也是朱元璋反贪官污吏斗争，难以取得比较彻底胜原因之一。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

（责任编辑 洛松、萧徐）

下期要目

“文革”中胡愈之等人痛切晋言前后

张爱萍单枪匹马闯皖东北

聂荣臻元帅和他的两位老秘书

三位南沙老人谈南沙

霍英东是怎样从“天堂”底层拼搏出来的

歌谣

谚语与武则天前后朝政

● 拜根兴

民间的歌谣、谚语，是特定历史时期百姓心态的大聚焦。唐武则天前后（650—750），流传于民间（主要是京洛一带）的歌谣、谚语，褒贬人物、评议朝政，体现了当时百姓极强的参与意识，显示出他们对时风污浊的嘲讽和无奈。

（1）公元649年5月，贞观天子唐太宗病逝在终南山翠微宫，太子李治继立，是为唐高宗。永徽初年，高宗踵贞观之治余风，朝政清明、万民同乐，在地方上出现了一大批泽被乡里、誉满朝野，为百姓传颂不已的良吏。京兆万年县（今西安市）县令权怀恩“为政清肃、令行禁止”，唐朝开国后任职京城县令的官员没有人能超过他；权怀恩所到之处，“皆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以至于京郊百姓纷纷传语说：“宁饮三斗尘，无逢权怀恩”。乍一看，谚语似乎是贬词，但居官“天子脚下”的权县令从严治县、办事谨慎，使奸邪丧胆、百姓悦服的清官形象却跃然纸上。

雒县（今四川广汉北）县令张知古，“绥亡固存，蠲虐去暴”，与辖内百姓患难与共，众百姓作歌谣咏唱：

我有圣帝抚令君，遭暴昏悖寡
纷，民户流散日月曛，君去来兮惠
我仁，百姓苏矣见阳春。

正是这些精忠爱民、洁身自好的清官良吏，他们以自己的实际作为，唤起百姓对唐王朝的真诚拥戴，朝廷政令也顺利贯彻执行，百姓获益，他们自己也成为百姓歌谣、谚语咏颂的题材，青史留名。

同时，鞭撻贪官污也在歌谣、谚语之中有所反映。李义府，瀛州饶阳（今属河北省）人，贞观年间以善作文赋诗深为太宗垂爱，曾做过晋王李治的侍讲师傅，永徽末年，为武则天最后荣登皇后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颇受高宗、武则天

恩宠。官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令，进封河间郡公。李义府精于投机钻营，史载其“容貌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狡险忌克，故时人谓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谓之李猫。”他的儿子、女婿更是倚仗权势卖官鬻狱，倾动京城朝野。龙朔二年（663），李义府因聚敛受贿被贬，他的儿子女婿四人也同时被流放庭州。京城长安百姓拍手称快，通衢大道两旁的墙壁上贴满了声讨李义府父子罪行的露布、传单，而“今日巨唐年，还诛四凶族”的谚语更是传遍京城长安及东都洛阳，老百姓平日淤积的无奈、愤慨，以及恶少衙内被除的喜悦心情在这短短的谚语中得到体现。泽州（治今山西晋城）都督王熊希曾无能、曲断案狱，而他的前任尹正义却为官公平，百姓两相比较，作歌谣说：

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獭獭。
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沫。见钱满面喜，无镳从头痛。尝缝饿夜叉，百姓不可活。

可见，为官优劣、清廉与否，百姓心里自有一本账，他们只能用歌谣这种方式，将其对贪官污吏丑行恶迹的愤懑之情宣泄出来，呼唤着朝廷根除贪贿，惩办赃官。

诚然，贪官污吏导致朝廷失去赖以维持生存的民心，而两军阵前临阵怯懦退却，致使全军覆没，这样的人也是应当受到谴责、正法的。高宗上元年间（674—676）权任中书令、洮河道大总管、检校鄯州都督的李敬玄统帅唐军抵御吐蕃，两军刚一交战，作为主帅的李敬玄即惊慌后退，部将王杲、曹怀舜等人随后也望风逃窜，使得先锋将领刘审礼缺乏援助，军败陷阵，唐军大败。当时军中乃至各地传语云：

洮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
见贼不敢斗，总由曹新妇。
以妇人比喻李敬玄等人临阵脱逃，

置朝廷成命于不顾，足以说明谚语出自一般的百姓、兵卒之口。另外，武则天的堂侄武懿宗被封为河内郡王，当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被平定之后，则天令其与狄仁杰、娄师德等大臣安抚河北，武懿宗对“民有为契丹所胁从复来归者”，均以反叛对待，杀戮殆尽；在此之前，契丹将领何阿小攻隧冀州后杀人如麻，老百姓将两者相联系，各地流传民谣说：“唯此两何，杀人最多。”

酷吏政治是武周时期朝政的一大特色。当时臭名昭著的酷吏有来俊臣、周兴、侯思止、索元礼等，他们的凶险酷恶骇人听闻；而同理“制狱”的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却独存严恕，许多人因此而获救。京、洛地区百姓士庶传语道：“遇徐、杜者必生，遇来、侯者必死”。由此，酷吏政治的白色恐怖，出污泥而不染官吏的高尚品德不言自明。

再者，讽谕时俗，诙谐中蕴含褒贬。许钦明、郝处俊同任官于高宗、武则天时期，两人还是同乡，而且，许、郝两家子弟的长相特点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奇丑无比；但因居官京城，富于财势，两家子弟出入多盛装奇乘，趾高气扬，炫耀于里巷通衢，京洛百姓作歌谣云：“衣裳好，仪貌恶，不姓许，即姓郝”。无独有偶，郝处俊和他的舅父许圉师也同朝秉政，权任宰相之职；他们的同乡田氏、彭氏则精于经商，不几年就赢利积蓄逾亿，成为远近闻名的巨富。其中彭志筠于高宗显庆年间（656—660）上表朝廷，请以家财绢布二万匹捐赠朝廷，高宗下诏褒奖，册任其为奉议郎。江淮各地百姓以此事件为据，传语说：“贵如许、郝，富若田、彭”。员半千，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5）任正谏大夫，兼右控鹤内供奉，著述颇多，他的庄园在焦藏川（今西安市境内），北枕白鹿

原。庄园内莲塘、竹径、海棠涧、会景堂风景如画，花坞、药畦、碾磨、麻、稻整齐排列，一派别致脱俗的田园风光，使人目不胜收。里中百姓有谚云：“上有天堂、下有员庄。”这些歌谣、谚语多针对朝廷要员，有感而发，或褒或贬，自然风趣。

（2）唐初著名画家阎立本，总章元年（668）高宗任其为右相，进爵博陵县男。史载阎立本“虽有应务之才而尤善图画，工于写真”，就是说阎氏步入政坛并不是最佳选择。左相姜恪曾多年带兵守边，后归朝为官。两人虽各有专长，但都缺乏宰辅总括朝政的才能，处理朝务多有偏颇不当之处。如京城饥荒，他们不解决根本问题，竟让国子监学生放假回家度饥，又严格要求朝廷要害部门官员必须通晓一部儒家经典著作。时人以《千字文》形式传语说：

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三馆学生放散，五台令史经明。

反映了京城百姓对朝廷因官任欠妥造成的不良后果的不满。当时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则天敕令侯氏退休离朝，侯知一上表陈说。深表不满，并且在朝堂上跳跃奔跑，显示自己身体健康，能够担当重任；另一朝官张棕，家有丧事服期未满竟自请起复。吏部主事高筠的母亲病逝，亲朋好友都哀痛悲切，而高筠则声言“我不能为母亲行孝”，实际上是害怕三年丧服影响仕途升迁；员外郎张栖贞因事被人告发，他无计可施，就慌称他的母亲身亡正在操办丧事，企图逃脱罪责。如此官场奇闻，官吏劣迹，为世人不齿，老百姓传语各地：

侯知一不伏致仕，张棕自请起复，高筠不肯作孝，张栖贞情愿遭忧。

天授初年，武则天派纳言史务滋等十人巡抚天下诸道，推举人

才。长寿元年（692）初下令将所举人才，“无令贤遇，悉加擢用”，这些人有的被任为凤阁舍人、给事中，最低的也官居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之职。这样，一些多才艺的贤能之士确被选任，使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但一大批无才无德的平庸之辈也因此充斥朝廷，朝堂大有官多为患之虑。京城百姓对此多有评说，流传民谣云：

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待御史，碗脱校书郎。

另有一举人沈全交续其谣语：

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糊心宣抚使，眯目圣神皇。

御史纪先知闻听民谣上奏，要求严查以绝谤言。武则天听后只是哈哈大笑，说：谁让卿等滥开官缺，事已做出来了，就不要怕人说了。这件事既表明民谣切中时弊，反映了京城士庶百姓对朝廷措置不当的嘲讽心态，而武则天虚心接受不予追究，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她敢于正视朝政之失所独具的政治家风范。

武则天统治末期，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深受则天宠爱，张氏兄弟因此“势倾朝野”。二张不仅私结党羽，形成一股凌驾于李氏王室、武氏家族之上的政治势力，而且，他们还“竟以奢侈相胜”，朝野侧目。京城即有民谣流传，云：“张公吃酒李公醉”；张公，即张氏兄弟，李公，即武周末旧朝的李氏皇室。民谣以此斥责张氏兄弟恃宠专权，对李唐皇室的运命也颇为担忧。张易之的另一个弟弟张昌仪倚仗权势，生活奢靡，所居之第舍宏丽堂皇，远远超过王侯之家。时有洛阳百姓冒险在其宅门题谤警示，云：“一两丝能得几时络”，意为张氏兄弟的末日就要到了；谁知张昌仪看到谚语，竟续题曰：“一日即足”。这件事及谚语很快传遍洛阳、长安各地。百姓盼望张氏兄弟早日完蛋的心情

从谚语中得到充分体现,而张昌仪的续语则显示出他色厉内荏,对自己命运徒唤奈何,过一天算一天的颓废心理。

(3) 高宗永淳元年(682)春节过后,关中持续干旱,百姓贮藏的少许粮食难以度过春天,而夏季作物又因天旱而枯萎,整个渭河平原陷入空前的饥馑粮荒。这时,京城长安流传童谣说:

新禾不入箱,新麦不上场,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墙。

鉴于都城长安及其周围地区严重的粮荒,唐高宗带领文武大臣行幸东部洛阳。然而,五月中旬洛阳却连下暴雨,洛水泛滥成灾,东都著名的天津桥被洪水冲垮,城内一片汪洋,数千家居民无家可归。关中地区旱灾继以蝗虫横飞,流行瘟疫,百姓死者无数。表明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时代,人们适应大自然的能力还十分有限,百姓对大自然灾变征兆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感受。

根据《旧唐书》、《资治通鉴》诸史书记载,高宗晚年患有多种疾病,直接影响到朝政的执掌,皇后武则天逐渐参与政事,并主持朝廷日常事务。麟德元年(664)以后,朝廷重大事件的处理,高宗都和武则天商议,武则天从此掌握很大的权力,“黜陟杀生,决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太子李弘仁爱好学,忠厚多才,高宗十分喜欢他,但李弘身体柔弱多病,又因多次和母亲武则天发生争执,武则天非常恼火。上元二年(675),李弘暴死,时人多传是武则天投毒致死。随后,高宗,武则天的次子雍王李贤被立为太子。好景不长,宫中流传说太子李贤并非天后武则天所生,李贤听到传言非常惧怕,而武则天又令御用文人撰写《少阳正范》、《孝子传》两部书,赐与李贤,李贤更不自安;他曾作《黄台瓜辞》一首: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以感动武则天。而京城也开始流传民谣云:“侧堂堂,挠堂堂”,堂即言李唐皇室,侧者为不正,歪讲,挠可作不安、危机理解。民谣说明李唐皇室面临危机。而堂堂,又似预言将来李唐王室还有重整旗鼓的希望。另外,永淳年间(680—681)以后,两京还流传“杨柳杨柳漫头驼”的谚语,据说是预言不久爆发的徐敬业扬州兵变。中书令裴炎,高宗弥留之时受遗诏为辅政大臣,不久,又参与决策废黜中宗拥立睿宗。武则天临朝称制之后,裴炎多次进谏,反对立武氏七庙及追王父祖,反对诛杀李唐宗室近属,武则天非常不满。徐敬业扬州起兵后,裴炎希望以此作为对付武则天进一步蚕食李唐王朝的契机,报答高宗知遇之恩;当武则天向他询问讨伐谋略时,裴炎答道:“皇帝年龄大了,但不能主持朝政,从而给反叛者提供了作乱的依据;如果太后将朝政交于皇帝(睿宗)处理,徐敬业反叛就会不讨自平”。正在这时,京城坊里传诵着更为明显的民谣:

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

从此,裴炎的政治生涯即宣告终结。有人认为民谣是当时企图陷害裴炎,讨好武则天的无耻小人所为;又有人主张民谣是参与徐敬业叛乱的“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所作,目的是想让裴炎加入其阵营。但无论孰是孰非,民谣的流传加速了武则天采取行动平叛,并为逮捕裴炎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裴炎很快就被斩于洛阳都亭驿。可见,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歌谣、谚语很可能被有政治企图的人所利用,成为他们攻击对方,致对方于死地的杀手锏;当然,这种情况只限于朝廷政治斗争。

武则天前后,民间的歌谣、谚语较唐代其它任何时期都多。这些歌谣、谚语内容大多和当时朝野政事、官人品格密切相关,因而具有强烈的政治讽喻特点。既是百姓士庶弘扬正气、不平则鸣参与意识独特反映,也显示了一般百姓期望良吏清官主持正义,以及自我调侃的群体意识,同时说明了这一时期言论相对开放自由的现实。

邮购启事

近日不断接到读者来信,反映在当地邮局订不到《炎黄春秋》特敬告各地读者,如当地邮局不能订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函购每月一期单价4.00元,订阅补购一期、一个季度、半年、全年均可。免收邮费。

另本刊1995年合订本(总34—45期)已装订完毕。全部精装,每套47.00元,一律免费挂号邮寄。

请您汇款时务必将姓名、地址、邮政编码书写清晰,以免误递。

本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邮编:100802 电话:6170955 联系人:杜习

我同京剧三大名旦的交往

● 葛献挺

我同尚小云先生第一次见面，是1949年5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前夕。

尚先生和沈玉斌、叶盛章代表平剧公会到前门车站欢迎三野文艺代表团到北平。我当年最小，第三野战军代表团的团旗，团长赖少其同志就让我在排头打着，如同跑龙套，我是“头旗”。经沈玉斌介绍我是第一个同尚先生见面的。1964年冬，北京梅、尚、荀、青四个京剧团整编，准备组建北京京剧二团。尚先生虽在西安，但仍是北京尚小云剧团的团长。为了妥善安置尚剧团的编余人员及老生方英培的出处问题，我曾和李达同志去西安尚先生家中，谈了两天分配方案。尚先生坚持方英培留在新建的二团再唱两年，他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方先生最后还是到了北京戏校。后来尚先生每次回京，有时他来文化局看张梦庚，有时张到他的住处看望，均由我作陪。最后一次见面是1974年深秋，在吴素秋同志家中。尚先生当时一只眼睛虽然失明，但精神很好，有叶落归根之意，他想解决一下椿树三条的房子政策落实问题。他写了报告给文化部和北京市革委会，探询我能否设法转呈。我说：“你的学生和女婿马长礼、任志秋，可以送给江青同志。”（当时是这样称呼的）吴素秋同志说：“尚先生希望你能帮忙，长礼有难处。”后来我将尚的报告送给六十六军在文化部支左的侯再林同志，侯当时是文化部核心组成员，北京市我转托文艺组的李胜祥

将尚的报告转呈黄作珍，李胜祥是当时北京市革委会文艺组的办事组组长。不久李告诉我：“黄政委已经圈阅”，我到吴家，将此消息转告尚先生，尚很高兴。后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形势急转直下，尚先生被电报催回西安，从此一去不返。

我同荀慧生先生首次相见于是1950年12月，地点在长白山下，鸭绿江边的临江县城。当时二次战役刚打响，我从朝鲜黄草岭运送志愿军伤员到临江基地医院，适逢荀先生带团在吉林通化、临江演出并慰问志愿军伤病员，剧目是《英烈》和《诰妻嫁妹》。演出结束时，我们几个文工团员便到后台，自报家门去拜访荀先生，领我们去的是前三野娃娃剧团的霍建光，他的伯父霍仲三，当年曾同荀先生同台演戏。因为是故人子弟，又是从前线回到后方的志愿军，荀先生很高兴，一定要留我们在他住的临江楼饭店吃饭，菜很丰盛，拔丝山药很美，我们几乎都是头一次吃这种美味，因此，记忆犹新。现在中国戏曲学院任教的王世续同志，当时正搭荀班，为二牌老生，他当年演的戏是《定军山》。

三位先生中，我同于连泉（即小翠花）先生认识最晚，时在1963年秋，我在文化局艺术处工作，于先生在民族宫有一个艺术讲座，我去听课，经张印德介绍而相识。

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下达，戏曲界从此多事。由于历史的误会，我和荀先生在“十年

动乱”初期，曾经互为“上下级”，并几度往还。

两个批示下达后，北京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局决定撤销戏研所和北方昆曲剧院，并组成工作组进驻这两个单位，路奇任组长，工作组由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局两家派出，我是组员之一。戏研所撤销后大部人员下放搞“四清”，荀慧生、于连泉、侯喜瑞、钱宝森等先生，合到文化局新成立的艺术处剧目室，由高辑负责，我和金和曾也到剧目室工作。但这仅是对外的障眼法，对内、对上戏研所仍保留建制，这些情况仅人事、财务主管作编制表时才知道，但保密不能外传。因此我和高辑、金和曾虽是文化局的干部，但领工资、粮票却是占的戏研所的编制，此事直到“文革”开始时，才被有关人员在大字报上揭发出来。从这个角度上讲，荀先生则是我的所长。

1966年8月20日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往北京文化局派来了以马连科同志为首的工作组。他们用“四清”的办法，经过“访贫问苦”认为我是良家子弟，幼年参军又上了大学。因此把我当成依靠的“骨干”。我成了工作组的“红人”，也成了一部分干部心目的偶像，说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工作组的授意下，1966年7月1日，我进了“官办民选”的文革筹委会，任副主任，后又代主任。按照“十六条”，这是当时的权力机构，我又成了荀先生的“上级”，所谓“互为上下级”者，即指此。1966年8月23



筱翠花、马富禄演出《小放牛》

日，荀先生被文化局内及社会上的造反派揪出毒打，并送到孔庙“示众”。当时我怕出人命，就打电话给市委宣传部，找李立功、白涛同志汇报，均回答“不在”，一位同志原则回答：“相信群众相信党，不许挑动干部斗学生”。

我建议筹委会立即开会研究此事。开会时，我提出“揪出这么多人，我看有坏人在里面趁火打劫，不少人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如张治同志（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也被揪出来，我看有人搞阶级报复”。筹委会主任立即反驳说：“所有揪出来的走资派和反动权威都是群众自发揪出来的，在群众运动面前，我们无权指手划脚”。我说：“揪，当然是‘群众’揪的，但要筹委会干什么，讲不讲政策，我看今天的事情就是筹委会失职！”筹委会主任说：“如果认为自己失职，可以辞职。”我说：“我可以辞职呀，但有几句话要对诸位说，不然对不起朋友”。江朴同志说：“这是什么时候，你赶快说呀。”我说：

“今天揪出这么多人，我感到丢人。现在，你可以推到‘群众’头上，但别忘了筹委会是权力机构，也别忘了共产党所有的运动都有‘后期’，今天如果出了人命，运动后期，在座各位谁也逃不了责任”。这时筹委会主任似有所悟，说：“小葛同志你看怎么办？”我说：“筹委会对今天的揪人事件，要尽快承担善后责任，当务之急，是立即派人去孔庙，保证今天活着去的人，都能活着回来。别看这些人现在是臭狗屎，说不定那一天会成为香饽饽。”另一位副主任怕我说出格的话，便拦住我说：“现在救人要紧，其它的话不必说了，我建议马上召开全局群众大会。”于是筹委会主任便叫播音室通知全体人员开会。在全局大会上，筹委会宣布派葛献挺带领五、六位出身好、身体壮的同志前去孔庙。我们赶到孔庙时，大院内火光冲天，荀慧生、张季纯、赵鼎新、张治、张梦庚、侯喜瑞、肖军、骆宾基等人正跪在火光前边，被红卫兵用皮带及刀枪把子抽打，转脸一看，老舍的头部已被打破，满脸是血，躺在松林里。东边是评剧院的几位，如胡彬、胡沙、陈怀平、贺飞等人，都像死尸那样挺在地上，极为恐怖。我们赶快撕一块水袖，把老舍伤口包扎好，然后大声说：“红卫兵小将们，你们不能把老舍打死，打死太便宜他了。他的‘罪行’很多，打死就没有口供了。”就在他们对我的话将信将疑的瞬间，我大声命令：“把反动权威老舍押回去！”这样，老舍就被送上我们来时坐的汽车，第一个从孔庙被救回来的就是老舍。（很遗憾，老舍先生虽未惨死在孔庙，但第二天，却葬身于太平湖）把老舍送走后，我说：“凡是年老的，血压高的，抢先往回送，身强力壮的，留在最后。”荀慧生、张季纯、侯喜瑞、赵鼎新、顾森柏及曾伯融都是第一批救回来

的。我的朋友季明、宋海波及肖军等，是最后一批救回来的。他们挨打最多。我从文化局出发去孔庙是下午三点半，等回到文化局大院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半，过了两天，8月25日，我自己也被文化局及文艺界的造反派，当作“保皇派头子”揪出来毒打。我则因祸得“福”，文化局的干部屡被社会上的造反派冲击，几乎人人自危，认为葛某人，还算一条汉子，风浪来时，能够挺身，并怀疑文革筹委会主任有勾结造反派的嫌疑，因此，决定免去他的职务，未选出主任前，由葛某人暂代。江青11月28日讲话后，我便垮台，被批斗时间之长，在文化局算破了记录。直到1968年10月4日，我们一同下放昌平劳动大学，我是“犯错误的革命群众”，荀慧生先生是“反动权威专政对象”。当年12月，肖军（也是“专政对象”）在厕所对我说：“荀慧生怕不行了，他脚底下已经浮肿，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希望你拿出当年的勇气，向上边反映一下荀慧生的真实情况。”我迟疑了一下说：“我的名声很臭，现在保皇派帽子还在头上，怕没有用”。肖军说：“其实，你为四大名旦中的荀慧生再当一次保皇派，将来历史不会亏待你，你是学历史的，也是丘八出身，怕什么呢！”这样我便硬着头皮，找到主管文化局（当时叫二连）的军宣队负责人王喜庆，把肖军对我讲的话，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王喜庆听后，说：“人家说你是‘老保’，看来没说错。好吧，你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我们先研究一下，再答复你。”第二天，荀先生果然被免除了劳动。负责看管“专政对象”的卢锡奇悄悄地对我说：“你反映荀慧生的病，工宣队讨论很激烈，有人说你是老保翻天，王喜庆说你反映的情况属实，并不存在‘派性’”。后其女荀令香接通知，到沙河劳大接荀先生回城里，我在地

里劳动，从此再未见到荀先生。

1979年5月初，张梦庚任北京市京剧团一把手，让我负责荀慧生追悼会的筹备事宜。不久，北京市委文化出版部部长项子明，叫我协助徐书麟同志尽快把北京实验京剧团恢复起来，然后把张学津从上海要回来，恢复几出传统戏。事很难办，势难兼顾。肖军、张伟君（荀的夫人）找张梦庚、项子明谈荀先生的落实政策问题，坚持让我负责把荀的追悼会办完后，再筹办实验京剧团恢复事宜。追悼会于当月24日下午，在八宝山举行，到会达两千余人。

戏研所1965年撤销时，我和边征、高辑奉派到于连泉和肖军先生家中谈过两次，中心意思是告诉于先生和肖军：“戏研所撤销，人员下放，于先生和肖军一切待遇不变，工资到文化局艺术处剧目室领取，不下放、不上班。”记得边征讲完上述精神后，于先生很木然，好像没有反映，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慢慢说道：“谢谢党对我的关怀”。



尚小云及尚长春（小云子）演出《汾河湾》

这也是我同于先生的最后一面。于先生1967年1月7日不幸逝世。他的女儿曾到文化局找组织帮助，当时是造反派当权，我正在被批斗，具体情况就知道了。

下边再谈一点我同肖军的关系，我同肖军认识于嘉兴亚家中，时在1961年冬天。慕是东北军的骑兵师长，会正骨，开了一个诊所，我因腰伤经吴锡琪介绍，请慕治疗，肖军与慕同为东北讲武堂出身。1963年我到文化局工作后，接触较多。“文革”初期，文化局有人贴大字报，以“把老右派、三反分子肖军揪出来示众！”为标题，批判肖军。肖军不服，中午吃饭前，肖军当着众人质问我：“你是文革副主任，文革等委会是权力机构，请问大字报说我是老右派、三反分子，是不是你们授意的？”我答：“筹委会没操纵任何人给你肖军写大字报。文责自负，谁签名，谁负责。”肖又问：“那我请问，中国共产党那一级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一级政府给我定过老右派和三反分子？”我答：“我不知道中国共产党那一级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一级政府给你定过老右派的结论，至于三反分子，我看大体不错”。肖军满面怒容的说：“请道其详”。我说：“我听说‘九·一八’事变后，你在东北反对过日本帝国主义，到重庆后，你反对过国民党和蒋介石，到延安后，你又反对过共产党和毛主席，说你是三反分子，不会是冤枉你吧”。肖军反应很快，当即说道：“我反对共产党，但不反对毛主席。”因为在那种形势下，如公开反对毛主席，很有被乱棍打死的可能。后来，下放昌平后期，我又成了肖军专案组的组长，从专案角度，我是奉命整他，但我们二人却成了朋友。我几乎读了他的全部日记和外调材料。后来他在民族宫举办创作活动六十周年纪



荀慧生演出《十三妹》

念，一定要我参加。我进去一看，胡风、周扬都在座，我到前面同肖军打招呼，肖军替我介绍，周扬同志未听清，我大声说：“我是肖军专案组的组长！”等我回到坐位时，我的老上级、文联秘书长王松声同志对我说：“在这种场合，你怎么这么说？”我说：“你没看见，肖军同胡风、周扬斗了半个世纪，他们在改革开放后，都在握手言欢，我同他们相比，那不是小巫见大巫了吗？”

肖军在三年困难时期经彭真同志批准，每月110元工资，安排到北京戏曲研究所，也是不上班，不下放，荀慧生先生是他的所长。肖曾拟为荀慧生先生写传记，因“十年动乱”而未果。肖军在延安时曾同我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有过交往，他手中保存有毛泽东同志给他的数封回信的手迹。那时，荀慧生的生活条件较好，故肖军曾是荀先生家中的座上客。因肖军虽在危难之中，但仍能救助生活中的“弱者”荀慧生先生，故在此也顺笔写出，以彰贤者。

（责任编辑 赵友慈）

郑州发现年代最早的古城遗址

● 朱启新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从1993年至1995年，连续三年在河南郑州西山遗址进行发掘和探索，终究认定遗址内夯土建筑台基，是一座湮埋数千年之久的仰韶时代晚期城址，距今5300—4800年。这是迄今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古城遗址，从而改变了多年来一直认为龙山时代（距今约4000—4500年）始有城址的传统说法。

近百年来，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无不将远古时代早期城市的出现，列为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作为社会形态演进史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也即国家建立、私有制度形成的标志。中国是东方的文明古国，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任何一个早期城市遗址的发现，必然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引起广大中华儿女的浓厚兴趣也是理所当然了。

我国学者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虽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开始，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以后，才随着田野发掘的重要发现，使这一研究得以逐步深入。其明显收获，便是史前时期遗址内十多座早期城址的发现。尽管西方学者认为城市的出现，意味着生产技术和贸易的发达（强调的是商业文明）；中国学者则认为是一种王权统治工具和权力象征（强调的是邦国文明），这种分歧和认识上的差异，并不妨碍他们在一个基本问题上的一致，即研究城市起源对于研究人

类文明史的重要意义。

1993年以前，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内发现的10多座城址遗迹，年代最早的都属于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000多年。分布在山东、河南、内蒙古、湖北等地区。其中有的是用石块堆砌的，如内蒙古包头市的阿善遗址；更多的是用泥土夯筑的，如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至于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程度，不妨以河南淮阳东南4公里的平粮台遗址加以剖析。平粮台山城为正方形，长宽均为185米。现存城墙高3米多，顶部宽约8—10米，下部宽约13米。南、北城墙的中间辟有城门，门内两侧都建有相对的房屋各一间，房内有灶。据推测，这是守护人的住所。说明那时多有战事，城门守卫，平时监视出入，战时用以防御。在城内发掘房基十余座，有的建在平地上，有的建在高台上，建筑格式也不一样，肯定居住者不属于同一地位同一身份，或者说不属于同一阶层，证明当时已存在了阶级阶层的差异。在南门的门道下面，发掘出几节陶制的排水管，北高南低，节节套合，这显然是专用于向城外排水的设施。说明当时的统治者，不仅有了长期经营的思想，也有了组织城邑建设的通盘考虑。已发掘的分布在三个城角的三座陶窑，不仅说明城内手工业生产区划已有了固定的地区，而且从生产陶器专业化的程度，可以推断当时的商业贸易活动已有了一定的发展。

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有的既已达到如此的水平，无可置疑，它必定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那么在龙山文化之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有没有城址出现呢？它的发展过程又是怎样的呢？多年来，学术界在苦苦地追求与探索。

作为我国1995年考古重大发现的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时期城址的确认，为中外学界带来了欣喜。它距今5300—4800年间，比平粮台山城至少早500年。

西山遗址位于郑州北郊邙岭余脉上，坐落在枯河北岸，西北与豫西丘陵相连。目前，已发掘面积达4700平方米，清理出房基120余座，另有窖穴、墓葬等1000多座。出土大批陶器、石器、骨器和种籽等。最最重要的，就是确认了夯筑的城墙，这是仰韶时代晚期的一座城址。

西山古城平面略近于圆形，目前仅有西墙和北墙的一部分，其余地段，从地貌观测，遗迹保存的可能性已很少。残存的西墙只留下60余米；北墙的西段、中段和东段共长也不过230多米。城墙高度保存最高的一段约3米，宽约5—6米，折角的地方则宽到8米。这座城被破坏得很厉害。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城墙建筑所采用先进的方块板筑法，却很清楚。

根据城墙断面的剖析，了解到修建的大体情况是：依照设计规（下转47页）

我仍是黃子孫

攜手黃運中華黃子孫



大會主席鄭明燭賜上何李華聯先生贈送紀念品



附錄48



先生在嘉賓

1995年12月2日至5日,第三屆世界華商大會在泰國曼谷隆重舉行,來自25個國家,80多個地區的1500余位代表歡聚一堂,“加強華商聯誼,共謀經濟繁榮”,“黃子孫”叱吒風云的輝煌業績,展示“龍的傳人”爭強21世紀的激情和風采。整個大會體現著黃子孫,龍的傳人:血濃于水,一脈相承;整個會場,激蕩著“炎黃旋風”,湧動著“中華魂”。我社副理事長李華聯先生也參加了這次華商盛會。



華商領袖與李華聯先生在大會



第四屆華商大會主席鄭明燭與李華聯先生合影



副理事長李華聯先生與黃子孫



炎黄春秋



（左四）和方里（左六）等北京市人民政府部分领导同志



陈延和她的丈夫曹永刚

港岛救英：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撤离香港纪实

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奠基人江上青

李锐与《庐山会议实录》

我与京剧三大名旦的交往

“规范+选择”：冯恩洪为跨世纪教育工程“抛砖”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00元